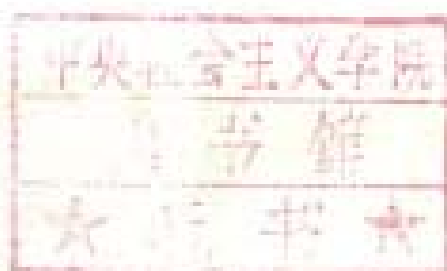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劳动组织

〔法〕路易·勃朗 著



D091.6



200123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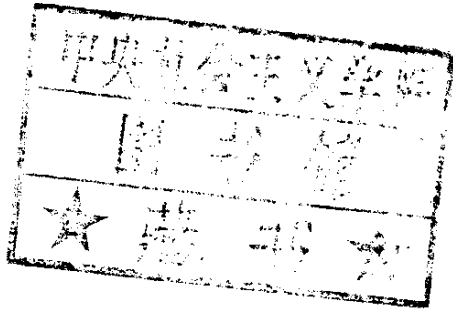
1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59563

劳动组织

[法] 路易·勃朗 著

何 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劳 动 组 织

〔法〕路易·勃朗著 何 钦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3017·59

196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150千
印数 7,000册 印张 7 1/16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91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中譯本序言

路易·勃朗(1811—1882)是法国历史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生于马德里,当时他的父亲奉拿破仑的命令,正以财政督察官身分出使西班牙。勃朗的家庭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的保皇党人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保皇党分子,是革命的死敌。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他的祖父被革命法庭处死,父亲逃亡。勃朗的童年是在他母亲的家乡科西嘉度过的。随着拿破仑政权的倒台、西班牙革命运动的高涨和父亲官运的告終,勃朗的一家曾一度过着穷困的生活。只是在复辟以后,因为得到路易十八发給的撫恤金,勃朗才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先就学于罗得斯大学,后来继续在巴黎求学。为了解决一部分学习和生活費用,他利用課余時間从事抄写、私人教师和家庭教师等工作。

1838年,勃朗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政治、社会和文学进步評論》。在这以前,他已经給巴黎的民主刊物如《良知》杂志等撰稿。1839年,勃朗在自己的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劳动組織》,次年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屡次再版,并譯成其他各国文字。这本书在工人群众中銷行甚广,給勃朗带来很大的声望,但同时却引起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从1843年起,勃朗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刊物——《改革报》編輯部的成員,并先后写了《一八三〇—一八四〇年十年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等著作。在这期間,勃朗在工人阶级中所以聞名,是由于他与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主张

政治斗争和争取民主国家制度的斗争，提出国家帮助工人并分配工人以生产手段的要求。勃朗阐明自己的立场时写道：“倘若需要从事社会改革，也就少不了要推动政治改革。因为，假如社会改革是目的，那么政治改革就是手段。”^① 二月革命发生时，已经获得政治资本的勃朗，一方面以工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身分自居，另一方面却向资产阶级谄媚，他的这种表里不一的行径，使他成为最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以工人代表身分出现的、参加临时政府的候选人。参加临时政府后，勃朗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完全寄托于临时政府，对资产阶级采取无原则的妥协，竭力阻止无产阶级的公开发动，把政治斗争任务置诸脑后。这是勃朗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变。列宁写道：“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在1848年革命中是臭名远扬的，因为他从阶级斗争的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立场，用‘社会主义’词句装饰起来，而实际上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②

为了欺骗工人群众，临时政府组织了研究“工人问题”的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由路易·勃朗和阿里贝尔两人担任主席。马克思对于这件事曾有评论，他写道：“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所在的场所，而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部分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枢纽完全保持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旁，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里贝尔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做。

① 本书第13页。

② 列宁：《路易·勃朗主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

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們既沒有任何經費預算，也沒有任何執行權力。他們必須用自己的額骨去撞碎資產階級社會的石柱。”^① 在盧森堡委員會里，勃朗實際上在以勞資糾紛仲裁人的身分孜孜不倦地呼喚工人穩健和忍耐，跟資產階級進行合作。儘管勃朗對資產階級妥協讓步，但他並沒有取得它們對他的信任。資產階級在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之後，就把形式上參加臨時政府的勃朗一脚踢開了。同年5月，重新組成的資產階級政府——執行委員會，不僅沒有讓他參加，而且还指控他參加六月起義（實際上他並未參加），向他追究起義責任。勃朗不得不離開法國，遷居英國。在英國，他寫了一系列的歷史著作，其中包括《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在該書中，他不僅沒有從迫害中吸取經驗教訓，相反，仍然為他的妥協策略辯護，繼續並發展其過去的錯誤。1870年他回到法國，翌年，他被選為國民議會議員。3月18日，巴黎公社誕生時，他不僅沒有參加這個新型的無產階級政權的工作，而且和凡爾賽分子沆瀣一氣，誣蔑公社為暴動。他和共和派分子蘭克、烏利斯·巴蘭及“社會主義者”托倫在一起，進行了狂妄的活動，力圖以“調和”作幌子解除公社的武裝，搞垮公社。當“調和”活動失敗時，他逃往凡爾賽。這樣，他便由隱蔽而轉向公開反對公社，因而他在工人羣眾中的威信一掃而光。他死於1882年，法國資產階級政府曾予以國葬。

勃朗寫作《勞動組織》，正是在法國工業高漲的年代。根據統計，從1830至1848年，法國工商業中的投資增加百分之五十，蒸汽

^① 馬克思：《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123—124頁。

发动机的数目增加七倍，煤的开采量增加两倍。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竞争进一步尖锐化，资本集中过程加速，中小资产阶级大批破产，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恶化。工人们每天工作十三至十五小时，然而所得的工资却不能维持他们本人和家庭的最低生活，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孩子也送进工厂做工。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这一切悲惨的后果给了勃朗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本书中，勃朗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严厉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贫困。他写道：“谁都知道，贫困把教育局限到可耻的地步，因而使人民的智慧埋在黑暗里。贫困经常使人们牺牲个人的尊严，而且几乎总是由贫困来决定这种牺牲。贫困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贫困就在人类的道德中隐藏着一种新的痛苦，并且把人们内心所具有的慷慨心情变为怨恨。”^①他认为，贫困还使人们失去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自由，也仅仅是对于那些拥有享受自由和扩大自由手段的人，即对于拥有土地和金钱的人说的。对于这些人来说，“自由”确实存在。但是，对于那些既没有土地、金钱，又没有文化的而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说，则毫无自由可言。这些人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妻子和孩子的自由，只有忍饥挨饿、失业和贫困的自由。所谓权利，只不过是用来欺骗劳动人民、掩饰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词语。

勃朗在本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了竞争的危害性。他在批

① 本书第5页。

評競爭時寫道：“對於人民來說，競爭是一種毀滅性的制度。”^①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於無產者失去一切生產資料，他們只能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所以對於他們說來，競爭首先就是拍賣勞動力的競爭。勃朗指出，在這種競爭中，即使那個得勝的工人（即獲得工作的工人），他的勝利也僅是暫時的。這種競爭還會進一步加強，其結果必然引起工資的普遍下降，工人生活的進一步貧困化。因此，勃朗得出結論說，競爭是勞動群眾貧困的根源。

但是，勃朗認為，競爭不僅對於勞動者有害，而且對資產階級也是有害的。關於這一點，他寫道：“對於資產階級來說，競爭是不斷起着使人貧困和破產作用的原因。”^②在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為了排擠和壓倒自己的對手，不惜一切地採用“廉價出售”產品的手段，進行競爭。而“廉價出售”對於那些無錢購買新式的昂貴機器的中小製造商來說，“就是宣告他們死刑的裁決”^③。所以，勃朗認為，這種競爭手段只“是為了幾個工業寡頭的利益而毀滅資產階級的方法”^④；“廉價出售”只形成暫時的和虛假的好處。勃朗指出：“當鬥爭還在進行時，‘廉價出售’是被維持着的；而當最富有的人戰勝他所有的敵手時，價格就立即重新上升。競爭導致壟斷……‘廉價出售’導致價格的暴漲。這樣，在生產者中間曾是戰爭武器的東西，遲早會成為消費者們貧困的一個原因。”^⑤

① 本書第24頁。

② 同上。

③ 本書第61頁。

④ 本書第62頁。

⑤ 同上。

在本书中，勃朗还精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犯罪的原因，这是他的这部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认为竞争所造成的贫困是引起犯罪的根源。据他看来，犯罪人数的增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他用统计材料论证了这一点，说明法国四十年代的犯罪人数比三十年代的犯罪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从地区来说，城市的犯罪人数比农村的犯罪人数多，工业区的犯罪人数比农业区的犯罪人数多。

此外，他还批判了使用童工、女工的制度；批判了贫困所引起的婴儿死亡率高的现象，等等。

为了消灭贫困，消灭竞争，建立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勃朗提出了改革社会的方案。在工业方面，他认为“有效而合理的感化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种健全的劳动组织”^①，即社团性质的社会工场。根据这个方案，资产阶级政府可以发行公债，用公债的收入先在国家工业的最重要部门中创办这类工场。起初，由于资金的限制，建场数字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并且只能在征集的资金范围内，招募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鉴于政府是社会工场的创办人，所以工场的规章制度应该由政府制订，并经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表决而具有法律效力。在社会工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指定工场的各级管理人员，一年以后，由于工场成员彼此有所了解，而且“他们都关心社团的成功”，所以工场管理人员将由工场的成员选举产生，商量如何分配盈利和扩大自己企业的生产。为了让人们相信，这种制度不会为独裁和暴政大开方便之门，勃朗声明说，这

① 本书第47页。

不等于政府干預工場的经济权力，政府的权力仅以上面所說的为限。以后政府的任务只限于監督各工場执行規章制度和所有同类生产中心之間的关系。

工場的利潤分做三份：第一份按工場的人数平均分配；第二份用于对老、病、残废者的撫恤以及对于其他蒙受損失的工場的支援；第三份用于为扩大生产而购置新的生产資料。

随着工場生产的发展，資金的积累，原有的工場将加以扩建，同时并建立新的社会工場，并招收新的工人。在那些大規模经营的社团中，可以招收各种不同职业的工人，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并在围绕一个大的工业而組織起来的各工业部門間形成一个整体的联合企业。在工場內部，每个成員的工資完全平等，各人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工資。但是，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从劳动社团中将会产生一些自願参加的消費社团。

社会工場可以邀請資本家参加，并从預算中支付給他們投資的利息；但是他們只能以工人的身分，即必須参加劳动才能获得工資。

当社会工場在各主要工业部門普遍建立，資金相当雄厚时，勃朗认为，社会工場應該通过竞争和私人工业作斗争，利用自己生产的廉价物品和社会工場这种大型企业所具备的优越条件，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和平地而不是暴力地兼并私人工业，而最后消灭它們，使社团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从而消灭竞争和貧困。

在建立和扩大社会工場的过程中，国家是社团原則的最高保护者，它将象保护私人資本一样，保护着社团原則不受侵犯。为了不引起資本家的不安，勃朗安慰他們說，社会工場对私人工业的竞

爭，对資本家將不會是致命的，因为國家將竭力減輕競爭的後果，使社會工場的產品價格不降到最低的水平。

在農業方面，勃朗提出取消旁系繼承權的改革方案。根據這個方案，將繼承權的財產宣布為公社財產，以便使公社擁有一片不得轉讓的莊地。因為這種莊地不斷得到擴大，所以就能在既不造成痛苦也不發生強奪的情況下導致規模龐大的農業革命。公社將大規模地經營土地，並且按照管理工業的法令進行。

勃朗認為，這樣，在實行上述改革的基礎上，就可以建立一個沒有貧困，沒有競爭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既不存在剝削和壓迫，也不存在其他一切非正義的行為。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將是一致的，因為每個成員只有通過公共利益才能獲得個人利益的滿足。由於每個成員的利益與公共利益休戚相關，所以大家將關心公共物質財富的增加，使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新的機器的發明和採用將不再成為排擠工人的工具，不再成為富人之間競爭的武器，而成為減輕工人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增加社會物質財富的手段。同時，由於人們擺脫了物質生活的貧困，就可以學習文化，充分地發展自己的智力。

綜合上述，勃朗的兩個重要論點可以大致歸結如下：1)勃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競爭和犯罪等現象進行了批判，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批判得非常具體，非常尖銳，包含了一部分真理。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這種批判對於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丑惡，提高無產階級的思想覺悟，是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的。2)與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勃朗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時，側重於批判資本主義競爭以及競爭所帶來的危害。這一

点对于勃朗說来最为突出，也是他的貢獻所在。他指出的竞争导致垄断、竞争使社会两极分化、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因素等思想，确是可貴的預見。这些預見为后来七十年代的社会发展所证明。

但是，同时應該看到，在勃朗的空想理論中，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性問題，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錯誤思想和观点。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他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不彻底性。由于勃朗本身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限于表面的現象，而不能找到問題的本质。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时，沒有能够找出产生贫困的真正原因，而只把贫困归咎于资本主义竞争。勃朗对于竞争深恶痛絕，认为竞争是万恶之源；在他看来，只要消灭竞争就可以消灭包括贫困在内的一切社会灾难。勃朗沒有进一步探討竞争的根源，而只是简单地把竞争看成是一部分资本家为压倒另一部分资本家所采取的手段。勃朗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彻底性，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密切联系着的。当时法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自由竞争剧烈，广大小资产阶级紛紛破产，淪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勃朗对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境遇甚为憤慨。因此他不惜采用最辛辣的詞藻批判竞争、譴責竞争，力图挽救小资产阶级的厄运。

在勃朗的空想理論中，表現得頗为突出的是阶级調和和妥协的思想。他在說明劳动群众由于贫困而充滿着痛苦的同时，又說什么富人因为生活过分奢侈也充滿着苦恼；他在論证竞争是造成

无产階級和其他劳动群众貧困的根源的同时，又說什么竞争也是使资产階級貧穷和破产的原因；他在談到压迫对被压迫者不利的同时，又說什么压迫对压迫者也不利，等等。因此，勃朗在批判資本主义社会时，不是揭露这个社会的资产階級利益和无产階級利益的根本对立、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从而启发和提高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识，而是竭力证明資本主义制度和全体社会成員的矛盾，抹煞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的矛盾。勃朗从这种調和的立場出发，要求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反对竞争，消灭貧困，建立对社会全体成員有利的、以博爱原則为基础的社会。这样，勃朗实际上否认了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階級矛盾的存在，否认了階級斗争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公开主张和宣揚階級調和。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經指出：“小资产階級的路易·勃朗之流的任务是：抹杀階級利益的差别，劝說资产階級中的某些阶层(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議員)同工人成立‘協議’，劝說工人同資本家、农民同地主成立‘協議’。”^①

由于勃朗故意抹杀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矛盾，因而他也就不可能对资产階級国家的階級实质作出正确的判断。虽然他明了国家是依靠議院、法院和軍隊执行权力的，但是他却不承认国家带有階級性，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工具。他认为“国家是穷人的銀行”^②，政府的任务是給无产者提供劳动工具和购买劳动工具所必須的資金。而国家的領導者應該是由选举产生而主持公道的

^① 《伊·格·策烈铁里和階級斗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頁。

^② 本书第14頁。

好心腸人。

勃朗的这些錯誤思想在他的社会工場方案里得到充分反映。根据这个方案,第一,勃朗象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不是把实现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組織他們,发动他們,使他們成为革命的动力,而是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政府,乞求它发慈悲心,实现他的社会工場方案;第二,勃朗的所謂革命并不是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剝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从而消灭資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并进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影响,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所主张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即在不触犯資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条件下,实行一些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改革。勃朗写道:“……改革社会而不把它推翻;給各种利益指出各种不同的和可靠的方向;……总之,要給将来作好准备,而不是粗暴地和过去一刀两断……”;第三,勃朗想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他所謂的社会工場。这种工場实际上就是小资产阶级梦想的经过改良的資本主义社会。他幻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既可以让資本和資本家继续存在,又可以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既可以让資本家通过預算得到他应得的利潤,又可以使工人不受到剝削,仿佛可以达到狼既吃飽,羊也保全,两全其美的境地。

勃朗的这些錯誤,就在于他根本不懂得,要消灭剝削和压迫,要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摆脱貧困和愚昧的处境,得到真正

的解放，唯一正确可行的道路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针对这一点，列宁写道：“小资产者只是讲讲这种好心的、善意的、空洞的大话，实际上却束手无策地跟着资产阶级跑，口头上对无产阶级表示某些‘同情’，实际上仍然依靠资产阶级，不能够或者不愿了解，只有粉碎资本主义的枷锁，才能使人类摆脱帝国主义。”^① 因此，勃朗的社团方案和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平行四边形一样，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但永远不能实现，而且反而会使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产生幻想，模糊阶级意识，削弱斗争意志，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危害。1848年二月革命的事实证明，即使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组织起来的国立工场，也没有给工人群众带来任何好处。临时政府却反而利用这种工场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制造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仇视，致使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时，陷于孤立无援，起义遭到失败。

勃朗的这本书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们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读它：对其中空想的部分要给予严格批判；对其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的部分，则应视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可贵思想材料。

陈 森

1962年11月

^① 《路易·勃朗主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目 录

序言	2
第一篇	21
I	21
II 对于人民来说,竞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	25
III 竞争是资产阶级崩溃的原因之一	61
IV 被英国的例子所谴责了的竞争	67
V 竞争必然导致法英两国间的一场殊死战	75
結論 按照我们的意见,人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组织劳动	79
对各种批判的答复	90
第二篇 论著作权	160
I 祸害的本质是什么?	160
II 人们所提出的荒谬无效的补救办法	169
III 按照我们的看法,什么是补救祸害的方法	186
附录 从现在起就可以试办的事项	196
規約	199
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的来信和章程草案	202
人名对照表	209

序 言

1847年7月

如果人类需要减轻的仅是一些例外的和个别的痛苦，那么举办慈善事业也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人们的痛苦有着既普遍而又深刻的原因；在我们中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为衣、食、住而感到苦恼。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在这种被人夸耀的文明的怀抱中，人类的半数会陷入这种悲惨的境地和长期的痛苦中呢？

问题是深刻的，它是严重的。它曾引起一些叛乱使遍地流血而没有使世界得到解放。它曾绞尽了世世代代的思想家的脑汁。它曾耗尽了神圣而伟大的牺牲救世精神。两千年来，多少民族跪在十字架面前，把甘心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当作人类的救世主来崇拜。然而，还是有这样多的奴隶！怎么在精神世界中还有这样多的麻疯病患者！怎么在可以看到的和感觉得到的世界中还有这样多的不幸者！怎么还有这样盛行的不义行为！怎么还有这样多的胡作非为的暴徒，逍遥法外而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救世主已经来临，可是人们什么时候才能得救呢？

不过，不要灰心，因为进步的规律是显明的。如果时间是属于邪恶的话，那么它更多地是属于那打击和摧毁邪恶的、人类良心上

的反抗行为，这种反抗行为的形式虽有变化，其原则却永远不变，它是广大无边的、普遍的、不屈不挠的、战无不胜的。

因此，不应该让问题的严重性把我们吓倒，而是要以战战兢兢和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它。一个人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办不到的；只有大家把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加以解决。对做出贡献的人一一加以评定，在整个进步事业中，究竟谁是最优秀的工作者呢？然而，事业在向前迈进，人类的事业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在完成着，而每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即使做错了，也都是为了完成真理的事业而工作。

所以，使自己的智慧注意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物，把科学给予博爱成为火炬，既运用思考又运用感觉，把精神上的警惕和灵魂的力量结合在同一的、仁爱的努力中，使自己对于各民族的前途和上帝的正义具有足够坚强的信念，以便和邪恶的持久性和它那种永存性的幌子进行斗争……难道还有比这样使用时间和精力更有价值的吗？

劳动组织：这几个字我们已经有四五年没有听到了；然而今天却又响遍了全法国。勒德律-洛兰先生^①在报导真实情况而又敢于说话的《改革日报》上曾经说过：“让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命运作一次调查吧！”只此一句，就足以使我们病态的社会大为震动。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研究的主题。今后将不会有和这个问题同样广泛的

^①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1807—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加临时政府。随着无产阶级积极性的发展，他靠近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积极地参加了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的1848年六月起义。——译者注

主題，而以前也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必要的主題。

與進步為敵的人們或那些怀着怯懦心情而愛好進步的人們，是拿什麼來反對我們的呢？他們說，要是在人民還沒有掌握主權以前去和人民大談他們的貧困，也許是冒失而危險的事；他們說，如果給人們以一種唯物的和庸俗的動機來代替那些所謂人類尊嚴、名譽、光榮、勇於為善的自豪、祖國等偉大的動機，那就會把人民局限在自私自利的追求中。

這樣，讓人們知道窮人遭受痛苦和遭受多少痛苦，知道不僅窮人自己受苦，而且他那些註定要去從事一種過早的和致人於死的勞動的孩子也在受苦，他那生育過多而得不到安慰的妻子也在受苦，他那年老的躺在慈善機關的破床上氣息奄奄的父親也在受苦，這時，是否就會使窮人不傾向於追求自私自利的目的呢？同樣，飢餓而憤怒的里昂工人的口號是：不是在勞動中生存，就是在鬥爭中死亡，難道在他們這種令人贊嘆而悲痛的口號中帶有唯物主義的標志嗎？不，不。生存和勞動這兩個最高尚的詞，聯繫着人類的整個命運。因此，如果人們要求通過勞動使生存權利得到規定和保證，那麼人們這樣作，要比和在暴力和危險的壓迫下的千百萬不幸的人進行爭吵更好些：這樣，人們能最全面地和最深刻地理解人生的目的；人們在他的工作中感謝造物主。無論在哪裡，如果依靠勞動而獲得的生活保障不能從社會制度的本質中獲得，那麼，那裡就存在着不正義。但是，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同“不正義”鬥爭，即使全世界受着“不正義”迫害的只有他一個人，他所作的也不會是自私自利的行為；因為在這個時候，他就體現着一切痛苦、一切原則，而且在他的身上就代表着人類。

为了消灭貧困，劳动組織虽然并不指責唯物主义者的偏見，却以体会得最深刻的唯心論为依据。誰都知道，貧困把教育局限到可恥的地步，因而使人們的智慧埋沒在黑暗里。貧困经常使人們牺牲个人的尊严，而且几乎总是由貧困来决定这种牺牲。貧困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貧困就在人类的道德中隐藏着一种新的痛苦，并且把人們内心所具有的慷慨心情变为怨恨。如果說貧困产生痛苦，那么貧困同时也产生罪行。如果說貧困使人进入收容所，那么貧困同时也把人帶到監獄里去。它造成了許多奴隶；它也造成了大多数的窃賊、杀人犯和卖淫妇。

因此，我們希望把劳动組織起来，好实现消灭貧困的目的。消灭貧困，不仅是为了减轻人民物质上的痛苦，而且尤其是为了使每一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尊重，为了不再使过分的痛苦堵塞人們思想上的崇高的志趣和享有正当的自豪感，为了使一切人在教育方面和智慧的泉源里各得其所，为了不再有人受生活轉輪的威胁，遭受奴役，为了不再使儿童成为他的家庭的工資补助收入，为了不再有作母亲的由于无法生活而墮胎，为了不再有年轻的姑娘为获得面包而被迫“出卖爱情的美名”；我們渴望把劳动組織起来，为了使人民的灵魂——你明白了嗎？我說的是人民的灵魂——不致因事态的残酷而受到抑压和糟蹋。

为什么把上帝願意在人身上成为絕對不可分离的东西强行分开呢？因为，人生虽然在它的表象上是双重性的，但是，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对于我們生命中的两种表象之一加以損害时，就不可能不伤害另外一种。我們的肉体受到打击的时候，我們的灵魂不是也在呻吟嗎？当一个乞丐向我伸手求乞时，我就看出他那原有

道德的被迫墮落，而当一个奴隶跪在我的脚边发抖时，我也从他的动作中发现他內心的屈辱。

那么，人的生命为什么不在它每一种方式上都受到尊敬呢？难道人类不是由灵魂和肉体的神秘結合才形成的嗎？

固然，基督教义曾经詛咒我們的肉体，但这种詛咒仅仅是一种对于异教徒那种粗野的风俗的必要的反应。在异教中，暴力胜过智慧，感官胜过精神，这种胜利曾经是长期而野蛮的。基督教义并没有恢复暴力和智慧之間、感官和精神之間的平衡，它使那种斗争继续下去而使智慧战胜暴力，精神战胜感官。这样，它在和原罪、天使的犯罪、天堂和地獄等教义一起，采取了“善”与“恶”的两个原理相互斗争的古代学說之后，把恶的根源放在“物质”之中。但是，是不是应该把基督教义所含有的相对性的、过渡性的东西和它所有的神圣性的和永恒性的东西混为一談呢？是不是应该大声疾呼說：痛苦是永远神圣的呢？

痛苦在使徒身上是神圣的。因为他为了传布新的教义，心甘情愿去忍受极难忍受的穷困和无可名言的劳累；痛苦在殉教者身上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基督的热情的、不可征服的士兵；而痛苦在遁世者身上就不是神圣的，因为他忘記为人类服务而去自动充軍发配，来抒发他那满足自私自利的呻吟；痛苦在教会的修士身上也不是神圣的，因为他只是热衷于用一种无用的慢性自杀来摧残自己的身体——上帝的不可侵犯的作品！

誰不知道滥用基督教的思想产生了多少禍害呢！不論是在天主教的唯灵主义中，或是在异教徒的唯物主义中，同样存在着一种根深抵固的压迫根源。利用精神的名义施行残暴，正像为了肉体

的利益而施行残暴一样；古代那些暴力神道的祭台上所流的鲜血并不比以后在宗教法庭的劊子手下流的鲜血更多。异教徒神化了骄奢淫逸而以过度的欢乐来使肉体退化，天主教则极力推崇修行——用过度的痛苦来摧残肉体。异教徒摧残人们的灵魂，以至使人成为奴隶，天主教轻视人类的物质方面，甚至容忍穷人的存在。

但是，如果有人把构成人的两个因素取消一个，这是和事物本质背道而驰的，也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方面从来就未曾有过一种绝对的理論。在古代神話中，維納斯並沒有排斥米涅瓦^①。天主教会諄諄囑咐人們要克制自己的肉体，同时，它又施展它在世俗的权力，利用冠冕堂皇的仪式，利用塑有降生在馬槽里的神的威严形象的巍峨壮丽的大教堂，最后，还利用圣殿上的音乐和馨香来通过感官向人說教。

的确，人們如果为了精神生活而完全牺牲肉体生活，就必然会損害人类的天性。按照进步的理論来讲，如果承认人类永远应当是“灵魂与肉体”之間的某种奇异和可怕的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和理性相违背的。这一斗争之所以一直保持到现在，是因为社会还没有找到适合它們的道路。可是，一切虚伪的文明所产生的不幸后果是：它在分配劳动和享乐方面所采用的方法极不公允，因而既妨碍着压迫者也妨碍着被压迫者和諧地运用不論是精神上的或肉体上的机能：在压迫者方面，由于給与他們滥用这些机能的便利，而在被压迫者方面，則由于損害他們这些机能的使用。目前应该弄清楚，我

① 維納斯为美和爱的女神，米涅瓦为智慧、学問、战争等的女神。——譯者注

們是否可以相信像这样的不調和的情况終有一天会告結束。为什么在人們身上,協調不能代替对立呢?既然協調是万物的法則,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个人生活的法則呢?如果我们希望解决这个問題,那就不要把它割裂开来。进步的公式具有双重性:通过一切人的自由协作和他們之間兄弟般的团結,使一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进行改善!这是包括在我們祖先五十年前在革命旗帜上所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豪迈的标語中的。

这是何等奇怪而可悲的協調局面!在我們的时代里,特权阶级沉溺在肉欲的享乐里;在奢侈豪华方面,他們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他們除了享乐沒有别的宗教;他們把感官的范围扩大到想入非非的境界;他們认为,怎样使用生命并无意义,而人生的享乐才是一切……当我们为穷人要求确保得到工作、每天的食粮、住所、衣服、爱的权利和希望时,他們却从这幸福的世界内部,从他們玩味着他們自己的哲学的金碧輝煌的寢室深处,要求我們不要为追求实利的唯物主义而呼吁。

有人口头上承认有必要解决社会問題,实际上却认为应该推迟着手研究,认为等到政治革命成功时总来得及处理这些問題,对于这种人,我們是不能理解的。怎么!我們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去了解如何利用这个政权!怎么!还没有确定所要达到的目标,就应该行动!

假如有人认为革命是一时的冲动,那就大錯特錯了。只有預先定好了确切目标的革命,才不致中途流产。

請看1789年的資產阶级革命吧!当革命爆发时,人人都应该能够訂出它的綱領。这一次活生生地从百科全书、即从十八世紀思

想的伟大实验室里产生出来的革命，在1889^①年，只須在实际上去占领精神方面早已征服了的障地。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当时的第三等级^②竟然觉得可以不用立法者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人们到处喊着：“给予确定的委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每个人的思想中，革命的目的已经完全确定了。人们知道应该作什么；知道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用什么方法去作。让我们翻开这一时代著名的文献吧：整个的革命都记载在这里边了；1791年的宪法，只不过是这些文献的一个忠实的摘要。同时1789年的革命是何等坚强地建立起来的，它在社会中扎的根又何等地深入！国民议会^③的风暴徒然掠过这次革命；帝国^④徒然以占领到的很多城市和战场上获得的很多次胜利来使这个革命失色；复辟利用对人们起最重大作用的一切政治迷信和宗教迷信来与这次革命竞争也是枉费心机；这次革命在国民议会、帝国和复辟的混合废墟上又重新出现了。1830年的革命是属于这条锁链的，而1789年则是这条锁链的头一个环节。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在1789年开始的；1830年则是它的继续。

相反地，请您看一看1793年的革命吧！它持续了多久呢？它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呢？可是负责使它取得胜利的那些人曾使用多么大的力量、多么大的胆量和天才啊！从革命高潮到恐怖时期，该

① 这里原书上的年代可能有错误，不是1889年，而是1789年。——译者注

② 这是指1789年5月5日开幕的法国三级会议中的那些平民阶级的代表而说的。
——译者注

③ 是1792年9月成立的法国革命的最高政权机构。——译者注

④ 法国于1804年3月18日实行的第十二年宪法宣布法国是帝国，推举拿破仑为法国皇帝。——译者注

有多么巨大的努力、多么令人可惊的活动、多少精力投到这次行动中去啊！为了服务于新的学说，曾使用了多少旧的工具，从将军的宝剑到行刑员的钢刀；但是，这次革命的纲领是国民议会的成员以问答方式所制定的，这次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事先早已确定了的。罗伯斯庇尔^①和圣-茹斯特^②的任何一种大胆提出来的学说事先在国内都没有充分地酝酿过。让-雅克·卢梭^③虽曾发表了她的《社会契约论》；但是，这个伟人的呼声大半消失在被资产阶级政论家们所充塞的十八世纪的喧嚣聒声之中。所以就必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必须在几天内就创造出来；必须在空前高涨的反抗和愤怒的情况下创造出来。必须仓猝应付并向热情去求得信念还不能提供的支持。必须使以往的工作所未能说服的那些人惊奇、振奋、陶醉和驯服。由此就产生了无数的困难，造成了可怕的和血腥的错误，而兄弟般的联系则突然被刽子手所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这些斗争使人头相继地落在同一个不幸的断头台盘里，丹敦^④的头继韦尼奥^⑤的头而落入，罗伯斯庇尔的头落在丹敦的头上。

①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1793年6月—1794年7月)的革命政府首脑，后被判处死刑。——译者注

② 路易·安都昂·圣-茹斯特(1767—1794)，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和拥护者。——译者注

③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哲学家和作家，《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的思想对于法国的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译者注

④ 乔治-雅克·丹敦(1759—1794)，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也是雅各宾党党魁之一，他和一部分丹敦分子于1794年4月5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译者注

⑤ 比埃尔-维克多里恩·韦尼奥(1753—1793)，法国政治家。他和吉伦特党人一起被捕，死于断头台上。——译者注

讓我們記住这个充滿着教訓的时代吧！我們永远不可忽視“方法”和“目的”；我們不但不該避免对各种社会学說的討論，而且要尽可能引起我們所有的爭論，以便我們一旦有了力量，不至于张皇失措，而知道如何来領導这个力量。

但是，人們會說出很多的錯誤思想，會宣揚很多的幻想；這有什么可以說的呢？難道人們可以一下子就得到真理嗎？當他們沉浸在黑暗中時，為了到達光明之境，他們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前進，難道因而就應該禁止他們去尋求光明嗎？你們准知道人類在你們所說的那些幻想中不會得到任何益處嗎？你們准知道今天的幻想十年後不會成為真理嗎？你們准知道為了十年後實現那個真理，今天就不必來嘗試這種幻想嗎？無論哪種學說，政治學說也好，宗教學說或社會學說也好，在它初產生的時候，總是反對者多於擁護者的，正如，只有在犧牲了很多人以後才能征募到幾個勇士那樣。所有那些有力地支配過人們的思想，在沒有被認為是明智的以前，不是都被認為是狂妄的嗎？

一個新的世界是誰發現的？

一個到處受人嘲笑的瘋子。

在浸濕了他的鮮血的十字架上，

一個死去的瘋子却給我們留下了一位真神。

我們不要盲目地接受那些輕浮的思想家的意見，把它們當作那么多的預言來對待；我們要慢慢地、謹慎地、甚至抱着不信任的態度去尋求真理，沒有比這樣做更好的了。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把大胆的思想家擯棄在大門之外呢？一支在陌生地區進軍的軍隊，需

要有偵察的先頭部隊，儘管他們中間有些人會迷失道路，但仍然是需要他們的。啊！大胆的思想在今天並不很多，人們大可不必把生動的智慧凍結起來，使勇氣遭受挫折。

那麼你們擔心些什麼呢？擔心人們把關於無產階級的地位以及關於改善這種地位的方法的一些錯誤觀念灌輸給別人嗎？如果這些觀念是錯誤的，那麼經過討論，錯誤就會消失，像風吹走摻雜在谷粒中的草屑一樣。

你們還擔心些什麼呢？擔心某些大胆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會攪亂人心，妨害政治改革的成功嗎？但首先要問，難道普選問題和人民的真正主權問題，在法國不使任何人害怕嗎？不以有力的論證指出這種恐懼心理的幼稚和毫無根據，還想在那裡做些什麼事呢？啊！在各黨派中最使人害怕的並不是人們所說的東西，而是人們所不說和不肯說出的東西。未知的事物？這就是使人，尤其是使懦弱的人感到害怕的。假使民主黨採取科學方法把迷失方向的工業從可怕的混亂中拯救出來，難道會有人控告他們推行工業暴動嗎？當民主黨證明資本的不斷集中有可能使資產階級受到工人階級所忍受的同樣的壓迫時，是否有人會以資產階級的那種盲目的反感來反對民主黨呢？

讓我們再補充說明，為了使政治改革運動在人民中間獲得許多擁護者，那就必須向人民指出改善他們的精神生活或物質生活條件和變更政權之間的關係。在各個時代里，這就是人民的真正的朋友或是那些替人民復仇的人所曾做過的事情。這就是從前在羅馬的那些人所曾做過的事情，這些人看到被殘酷地迫害的可憐的債務人而動了惻隱之心，他們就把大多數人帶到阿溫庭山上

去。①不朽的蒂伯里尤斯·格拉古斯②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他是
对罗马贵族的掠夺的有力揭发者，他对着那些面色苍白的世界的
征服者喊道：“人们称你们是全世界的主人，可是你们却没有一块
可以用来枕头的石块。”渔夫马萨尼埃洛③在1647年也这样做了，
他在因西班牙总督的穷奢极欲而陷于饥饿的那坡利城中喊道：“拒
绝交纳盐税！”最后，在五十年前，一些狂热的哲学家——勇敢的思想
战士——也这样做过，他们只是因为出生过早而在执行任务中
牺牲了。谁想来领导人民，人民就有权询问他要把他们引导到何
处去。过去已经发生得太多的是，人民只为几句话而骚动，在黑暗
中进行战斗，在受人嘲笑的忠诚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并轻率地流
出热血为野心家铺平道路，这些野心家头一天晚上还是民主主义
的宣传家，第二天就变成压迫者了！

但是，倘若需要从事社会改革，也就少不了要推动政治改革。
因为，假如社会改革是目的，那么政治改革就是手段。单纯发现通
过运用社团的原则以及按照理智、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法则来组织
劳动的科学方法，那是不够的；还应该准备怎样实现所采用的原
则，并通过研究使方法丰富多彩。要知道，政权就是组织起来的
力量。政权依靠议院、法院、军队；也就是说，依靠法律、裁判和刺
刀的三重权力。不夺取政权作为工具，那就会遭受它的阻碍。

① 古罗马所在的七大丘陵之一。古罗马平民与贵族坚持斗争时，曾退守该地。
——译者注

② 蒂伯里尤斯·格拉古斯(公元前163—133)，古罗马的政治家，奴隶制时代民主
政治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③ 马萨尼埃洛(1623—1647)，意大利渔夫，1647年那坡利人民起义的领袖，主要
反对西班牙统治。他被起义者拥为那坡利的执政者，组织了人民军。后来被西班牙总
督所派遣的凶手刺死。——译者注

况且，解放无产阶级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工作，它牵涉很多问题；它打破许多习惯；它不在实际上而在表面上反对很多利益，因此，如果认为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局部努力和孤立的尝试获得成功，那是妄想。它必须运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无产阶级为了解放自己，所缺少的就是劳动工具。政府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提供劳动工具。如果要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给国家下个定义，我们的回答是：国家是穷人的银行。

现在，难道我们的思想真像德·拉马尔丁^①先生在最近的宣言中敢于肯定的那样，“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取得工业和劳动的所有权和主权；就是取缔公民之间的一切占有、出售、购买、消费的自由活动；就是去武断地制造或分配产品；就是规定最高限价；就是规定工资；就是在一切方面把工业和财产所有者的国家来代替被剥夺了财产的公民”吗？

我们从来也没有提倡过这类事情！如果德·拉马尔丁先生是针对我们而驳斥的，那么他可能没有赏光阅读过我们所写的东西。如同下面大家会看到的那样，我们向国家——当国家是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要求建立社会工场，这些工场将逐渐地而不是突然地代替私人工场；我们要求社会工场由实现社团原则并具有法律形式和强制力的章程来加以管理。但是，社会工场一旦建立起来并开始活动时，它本身就足以给自己解决问题，并只从属于它自己的原则了。社团的工人，在第一年后，可以自由地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员和领导；他们彼此商量如何分配盈利；他们专

^① 阿尔芳斯·德·拉马尔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译者注

心致力于扩大已经开办的企业……試問人們从什么地方看得出这种制度会給独裁和暴政大开方便之門呢？国家創辦社会工場，給它制定条例，监督条例的执行，凡此种种都是以大家的名义为大家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国家的任务也就以此为限。难道这样的任务能够算是暴政嗎？今天，当政府因盜賊侵入一所房屋而加以逮捕时，能因此就譴責政府是实行暴政嗎？难道能譴責政府侵犯了个人生活的范围，干涉了家庭内部的事情嗎？好吧；在我們所主张的制度中，国家对社会工場所做的不过就是它今天对全社会所做的事情。它維護社会工場的規章不受侵犯，正如它今天維護法律不受侵犯一样。国家是社团原則的最高保护者，它不能随意并吞加入社团的工人的股份，正像它今天是私有制原則的最高保护者，并不沒收财产所有人的股份一样。

但是，从首倡精神來說，我們岂不是让国家干預了社会的经济改革嗎？我們的公开目的不就是为了消除竞争，把工业从放任主义和不干涉主义下解放出来嗎？这是毫无疑問的；我們不但不避諱，我們还高声宣布这个观点。为什么？因为我們渴望自由。

是的，自由！这就是我們應該爭取的东西；但必須是真正的自由，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的自由，这种自由在沒有它不朽的姐妹——平等和博爱的地方，是怎么也找不到的。

如果我們問，为什么野蛮情况下的自由被认为是假的和遭到破坏了的自由，那么，任何一个孩子都会以应有的回答来答复我們。野蛮情况下的自由事实上只是一种无情的压迫，因为它是同力量的不平等混在一起的，因为它使弱者成为强者的牺牲品，使虛弱的人成为敏捷的人的战利品。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中，我們

所看到的是发展的手段方面的不平等，而不是体力上的不平等；是資本与資本的斗争而不是肉搏；是特有的优势的滥用，而不是体力上的优势的滥用；是无知的人而不是软弱的人，是穷人而不是虚弱的人。所以，哪里还有自由呢？

对于那些拥有享受自由和扩大自由的手段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拥有土地、金錢、信貸和因为受过智力的训练而足智多謀的人来说，自由肯定是存在的，甚至是容易滥用自由的；但是，对于那个既沒有土地、金錢、信貸又沒有文化的人数众多而又令人注意的阶级，也就是說，对于那些毫无办法可以自給、毫无办法可以发展个人特长的人来说，难道也是这样的嗎？当社会是这样分成两部分，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极端无能为力的时候，人們就在社会中間展开了竞争，这就是富人与穷人、狡猾的投机者与天真的劳动者、手头寬裕的銀行家的主顾与受着高利貸者的压迫的奴隶、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大力士与手无寸铁的战士、行动灵活的人与四肢瘫痪的人进行交鋒的竞争；这种强者和弱者的乱糟糟的持久的冲突，这种从事压迫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形的事实上的暴政，在残酷程度上是那些明显的、可以捉摸的、以表面上仁慈的面目出現的暴政所永远赶不上的。……这就是人們竟敢把它叫做自由的东西！

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由于飢餓逼人，不得不走出学校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出卖給附近的紡織厂，以便使父亲的收入多加几文錢：試問这样的孩子在知识方面还有受到培育的自由嗎？

如果討論劳动条件的辯論继续下去，工人就得餓死，試問他还有討論劳动条件的自由嗎？

处在竞争的这种混乱状态中，工人不得不眼看到支配着他的不是他自己的远见和智慧，而是竞争所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来的每一种混乱局面：未来的破产、订货的取消、发明的机器、工厂的倒闭、工业恐慌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还有什么机会可以避免厄运吗？

失业的按日计工的工人既然没有住所，他还有不睡在街头的自由吗？

刚刚失掉工作的穷人家的女儿，只有在卖淫和挨饿之间选择自己的出路，试问她还有保持贞操和纯洁的自由吗？

有人说过，在我们今天，再没有比成功更大的成就了。这是真实的，并且这就足以去谴责这句名言所说明的社会秩序了。因为一切关于正义和人道的概念都是颠倒了的，在这里，越不需要财富的人越容易发财，越贫困的人就越难避免穷困。你是由于出生的偶然性而注定毫无所有的吗？那你就得劳动、受苦、死去。穷人是借不到债的，而且放任主义的学说使穷人注定是要被人遗弃的。你是生在富豪之家的吗？那你就过好日子，可以过寻欢作乐的生活，可以睡大觉：你的钱在替你挣钱。再没有比成功更大的成就了！

但是穷人不是有权利改善他的地位吗？如果他沒有权力，那又该怎么样呢？有要求被治好的权利，对于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人来说，有什么用呢？

抽象地設想的权利是1789年以来对受欺人民的一种幻景。权利成为抽象的和不发生作用的保障，这种保障代替了应该给予人民的那种发生作用的保障。在宪章中冠冕堂皇地和空泛地在法令

里宣布了的權利，只是用來掩飾採用個人主義制度所造成的一切非正義的東西以及把窮人拋棄不顧這一事實所具有的一切野蠻性。就是因為人們用權利這個詞來界說自由，所以就把飢餓的奴隸、寒冷的奴隸、愚昧無知的奴隸和生活無保障的奴隸叫做自由人。所以讓我們斬釘截鐵地說：自由不僅是所賦予的權利，而且包含在賦與人們在正義的統轄和法律的保護之下去運用並發展個人才能的權力中。

人們應該注意的是，這並不是一種無意義的區別。這個區別的意義是深遠的，它的後果是巨大的。因為，只要承認，為了使人真正自由，必須給他運用和發展個人才能的權力，其結果是社會自然就應當使它的每一個成員都受到教育，因為沒有教育，人類的智慧就不能發展；同時社會也應當使它的每一個成員都得到勞動工具，因為沒有工具，人類的活動就不能充分發揮。但是，如果社會不通過國家來給它的每一個成員以適當的教育和必要的勞動工具，那麼要通過誰的手來給呢？所以我們是以自由的名義並為了自由的好處才要求恢復法權的原則的。我們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因為我們還無聊地生活在不平等的制度下，在這種制度下還有一些弱者需要社會的力量來保護他們。我們願意有一個干預工業的政府，因為除了把貸款借給富人以外，應該有一個借錢給窮人的社會銀行家。一句話，我們所以求助於權力的觀念，那是因為有前途的自由應該成為一個事實。

此外，大家千萬不要弄錯：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是相對的；這種必要性完全是從過去的暴政使人民所處的那種軟弱、貧困、無知的狀態而來的。倘若有一天我們內心的最美好的希望沒有落空，那

么不再需要强有力的和积极的政府的那一天就会到来，因为那时社会上再没有低级的和弱小的阶级了。在那个时候以前，建立一种监护的权力机关还是必要的。只有通过政治的培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壮大起来。

啊，富人！如果有人煽动你们起来反对那些为了平静地、和平地解决社会问题而彻夜焦思的人们，那是人家在欺骗你们。是的，穷人们的这个神圣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一种以天意为根源的休戚与共的关系通过恐惧把你们和他们的贫穷连结起来，并且通过你们本身的利益，把你们和穷人们未来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只有他们的解放才能给你们打开你们至今还不知道的安享欢乐的宝库；而博爱的精神力量又如此巨大，以至他们痛苦的减少就必然会增加你们的快乐。有人对你们说：“当心啊，当心无产者起来进行反对有产者的战争！”啊！倘若这种邪恶的战争确实是可怕的，天呀！那么对于孕育这种战争的社会秩序又应当怎样设想呢？可怜的诡辩家们！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所结结巴巴地辩护的制度，既然有它值得他们担心的缺点，将是一去而不复返的！否则该是怎样呢！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将蒙受那样过分的痛苦，心里蕴藏着这么大的仇恨，而且，在社会的深处，存在着一种这样强烈的反抗情绪，以致一说出博爱——基督所说的——这个词，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冒失行为而成为某种新暴动的信号！不：放心吧。只有在不准许言论自由的地方才需要害怕暴力。没有比通过讨论更能保障秩序了。感谢上天，今天人民了解到，即使愤怒有时可以惩罚罪恶，它却不会产生好事的；人民也了解到，盲目而粗暴的急躁只能导致破坏的废墟，而正义和博爱的思想种子则将被淹没在

这些废墟之下。問題不在于使財富更換主人，而是在于使它丰富，成为普遍所有。問題是要毫无例外地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

第一篇

I

路易十一在沒有几天好活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无限的恐怖。他的侍臣們在他面前再也不敢說出可怕而又不可避免的“死”这个字了。至于他本人，似乎只要不提到死亡的临近就能够逃避死亡似的，他可怜地强行使他那黯然无光的眼神中閃耀出假装欢乐的亮光来。他設法隱藏他那憔悴的臉色。他走路时尽量不东搖西晃。他向他的御医說：“喂，你看，真的！我的身体从来沒有这样好！”

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它感觉到死亡，却否认自己的沒落。由于它被那些关于它的財富的謊言和行将消失的外表强大的夸耀所蒙蔽，它就幼稚地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且即使陷入了极度困难，它还在自我夸耀！近代文明社会的那些特权人物好像这个斯巴达的儿童那样，他把狐狸藏在袍子下面，当狐狸咬他的肚腸时，他还在嘻笑^①。这些特权人物也装出一副笑臉，强作欢乐。但是内心怔忡不安，焦虑不定。他們的狂欢节日籠罩着革命的阴影。

貧困虽然只是在远离他們居住的地方打了几下轻微的和不喧鬧的警钟，穷人虽然在他們寻欢的場所躲开；可是他們对于自己所

^①希腊的传说，有一个斯巴达男孩偷了一只狐狸，教师来了，他把狐狸藏在衣服里。狐狸咬他，他坚坐不动，終被咬死。——譯者注

怀疑的或所猜测的东西感到烦恼。如果人民毫无举动，他们就苦恼地担心那个随后将要来到的时刻。当叛乱的消息消沉时，他们就竖起耳朵倾听阴谋的消息。

我要问，谁真正关心保持像现今所存在的社会秩序呢？谁也不想。是的，谁也不想。就我来说，我自己相信有缺点的文明所造成的那些痛苦，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遍及整个社会。试深入了解富人的生活，它是充满着苦恼的。这是为什么呢？是他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青春、没有谄媚奉承他的人吗？是他不相信他自己有朋友吗？但是他乐极生悲，这就是他的痛苦；他已穷奢极欲，这就是他的不幸。在丰衣足食中的无能为力，这就是富人的贫乏，没有希望的贫乏；在那些我们把他们叫做幸福的人当中，该有多少人是由于需要刺激而进行决斗的啊！该有多少人不辞疲劳、冒着打猎的危险来逃避他们闲居无事的苦楚啊！有多少人的感觉已成病态，慢慢地在一些神秘的创伤中死去，而在一般的疾病情况之下，就在表面的幸福怀抱中，也会逐渐地折磨不起啊！除了那些把生命当作苦果而把它抛弃了的人们以外，这里是一些把生命当作干瘪了的桔子而把它扔掉的人们：哪一种社会的紊乱能不暴露这种广大的精神上的错乱啊！生活享受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这种以痛苦的平等为结局的情况，给与自私、骄傲和一切残暴多么严厉的教训啊！

其次，每有一个因饥饿而面色苍白的穷人，就有一个因恐惧而吓得面色苍白的富人。瓦尔都小姐向拯救了她的一位老乞丐说：“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打算对我们的恩人作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使您的晚年不再感到经济拮据。在还没有这样办以

前，請您接受这点小东西吧！”乞丐回答說：“您这样作，是叫我不知在哪一天夜里，我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去的时候，遭到搶劫和杀害，要不然就是使我为此而担心害怕，这也不見得好些！唉！要是人家看見我兌換一张鈔票，以后誰还那么胡塗，肯向我施舍呢？”

令人惊叹的对話！瓦尔特·史谷脫^①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位小說家了：这是一位哲学家，这是一位政論家。我們知道有一个比瞎子更为不幸的人，这个瞎子在那里向人乞錢，听到他求乞得到的小錢在他的小狗面前的鉢中发出响声，而更不幸的就是一位有势力的国王，他因为自己儿子的年俸遭到駁回而咳声叹气。

但是在哲学概念方面是真实的東西，难道在经济概念方面就不真实嗎？啊！感謝上帝，对于社会來說，既沒有部分的进步，也沒有部分的墮落。整个社会上升，或者整个社会衰落。正义的法則被人們了解得更好些，岂不就会使各个阶层都因此而得到利益嗎？正义的观念在人們脑中变得模糊不清，岂不是每个阶层都会因此而感到痛苦嗎？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有一个阶级受压迫，这就好像一个腿部受了伤的人，受伤的腿必将妨碍那只健康的腿的一切动作。这样，尽管这一說法显得有些奇怪，但是如果消灭压迫，則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双方都可以获得利益；如果維持压迫，則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双方同样不利。人們願意得到一个更明显的证明嗎？资产阶级在无限制的竞争——残暴的根源——上建立了他們

^① 瓦尔特·史谷脫(1771—1832)，英国杰出的小說家和詩人。生于苏格兰。他的长篇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日常生活和习俗。他的著作对欧洲历史长篇小说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譯者注

的統治。好吧！我們今天見到資產階級正因为这种无限制的竞争而灭亡。你也許要說，我有两百万法郎，我的对手只有一百万，在工业的競爭場上，我用降低物价的武器，稳稳地可以使他破产。好一个卑劣而愚笨的人！难道你不明白明天就要有某个冷酷无情的罗特希尔德^①用你自己的武器武装起来来对付你，使你破产嗎？試問你将有什么顏面埋怨他呢？在这种每天进行着斗争的可詛咒的制度中，中等工业已经并吞了小工业。“皮洛士^②式的胜利”！因为这次也輪到中等工业被大工业所并吞，而大工业本身由于被迫要到世界的尽头去追逐那陌生的消費者，不久就将成为一种冒险的賭博，这种賭博和其他的一切冒险的賭博一样，对于一些人結果是詐欺，而对于另外的一些人則将是自杀。暴虐不仅是令人厌恶的，而且还是盲目的。沒有心腸的地方不会有智慧。

所以我們证明：

1. 对于人民來說，竞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
2. 对于資產階級來說，竞争是不断起着使人貧困和破产作用的原因。

这种证明一经成立，就将清楚地得出这样結論，就是一切利益都是互相有連帶关系的，并且，社会的一次改革将无例外地成为全体社会成員的一种得救的方法。

① 麦耶·安塞尔姆·罗特希尔德(1743—1812)，德籍犹太銀行家，他是財政寡头族系，罗特希尔德家族的始祖。这个家族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里控制了許多工业企业、铁路、保险公司。——譯者注

② 皮洛士(紀元前319—272年)，伊比魯斯国王。反对羅馬……在阿斯居陆姆的战役中他虽然获胜，但損失极重，耗尽了全部力量。“皮洛士式的胜利”被用來說明得不偿失。——譯者注

II 对于人民来说,竞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

穷人是社会的成员呢,还是社会的敌人? 请答复吧!

他发现在他周围所有的土地都被人占据了。

他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而播种土地吗? 不能, 因为优先占有权已变成所有权了。

他能摘取人行道上由上帝的手使它们成熟的果实吗? 不能, 因为果实和土地一样, 也被人所占有了。

他能够打猎或捕鱼吗? 不能, 因为这已成为须经政府批准的一种权利了。

他能够从田地里的水源中汲水吗? 不能, 因为田地的所有人根据附带权利就是水源的所有人。

当他由于饥渴而奄奄一息时, 能够伸手向他的同类乞怜吗? 不能, 因为有禁止行乞的法令。

当他累得筋疲力尽而没有地方休息时, 他能够睡在街道上吗? 不能, 因为有取缔流浪者的法令。

他能够逃出这个使他到处碰壁、使他无法生存的祖国, 远离他生身之地而到异乡去谋生吗? 不能, 因为只能在某些条件下才能准许迁移, 而这些条件是他所不可能具备的。

那么, 这个不幸的人该怎么办呢? 他将对你说: “我有胳膊, 我有智慧, 我有力量, 我还有青春; 你可以把这一切都拿去, 作为交

換，請你給我一點麵包吧！”這就是今天無產者所作的和所說的。但是甚至在這裡你還可以向窮人回答說：“我沒有工作給你做。”那麼，你要他去作什麼呢？

這種情況的後果極其簡單。你得保證窮人得到工作。對於正義來說，你作得還是不多，而且，離博愛精神還很遠；但是，至少，你不是就可以防止可怕的危險並阻止叛亂了嗎？人們對這件事情有沒有好好地想過呢？一個要求為社會服務而生活下去的人，在被迫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攻擊這個社會時，從表面看來是犯着侵犯的行為，但實際上是處於正當防衛的地位，而對他打擊的社會，並不是對他進行審判而只是在暗殺他。

因此，問題是這樣：競爭是不是一種保證窮人得到工作的方法呢？但是把問題這樣提出來，就等於把它解決了。對於勞動者來說，競爭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拍賣勞動。一個企業主需要僱用一個工人：前來的則有三個——你的勞動要多少錢？——三個法郎：因為我有一個妻子和許多孩子。——好。你呢？——兩個半法郎：因為我沒有孩子，我只有有一個妻子。——好極了。你呢？——我只要兩個法郎就夠了：因為我是獨身漢。——那麼我就優先僱用你吧。這就完了，交易已經講妥了。然而那兩個被排擠的無產者將有什麼遭遇呢？他們只好讓自己餓死，人們只能希望他們這樣。但是，如果他們去偷東西呢？那你一點也不用害怕，因為我們有警察。如果他們進行謀殺呢？那麼我們有劊子手。至於說到三個人中最幸運的那一個，他的勝利也僅是暫時的。如果來了第四個勞動者，強壯得足以每兩天中可以挨餓一天，跌價就要跌到無可再跌的地步，于是就造成新的流浪者，或許又給監獄製造一個新

犯人！

人们是不是将要说，这些惨痛的结果说得过分夸大了，并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只有当工作的职位不够分配给要求得到工作的人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上述那些惨痛的结果呢？我也要问一下，是不是竞争本身恰巧具有一种因素，可以防止这种害人的不平衡呢？如果某种工业劳动力不足，那么谁又能向我保证，在这个由于世界性的竞争而产生的巨大混乱中，其他某种工业不发生容纳不下劳动力的情况呢？可是，在三千四百万人中，只要有二十个人被迫去靠偷盗为生，这就足以对这竞争的原理作出谴责了。

可是，还有谁会这样盲目，甚至一点也看不到，在无限制的竞争的影响下，工资的不断下降已成为一种必然是普遍的事实，而丝毫没有例外呢？是不是人口有它不能逾越的界限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向被个人自私自利的偏见所掌握的工业说，向这个发生过很多沉船事件的大海似的工业说，“你不要太过分了”呢？人口不断地在增加：那么，你该命令穷人的母亲变成不能生育的，你也该诅咒那使她怀孕的上帝；因为你不这样作，对于战斗员来说，练兵场很快就将过于狭窄了。发明了一部机器，你该命令人们把它砸毁，你也该诅咒科学；因为，如果你不这样作，被新机器从工厂中逐出去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就要去敲邻近工厂的大门，并使他们的伙伴的工资降低。工资经常地下降，结果是淘汰了一定数目的工人，那就是无限制的竞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竞争仅是工业上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却迫使无产者互相歼灭。

此外，为了使严格的思想家不致责备我们过事渲染起见，下面就是用数字表达出来的巴黎工人阶级的情况。

人們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一些妇女,每天所得不超过七十五生丁,而且在一年之内,仅有九个月有工作,这就是說,有三个月她們毫无所得,如果人們願意把她們的工資按全年平均計算,那么每天大約只有五十七生丁了^①。

妇 女 劳 动 力

职 业 名 称	每日工資		淡 季 月 数	备 注
	法郎	生丁		
洗衣工	2	0	4	工作場所不卫生
綉鞋工	0	75	3	
装釘工	1	50	3	
各种綉工	1	50	4—5	
金屬打磨工	2	25	5	
磁器打磨工	1	75	5	
紙牌制作工	1	50	3	
紙板制作工	1	50	3	
制帽工	1	25	4	
蜡烛制造工	1	25	4—5	
织袜工	1	0	0	
塗色工	1	25	4—5	每日工作13小时
草帽編织工	2	0	6	
縫衣工	1	50	4	
縫被工	1	25	4	每日工作14小时
面紗裁切工	1	25	5	
木制品塗金工	1	50	5	
往书中插入图画的女工	1	25	5	
鈕扣制造工	1	25	4	
花匠	1	75	5	

① 下列資料是我們用极其慎重的态度搜集起来的,誰也不能責备这些資料有夸大之处,資料是由設在巴黎的830所工場的职工中的1,500多名男女工人那里获得的。

当然:在每种行业中,我們都采取了所得到的数字的平均数。

窗飾繩子制作工	0	75	3	
縫制手套工	1	25	4	
上衣与褲子裁縫工	1	50	4	
为商店制作衬衣女工	1	0	0	
女用帽子裝飾品制作工	2	0	4	
女用帽子制作工	1	50	4	
金銀綫編織品制作工	1	50	4	
紡綫工	1	0	3	
黄金钻孔工	2	50	6	
縫靴工	1	50	4	
羽毛物制作工	1	50	4	
罗盘打磨工	2	0	4	
銀器和珊瑚打磨工	2	25	6	
紡綫断头接线工	0	90	3	
旧衣修繕工	1	25	3	
熨衣工	2	0	3	工作場所不卫生
染色工	2	25	0	
挂面制作工	1	50	4	

男 劳 动 力

职 业 名 称	每日工資		淡 季 月 数	备 注
	法郎	生丁		
草帽制作工	4	0	7	
銀匠	3	0	3	
軍械制造工	4	0	4	
金叶工	3	50	3	
金首飾制作工	3	75	5	
屠夫(童工)	3	0	3	
面包制作工	3	75	3	
馬具工	2	25	3	
制造鈕扣工	2	75	3	
制帽工	3	50	5	
制腊腸工	1	0	4	供伙食
木工	4	50	4	工作場所有危險性

制車工	3	0	5	
金屬雕刻工	3	50	4	
排字工	3	50	3	
糖果制造工	3	50	5	
制鞋工	2	75	3	
硝皮工	4	0	4	
制刀工	3	0	3	每日工作13小时
修屋工	4	50	4	工作場所有危險性
木器鍍金工	3	0	3	每日工作16小时
金屬品鍍金工	3	75	4	工作場所因有水銀而帶危險性
紫檀木細作工	3	0	3	
雕象印刷工	3	50	4	
罗盘制作工	4	0	4	
玳瑁眼鏡制作工	3	0	6	
雨伞制作工	3	0	4	
钢琴制造工	4	0	3	
白铁制造工	3	25	3	
鉛字铸造工	3	50	4	
炼銅工	4	25	3	工作場所有危險性
炼铁工①	4	0	3	工作場所有危險性
打铁工	4	0	3	鍍工每日工資为 2 法郎50生丁
暖炉工	4	0	6	
手套制作工	3	50	0	
钟表工	4	0	4	
鉛字印刷工	4	0	4	
布匹印花工	4	25	4	
石刻印刷工	3	25	4	
画片印刷工	3	50	4—5	
雕刻銅版印刷工	4	0	4	} 每星期有 1 法郎25生丁的供应品
乐譜印刷工	3	25	4	
灯类制造工	3	0	4	
箱类制造工	3	0	4	

① 每一个工人配合 4 名苦力，他們的工資每人每天 2 法郎50生丁。

泥瓦工及其同行①	4	0	4	
建筑用大理石切磨工	4	0	4	
摆钟用大理石切磨工	4	25	3	
蹄铁工	2	75	3	
建筑物细木工	3	0	4	
靠手大椅子细木工	3	50	3	
光学器械制造工	3	0	6	
金银品细工	3	0	6	
金银线编织品制作工	3	0	4	
铺石工	4	0	4	非熟练工每日工资2 法郎25生丁
房屋油漆工	3	50	5	
车辆油漆工	2	75	5	
假发制造工	0	85	0	营养不良，睡眠不足
水电工	4	50	4	
烧瓷工	3	75	0	
装钉工	3	0	3	
马具制造工	2	75	5	
建筑物用锁工	3	50	4	
玻璃品吹型工	4	25	3	工作场所有危险性
铅版印刷工	4	0	3	
缝衣工	3	0	5	
凿石工	4	25	4	
硝皮工	3	50	4	
地毯工	4	0	4	
洗染工	3	0	4	
染丝工	3	50	0	
铁板制造工	3	50	3	
木桶制造工	3	0	3	
木器物品车工	3	50	4	
马车制造中之车工	3	50	4	
铜器物品车工	3	75	4	
油漆工	4	25	4	

① 非熟练工每日2法郎50生丁——童工有6个月每日为2法郎40生丁；有两个月每日为2法郎10生丁。

在这些数字中，每一数字代表着多少眼泪！多少沉痛的呼声！多少强烈地压抑在内心深处的诅咒！这就是住在巴黎的人民的情况！这座学术的城市、艺术的城市、文明世界的万丈光芒的首都；此外，这座城市的面貌，只是极其真实地反映了夸张得这样厉害的文明的各种丑恶的对比：华丽的林蔭行人道和泥濘的小巷，灯火辉煌的商店和阴暗的工場，蕩漾着歌声的劇場和阴森黑暗、里边正有人在哭泣的陋室，胜利者的纪念碑和溺死者的停尸室，凱旋門和验尸所！

在大城市里，某些人的豪华无时无刻不在侮辱其他人的貧困，可是大城市却对乡村有着很强烈的吸引力，这的确是一件突出的事。事实是这样存在着的，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就是工业在和农业进行着竞争。一家忠于当前社会秩序的日报，新近轉載了一位教会首长——斯特拉斯堡^①主教——的文章，在他的笔下流露出下列几行悲惨的詞句：“一个小城市的市长曾经向我說过：‘从前我用三百法郎就可以支付我的雇工的工資；現在我需要一千法郎才刚刚够。我們如果不把他們的按日工价提得非常高，他們就用离开我們而到工厂里去劳动来威胁我們。但是，农业是国家的真正財富，它多么不該遭受这种情况的損害啊！我們看到，如果工业信用发生动摇，如果有一个企业倒閉，那么突然就会有三四千憔悴的工人，由于无工可作，无飯可吃，需要国家来負担他們的生活。因为这些不幸的人們完全不懂得为了将来而节约：每星期都把他們劳动所得花得一千二淨。而革命时期正是破产最多的时期，在

^①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部的城市，在阿尔薩斯，下萊茵省的行政中心。铁路枢纽站。——譯者注

这时期中，这些挨饿的工人们突然从不节约而沦为赤贫，试问这批人怎么不影响到公共安宁呢！他们甚至无法把自己的劳力出卖给土地耕种者了；他们的衰弱了的胳膊，由于不再习惯于田间的笨重劳动，也不再有多大气力了。”

所以，大城市不仅成为极端贫困状态的发源地，而且还必须把乡村的人口以不可抗拒之势吸引到这些发源地而把他们吞没掉。并且好像是为了帮助这种不幸的运动似的，人们不是在各处修建铁路吗？因为在一个妥善组织起来的社会里，铁路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则仅是一种新的灾害。铁路逐渐使缺乏人力的地方变得更加荒凉；同时却又使得人们在那本来难以找到立锥之地的地方，变得人口过分稠密；铁路又使那种在工人分类、工作分配、产品分配中已经发生的可怕的紊乱现象更加复杂化。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中等城市吧！

盖潘博士曾在了一本我想它在我们的政治家的藏书中大概不配占有地位的小本年鑑中写了下列的几行：

“南特是一个介乎像里昂、巴黎、马赛、波尔多那样的大工商业城市和三等城市之间的中等城市，在那里，工人们的习惯或者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些，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不能选择比这更好的城市来证实我们所必然得到的结果，并给予这些结果以一种具有绝对明确性的特征。

“只要正义感尚未完全泯灭，那么在看到贫苦工人的享乐与苦痛之间所存在着的那种极不相称的情况，没有人会不感到难受的；对这些工人说来，生活仅仅是不死而已。

“除了工人自己和他家属所需要的那块面包之外，除了他暂时为忘却痛苦而需要的一瓶酒之外，他是再也看不到有什么别的东西，也不希冀什么别的东西了。

“如果你愿意知道工人居住的是怎样的住所，那么就请你走进他所住的一条小巷吧，在那里，他是被贫困包围着的，正如中世纪时由于人民的成见而居住在被指定的区域内的犹太人的情况一样。——请你低着头走进那门向小巷开着的并且比小巷路面还低的一个肮脏的地方去吧，里面的空气像在一个地窖里那样，是寒冷而潮湿的，脚在泥濘的地面上直打滑，时时有跌倒在污泥里的危险。过道是向下倾斜的，因此就在过道两旁的地平面下，各有一间阴暗、宽大、冷冰冰的房间，房间的墙上渗出污水，而且仅由一个破烂的窗子通进空气来，这个窗子很小，进不来阳光，又太坏，所以关不牢。如果恶臭的气味不使你向后退缩的话，请你推开们，稍稍向前走一两步；但是你要当心，因为高低不平的地面，既没有铺砖，也没有铺石，或者至少石板是已经被极厚的泥垢盖满，因此再也看不出有石板了。这里有两三张用糟烂的细绳缚住的床：它们已被虫蛀坏了，床脚都向一边倾斜着；有一床草褥，还有一条沿边形成破布条的被子，这条被子因为只有一床，很少洗过，有时还有一些床单和一个枕头：这就是床上的东西。至于衣柜，在这些房屋中是不需要的。往往有一架纺纱车和一架布机权充家具。

“在楼上的其他各层中，房屋比较干燥，也比较明亮，但同样肮脏、同样可怜。——就在这里，冬天往往不生炉火，夜间在树脂的蜡燭照明之下，人们为了得到十五至二十个苏的工资，一天要作十四小时的工。

“这个阶级的孩子们，在他们能靠一种辛苦而笨重的劳动给他们的家庭增加几个里阿尔^①的收入以前，他们是生活在阴沟的污泥里的；——他们面色苍白，满脸浮肿，衰弱异常，他们那两只深陷在眼眶中的受着痧眼炎症侵蚀的发红的眼睛，使人看了觉得难受；也许有人会說他们和富人的孩子本质不同。住在郊区的人们和住在富人住宅区的人们之间，差别并不这么大；但是却发生着一种可怕的淘汰作用：最茁壮的果实固然成长起来了，但是很多是未熟凋零的。二十年后，有的人身体很强壮，而有的人却死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虽然还能作很多补充，但是这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开支的细账，将作出很有力的说明。

一个家庭的房租	25法郎
洗衣	12法郎
燃料	35法郎
家具修理	3法郎
搬家(至少每年一次)	2法郎
鞋子	12法郎
衣服(他们穿的是人们送给他们的旧衣)	0法郎
医疗费	免费
药费	免费

“如果一个四、五口人的家庭每年的收入是三百法郎，就必须用其中的一百九十六法郎来糊口，而这家人尽管尽量刻苦，最低限度也需要花费一百五十法郎来买面包。这样，他们还剩下四十六法郎，供购买盐、奶油、白菜和马铃薯等之用；我们不谈肉类，因为他

① 法国旧铜币名。——译者注

們根本談不上吃肉。如果有人認為酒吧間還要吸收一定數目的錢的話，那麼他就會明白，儘管慈善機關有時免費供給幾斤麵包，這些家庭的生活是非常淒慘的。”

我們曾有機會親自在特洛亞^①研究現行社會制度對工人階級的命運所發生的影響；我們曾親眼看到一些悲慘的景象。為了使人們不致責備我們誇大，讓我們把親身調查所得到的數字列舉如下，以說明事實的真相：

特洛亞的工業統計

制襪帽工：四百名僱主，這些僱主有營業執照並僱用約三百名工人，其中半數每日可以得到工資一法郎至一法郎二十五生丁；四分之一每日可以得到工資一法郎十五生丁至一法郎五十生丁；其他四分之一每日可以得到工資一法郎。

木工：二十五名僱主，擁有二百五十名工人。工人每日工資為一法郎七十五生丁、二法郎和二法郎二十五生丁。

制鞋工：二百名僱主，有三百至四百名工人，工人每日工資為一法郎二十五生丁至一法郎七十五生丁。其中有一些是制長靴工，每日工資為二法郎至二法郎五十生丁。

泥瓦工：僱主二十名，擁有將近一百五十名工人。工人每日工資從一法郎七十五生丁至二法郎五十生丁，蓋房工的工資相同。

細木工：僱主一百五十名，擁有將近七百名工人。工人平均每每日工資為二法郎。

^① 法國香巴尼省的省會，在塞納河旁。——譯者注

制天花板工人和房屋油漆工：雇主一百名，工人三百名。工人每日工资从一法郎五十生丁至二法郎不等。

锁工：雇主八十名，工人约二百五十名。工人每日工资为一法郎七十五生丁至二法郎二十五生丁。

裁缝工：雇主一百二十名，工人二百至二百五十名。工人每日工资从一法郎二十五生丁至二法郎五十生丁。较熟练的和地位较好的可以得到三法郎五十生丁。但这种人的人数是极少的。

硝皮工和制革工：二十五个工场共有五十至六十名工人，工人每日得二至三法郎。他们每天只工作十一小时。

织布工：他们一共有五百至六百人。他们每人每日得工资七十五生丁至一法郎五十生丁。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二法郎，但每天要工作十三甚至十四小时。

仅拥有极少数工人的行业并没有列入这个表中。

人们是不是要求一种性质更普遍、所表现的情况更惨的数字呢？

1837年阿德里安·加斯帕蓝^①先生公布了一份正式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一千三百二十九处王国的救济院和收容所中被救济的贫民人数，在1833年达到四十二万五千零四十九人。此外，描写工人阶级贫困情况的重要著作的作者步雷先生在上述的控告性数字外，又加上一个数字，说明那些住在自己家中而受救济的贫民的人数；步雷先生证明，根据最近的行政调查的可靠结果，在法国有一百多万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并且是仅靠富人餐桌上

^① 阿德里安·加斯帕蓝(1783—1862)，法国农学家，生于奥兰奇，1838年任内政部长。——译者注

落下的面包屑來維持生活的。另外，我們在這裡所提到的僅是“官方的”貧民；如果我們能夠對那些不是這種“官方的”貧民加以精確計算的話，那又將如何呢？根據步雷先生認可的假設，一個“官方的”貧民至少代表着三個貧民，這是絲毫沒有什麼夸大的地方，人們由此就可以承認受苦的人民群眾在全体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九。有九分之一的人口都陷於貧困之中！難道這還不足以使我們宣告你們的制度是殘酷的，而這些制度的原則永遠是邪惡的嗎？

我們剛才用數字指出了，應用卑劣而野蠻的競爭原則竟把人民推到多麼極端的貧困中，但這還沒有把一切都說完。貧困產生可怕的結果：讓我們深入到這個慘痛問題的中心去吧！

古人說，飢寒起盜心，這真是可怕而意味深長的話！根據警察廳的一位科長弗雷吉埃先生的統計^①，在巴黎工作蕭條的季節，男女老幼工人共有二十三萬五千名，而在工作繁忙的時期，則有二十六萬五千名。在這個數字中按照上述的計算，有三萬三千人由於貧困和無知墮落在罪惡的泥沼中，他們在極度失望中掙扎着、墮落着。至於那些只靠罪惡勾當謀生的人，如盜竊犯、詐欺犯、拐騙犯、窩藏犯、娼妓和她們的姘夫等等，他們就構成一個驚人的數字，總數達三萬零七十二人，再加上剛才提到的三萬三千人，就使巴黎所容納並給養的一支罪惡大軍，包括男女老少在內總數共達六萬三千人。

我們來談一談警察局認為沒有充分理由加以逮捕的那些作壞事的居民所聚居的巢穴吧。在文明世界首都的中心，在那些藏污納垢的區域里，在充滿着血腥的神秘事件的小巷中，有許多地方，人們

① 《居民中的危險分子》，第一卷第27頁以下。

以两个苏的代价出卖铺位。《居民中的危险分子》的作者说（第一卷第52页），在1836年，最下等的居住场所总数达二百四十三处；所收容的住户共六千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靠卖淫或偷窃为生。

的确，在这里，混杂聚居着我们道德世界上的渣滓，还有一些浸没在丑恶人群中的贫穷人，他们的极端贫困孕育了罪恶；在那里，发生着使人战栗的景象。在那里，人们所见到的只是面目狰狞可怕和野蛮兽性的人们。在那里，所用的语言都是用来掩盖他们的思想的下流俚语。在那里，人们极端地放荡闹酒，在那里，每天都可以遇到那些常客，一边争吵流血一边喝着劣等的绿葡萄酒，这种酒使他们的粗暴性情得到兴奋并且也使他们衰竭。从那里，有时产生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对社会做了骇人听闻和可怕的事情而走向监狱或断头台。

还有说起来骇人听闻的事情，那就是许多为非作歹的人在巴黎却有着一种公开的地位。警察局知道他们，有他们的姓名住址，掌握着他们不法行为的档案；为了要在犯罪的现场逮捕他们，警察一步一步地跟踪着他们。而在他们那一方面，只要他们的不法行为没有法律证据的时候，他们就昂首阔步，而且放心大胆地窥伺着时机。因此，惩罚和犯罪二者在我们社会内部构成两种敌对势力，这两种敌对势力都随时巩固自己的实力，不断地彼此监视着，以一种互不相容的态度互相打量着，用狡猾的手段斗争着，并注定我们要永远而且无休止地看到它们这种永恒的斗争的演变。

这还是小事。长期以来，人们只是由于孤独的、个人的、粗暴的动机而去犯罪。但是在今天，杀人犯和盗窃犯却结成帮了；他们服从纪律的规定，他们给自己制订一种法典、一种道义；他们成群

結帮地活动并按照周密的計劃进行。最近期間，刑事法院接連进行公开审理的，有曾經向中产階級宣战的“沙尔班梯埃帮”，有经常地在圣日曼区行劫的“古尔夫阿西埃帮”，有曾向工人儲蓄所搶劫的“高杰·白萊士帮”。另外还有“硝鑷水帮”、“催眠药帮”、“勒杀帮”等等。不被劳动所吸收的力量跑到罪恶的陣营里去了。面临犯罪分子对集体进行杀害，忠实的人們认为不能再在一起进行集体生产了。当我们等待人們决定去組織工人社团的时候，我們却看到杀人犯已組織起来了。

这种混乱是不可容忍的，必須予以結束。但是，如果得到的結果使我們灰心，那么最低限度我們要尽力去追溯这种混乱的原因。简单說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貧困。

因为，誠恐侮辱上帝，我們不敢主张人类生来就必然是邪恶的。我們更願意相信上帝的作品是善良的、是神圣的。我們不要为了推卸我們曾經破坏这个作品的責任而成为不虔敬的人。如果人类的自由确实存在的話，那么一些伟大的哲学家都曾对此表示怀疑：至少人类的自由在貧民身上是遭受到异常的限制和压制的。我知道一种比蒂培尔^①和尼罗^②的暴政更残忍、更难于逃避或难于摆脱的暴政，这就是事态的暴政。它是从一种腐朽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它是由无知、貧穷、放蕩、坏榜样、得不到安慰的心灵上的痛苦、找不到减轻方法的肉体上的痛苦等等所构成的；它的牺牲品就是这样一些人，他們生活在一个农产富饒、商店里装滿着珍貴物品、大廈中空曠无人的国家里，自己的衣、食、住却毫无着

① 蒂培尔，紀元14—37年的羅馬皇帝，多疑而残暴。——譯者注

② 尼罗，紀元54—68年的羅馬皇帝，性情残暴。——譯者注

落。

請看一个出生在我們城市的污泥中的不幸者吧。他从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的訓导。他在受罪恶薰陶的环境中长大。他的智慧始終停留在黑暗里。飢餓煽起了他最起碼的欲望。从来沒有一个朋友来帮助过他。也沒有温和的声音在他辛酸的心灵中唤起温情和爱情的共鳴。現在，如果他成了犯罪的人，那么，你就向你們的法庭呼吁，对他加以制裁：我們的安全需要这样作啊！但是你不要忘記，你們的社会秩序从来也沒有适当地帮助这个不幸的人解除痛苦。你不要忘記，他的自由意志是从他在搖籃时起就已遭到恶化；他的願望受着沉重的和不公正的命运的压制；你不要忘記，他挨餓；他受冻；他从不知道、也不懂得什么是仁慈……虽然他是你的弟兄，虽然你所信奉的上帝也是那些貧穷的人、懦弱的人、无知的人、一切受苦的和永生不灭的人类的上帝。

今天，当人們把一个人交給劊子手行刑时，如果你問为什么，就有人回答：“因为这个人犯了罪。”如果你继续問这个人为什么犯了罪，那么人們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了！

有一天，这是1844年11月4日，我閱讀了《法院通报》，其中有一篇叙述最近发生的一宗謀杀案件，詳情很有令人痛心的意义：

“本年7月12日，”总检察长阿貝尔先生的起訴书上写道，“雪弗魯依来到工艺博物館街警察分局自首，說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且立即供认了他犯罪的詳細情节。他說，他的被害人名叫葛丽娜-安奈特·布隆，原是他的姘妇，已经和他同居了一个多月；貧困带来的不幸和对生活的厌倦使他們难以忍受，于是他們共同商定一起死去。为了能够实行这个可怕的計劃，他們喝了烈酒，把他

們房間的窗戶關好，把窗縫堵塞，還準備了可以使他們窒息而死的木炭。葛麗娜-安奈特·布隆上床就寢，雪弗魯依對她說：‘我們就快死了！’她回答說：‘是，是，’同時，並結結巴巴地說着這幾個字：‘還沒有呢，等一等！’她說完這些話，神經就有些不正常。據被告說，他曾經給她一杯糖水喝，使她的神經鎮靜一下。布隆精神稍稍恢復，接着說：‘你快要死了，我的好茹連，你已經点燃了木炭，我們一起睡下吧！’她果然睡着了。然而被告卻沒有把木炭點着；據被告說，他怕布隆在精神錯亂的時候倒在爐火上。他說，就在這一剎那間，他起意要窒息這個不幸的女人，于是他重新喝了烈酒壯胆，把松脂熔解後，塗在一張布上，把布貼到她的臉上，這樣她的嘴和鼻孔就完全蓋嚴密了。不多時候，葛麗娜-安奈特·布隆就死了；雪弗魯依說自己已經再沒有勇氣去點起炭火，也沒有勇氣想別的方法來自殺，他便立即走到警察局自首。”

從案件審理的情況看來，這個被她的情夫用松脂面具窒息而死的可憐女子並不是一個庸俗的人物。“有一天，她對她的情夫說，我要和你談談我的幻想。在我還非常年輕的時候，我在聖莫爾^①作工；在夜間，天氣很好的時候，我時常單身跑到聖莫爾坎地附近田野里的一處非常幽靜的地方，在那里，四圍是綠草和花朵。我曾經好幾次為我自己構造的幻想而哭泣。我在戲院看過一出名叫《凱特利》的戲，這出戲使我感到煩惱。在這出戲中，有一個女子，她很懂得愛；而我呢，在我的孤獨中，也像這個女子一樣，我愛一個超人，他是我所既不認識又沒有見過的。可是我和他談過話；

① 法國安德爾省的一個市鎮。——譯者注

我想像他就在我的周围，他就睡在我的身旁。以后，我就去寻找花朵，把花朵散布在他的周围，并且我低低地说：他就在那里，他对我很忠实！啊！是的，我很爱他。我也就哭了。由于我有了这些幻想，我感到幸福，因此那时我每天都要到那里去。”

多么深厚的情感！何等高尚的理想！热情和幻想交融在一起，这该是多么动人！多么温柔的忧伤的性情呀！但是葛丽娜-安奈特·布隆却陷入了贫困：她的心灵在贫困中很快就衰弱和枯竭起来。她在沉醉中去找寻致命的梦境；最后，发觉生活的压迫过于沉重，她对她的情夫说：

“你快要死了吗，我的好茹莲？让我们一起睡着吧！”

这样，贫困仿佛是为了使惨痛的教训多样化似的，就以各种极不相同的姿态出现：在某些人身上，贫困是悲惨的，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贫困则是凶恶丑陋的，它有时给自杀带路，有时又促使人去进行谋杀。那么，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理由使政府最后下决心去研究可能的救济方法呢？

几年前，国王的检察官布克利先生在他复职演说中承认，现今的社会秩序呈现出许多无名的创伤；家庭外面，潜伏着不调和的情况，时刻有对它进犯的可能；人们在那里公开提倡贪婪或吝啬；人们来往行走在窝藏犯的黑店和黑夜中盗窃犯的匕首之间；就在巴黎，近代文明的策源地、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中心，罪恶选择了它最喜欢的住所；那些地下社会的可憎恶的人物，如拉斯奈尔和布勒曼之流的有组织的罪犯，就是从巴黎的神秘和下流的地区中逃出去的。在这个富有的、文雅的、有礼貌的、尽情欢乐的表面掩盖下，展现出使人毛发悚然的悲剧；在离我们仅有几步远的地方就

有不少的违法行为、不可思議的荒唐行径、难以相信的淫乱秽行以及許多被自己的母亲慢慢地弄死的嬰兒；是的，这就是那些当权的最重要的人物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然而，他們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赶紧增加法院和扩大法院的生杀之权！而他們对于杜絕如此多的罪大恶极和駭人听闻的事件的根源的必要性，却一字不提！可是，預防似乎終究是比懲罰好些。根据里昂·福歇先生^①所得的資料，被塞納初級法院所逮捕和审問的人数如下：

1832年..... 9,047人

1842年.....11,574人

这就表示：从1832年至1842年——用我們这个时代的絕妙表达方法來說——罪恶增加了28%。要知道，巴黎城是有人員众多的国家保安队、一万五千名卫戍部队、三千名市警察、八百三十名消防队、无数的警官、督察員、警察、密探保护着的；并且人們还在不断地增强着这些工作人員的力量。但是，尽管鎮压的力量扩大，犯罪的活动也增加得更快。是不是我們等着罪恶成为不可收拾的力量，等待它来包围我們，等它把我們都掐死呢？

因此，如果对于穷人來說，这里存在着一个救济的問題，那么，对于富人來說，那就是一个安全問題了。貧穷的根源——竞争，对于穷人來說，是无休止的暴政，而对于富人說来，却是一种永久的威胁。誰都知道，大部分的罪犯都是从大的工业中心产生出来的，

^① 里昂·福歇(1804—1854)，法国的新聞記者、经济学家兼政治家，1848年作过內政部长。——譯者注

工业省区所提供給刑事法院的被告人數，要比农业省区所提供的多出一倍。单单这一个比較就足以說明，人們对于現今的劳动組織、对于劳动組織所应規定的条件以及对管理这个組織的法律应当作何感想。

对于这一切，哦，慈善家們，請你們想像一下感化院的美好制度吧：当你們費心劳神地給了罪犯以教育，当他走出你們的監獄时，正在等着他的貧困又把他无情地送回到那里去了。你們这些远見的医生們，請你們相信我的話，把这个染有疫病的人留在病院里吧，你們恢复他的自由就是把他交还给疫病。

而且，对于能恢复健全生活的弱者来说，同无法改造的坏人发生接触是致命的。恶行好像美德那样，也有它的感染作用和它的道理的。

这就是使我們那些政治家痛苦地认识的事情，这就是产生像1844年5月众議院所通过的那样的監獄法案的原因。这个法案的目的是在于避免混杂的危險，这种混杂使監獄中那些新犯人和那些长期以来已经腐化墮落的犯人混杂在一起。这个法案不仅把只是采用夜間隔离的欧貝恩^①制度，而且还把采用夜間和白昼都隔离的費城^②制度介紹到法国。結果是，監獄为了使释放到社会上去的犯人不致更加墮落，更有作恶的经验，更加令人可怕，以免使社会受到这种犯人疯狂行为的危害，就不得不采用单独監錮制度，这只是用时间来埋葬罪犯：这是一种可怕的刑罰，結果使犯人

① 美国的一个城市，有著名的監獄。——譯者注

② 北美合众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大城市，因实施罪犯隔离監禁而著名。——譯者注

变成呆木愚蠢、自杀或发疯！在罗马时代，当一个贞女陷入情网的时候，人们就把她活埋了，并且在她的身旁放上一罐水和一块面包；但是，正如著名的拉梅耐^①对我们说过的，在罗马，人们还讲人道，不去更换埋葬在地下的贞女的面包，也不去更换她的那一罐水。在把这种制度输入给我们的那个国家里，罗得岛州从1843年1月1日起就取消了单独监禁制，因为在三十七个人中就有六个人发疯。西尔维奥·彼利科^②说过：“孤独是一种这样残酷的折磨，以致我始终不得不想把我心头的几句话说出来和要求我的邻居答复我。如果他不回答，我就会向窗上的铁栅、向对面那个小丘和在天空中飞翔的鸟说话。”

单独禁闭的残酷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相比的。犯人一旦被关进叫作单间禁闭室的这种坟墓里去，他除了绝望以外，和人类没有别的关系了。他的殉难既无人见，他的呻吟也没有共鸣。他的孤独由四面冰冷的墙壁包围起来，不使外泄。同时他什么都没有：他看不到人的面孔，观察不到广大天空的景色，听不见大地的声音和大自然的谐音。永恒的沉寂压在他的身上。他完全被人遗忘。他在死亡中呼吸和挣扎。

如果最近所通过的法案能够减轻这一类惩罚的逻辑理论所具有的野蛮成分，那么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也要衷心地

① 菲利西特·德·拉梅耐(1782—1854)，法国反动政论家和政治家。天主教修道院院长。他发展了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教会领导的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译者注

② 西尔维奥·彼利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曾参加烧炭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他的作品“狱中记”(1832年)反映出他转向基督教的温和立场，这种转变表明他已放弃了政治斗争。——译者注

为那些使得罪犯有时还有希望能够看到人面在他面前经过的立法而祝福。不过，即便含有这样内容的法律，仍旧是多么的残酷啊！

但是，我们的立法者，却竟相信了单独禁锢的教育意义，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在他们眼里这种教育意义掩盖了单独禁锢的恐怖性。他们根据少有的盲从性，以为一个人如果和自己的同类尽量隔离就可以提高他对他同类的责任感；他们相信罪犯的社交本能是可能加以改造和教导的，办法是使用强力去压制这些本能，使他们因没有机会进行社交和意志消沉而萎靡下去。简单说来，他们认为为了挽救堕落的人，只有使罪犯面壁反省自己的罪行。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这个问题本来要求作深入的研究，但我们所以谈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指出，在基础极坏的社会秩序中，一切感化制度都会产生巨大的和不可避免的弊害。其中最优良的制度，对罪犯在实际上进行感化而不是进行折磨，它本身也会成为一种显然的危害和丑事。因为人们根据什么权利可以让贫苦的儿童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在苦难中去吸取罪恶的毒素，而在监狱中却有人竭力去向那白发苍苍的罪犯说教呢？让那些被遗弃的、无知的、愚昧的、挨饿的、极度绝望的人，通过犯罪去得到社会保护的权力，并使用匕首去为自己开辟一条受教育的道路，这不是荒谬到了极点吗？

从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效而合理的感化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种健全的劳动组织。我们周围，经常敞开着一所使人堕落的、规模巨大的学校，应当立即加以关闭：那就是贫困。

只要人們不從根本上去打擊邪惡制度，那麼人們在反對必然後果上的一切努力將是白費的。沒有被摧毀而只是掩蓋起來的邪惡是會萌芽起來的，它將在善良的外表下成長起來，在每種進步上使人發生錯覺，並在每一件好事下面埋伏一個陷阱。

我們都知道，儲蓄銀行的建立沒有得到廣泛的歌頌者和擁護者。

很多誠實的政論家曾經認為，對人民來說，儲蓄銀行是一種通過事先安排而逐漸增加財富借以解放自己的辦法：在一個非常吝嗇的、不僅限制人民的樂趣而且還限制人民的生活的社會中，這是一種天大的幻想：工人的工資既永遠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需要，怎會有足夠的儲蓄呢？即或艱苦較小的人偶爾有些小額積蓄，然而疾病、失業都在等待着吞食這筆微薄的儲金，這種儲金又怎能構成將來解放無產者的資本呢？

此外，儲蓄銀行僅僅有一部分來源是靠誠實的勞動得來的。作為大批不法利益的盲目的和合法的收贓者，儲蓄銀行在不知不覺地鼓勵了這些不法利益之後，對於一切前來儲蓄的人，從偷竊了他主人財貨的僕人起，一直到出賣色相的妓女，一概歡迎。

人們向無產者建議要為了將來而積蓄：這等於對他們說，要忍飢挨餓，要壓制不可抑止的欲望的根苗，要用他自己的意志來加重他處境的貧困。那麼為的是什麼呢？只是為了在經過十年的節衣縮食、艱難困苦之後，當衰老的心脏不再為追求幸福而興奮，當人們的青春已逝，好得到一筆微薄的資本，作為競爭的候補戰利品。

但是，問題還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虛偽和不公正的文明社

会中，如果使人民完全依靠他们的统治者，这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当人民由于狭隘而虚构的利益和他身受的压迫制度联系起来时，为了恐怕看到他们自己辛辛苦苦攒积起来的几文钱在社会变革的危机中化为乌有，是否不能不感到自己是与压迫者的命运相联系的呢？而成为暴政的政权，当它能支配人民群众的储金时，当它可以拿银行倒闭来威胁他们时，当它可以任意摆布他们，使他们服从它的危险行为和参与它的使他们成为牺牲品的残暴行为时，这种政权还有什么不敢对人民群众做的呢？

就储蓄本身来说，这是一件再好没有的事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只是幼稚的和狂妄的矫揉造作。但是——人们应该很好注意——如果储蓄跟个人主义联系起来，那么，储蓄就会产生自私自利，会和布施绝缘，会不知不觉地在最善良的天性中杜绝乐善好施的泉源，会以贪婪的满足来代替施恩于人的那种神圣诗情。反之，如果储蓄跟社团配合起来，那么它就将获得一种高尚的本质、一种神圣的重要性。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储蓄，这就是宣布对于自己同类和对于前途的不信任；但是，如果既为自己又为他人而储蓄的话，这就是做一件最聪明的事情，这就是给予智慧以应有的热诚对待。

某些道德学家曾经夸奖现今的储蓄银行制度，说它是迫使贫苦阶级不再贪杯的一种有力的手段。但据我们看来，挽救的办法还不在于此。工人之所以这样甘心去寻求一种导向梦境之乡的出路，就是因为现实生活对于工人来说是太残酷了。人们为了工人的利益要把工人手中的酒杯砸碎，而工人之所以爱好这个酒杯，是因为一醉可以解千愁。为了能忍受生活，该有多少人需要借酒杯来忘掉

部分的情感呢！如果不是社会的过错，那又是誰的过错呢？因为它在社会成员之間，把劳动与享受作了那样的不公正的分配：閑蕩的人是由于厌悶而醉酒，劳动的貧民則是由于痛苦而醉酒。原来，对于一切人來說，智慧产生于操作和休息、辛苦和快乐之間的适当的交替。所以我們又不得不回到基本的問題上：通过消灭貧困的根本原因而消除貧困。

我們已经談过，个人主义产生了竞争；由于竞争才有工資的变动和工資的不足……談到这里，我們所碰到的就是家庭的瓦解問題。一切婚姻都是負担的增加。为什么要穷上加穷呢？因此男女間的姘居就代替了家庭。貧民生养了孩子：怎样去养活他們呢？因此，在墙角里，在某些荒僻的教堂的石阶上，甚至在立法机关的迴廊下都发现有这样多的穷人嬰兒的尸体。为了使我們对杀嬰的原因不再有絲毫怀疑，統計在这方面使我們知道，我們十四个工业較发达的省份所提供的杀嬰数字与法国全国所提供的杀嬰数字的比例是四十一与一百二十一之比^①。絕大多数的罪恶总是产生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国家完全应该对一切貧苦的母亲說：“我負責养育你們的孩子，我開設教养院。”这样做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更进一步，还应该消灭各种能够妨碍人們冲击无能为力的制度的障碍。弃嬰收容箱^②已经設立了！放弃自己权利的母亲得到了保守秘密的利益。但是現在享乐的誘惑既然不必顾虑男女姘居所强加的责任，

① 參閱1840年7月15日《宪政公报》所公布的統計表。

② 一种裝置在嬰孩收容所牆壁中的、可以轉动的圓形箱柜，箱柜的一半露出在牆外，当有人要把自己的嬰孩送交收容所时，可以把嬰孩放在露出在牆外的那半个箱柜中，把箱柜轉动，就可以把嬰孩送进去。这样，放弃嬰孩的人就可以不必面对面地暴露自己的面貌而把嬰孩交付給收容所。——譯者注

那么，誰又能制止男女姘居情况的发展呢？这就是道学家們立刻大声疾呼的事情。接着，冷酷无情的統計家出来說話了，而且他們的責备更加激烈。“取消弃嬰收容箱吧，取消弃嬰收容箱吧，不然，你們就要看到，收容的弃嬰数字将大大增加，就是我們全部的預算也不够养育他們了。”的确，自从設立弃嬰收容箱以来，法国的弃嬰数字有显著的增加。在1784年1月1日，弃嬰的数字是四万；1820年是十万二千一百零三；1831年是十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一；今天差不多是十三万^①。弃嬰的数目和人口之間的比例数，在四十年間差不多增加到三倍。对于貧困的这种大規模进襲，应该給以怎样的限制呢？而且怎样才能避免总是在增长着的百分之几的附加稅的重担呢？我分明知道，在現代的救济所中死亡的机会是很多的；我分明知道，在准备收容到慈善机关去的嬰兒中，有許多在离开出生的陋室时，或在寒风凜冽的大道上，或在育嬰堂的恶浊空气里，就丧失了生命；我知道，还有其他許多嬰兒，由于营养不足而慢慢死去，因为，在巴黎的九千七百二十七所弃嬰养育所中，只有六千二百六十四所养有一头乳牛或一只奶羊，最后，我还知道，收养在同一保姆家里的嬰兒中，有的是因吃奶而死亡的，因为他們的同伴們是由放蕩的父母生出来的，因此把保姆的奶汁都弄得有毒了^②。可惜！像这样的死亡率还不能构成一項足够的节约。

至于說到百分之几的附加稅和預算数字，那么从1815年至1831年的开支均有所增加：在夏朗德^③，从四万五千二百三十二法

① 請参閱于尔納·德·博滿斯、都夏台尔、伯諾亚斯頓·德·夏都諾夫等先生的著作。

② 見埃德賴斯当·都梅里尔：《預算案的哲学》。（埃德賴斯当·都梅里尔〔1801—1871〕，法国語言学家和古文学家。——譯者注）

③ 法国西部的省份。行政中心为翁各雷謨。——譯者注

郎增加到九万二千四百五十四法郎；——在朗德^①，从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一法郎增加到七万四千五百五十三法郎，——在罗得一和—加隆^②，从六万六千五百七十九法郎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六法郎；——在罗阿尔^③，从五万零七十九法郎增加到八万三千四百九十二法郎。——法国的其他省份也是这样。在1825年，各省議會共通过了五百九十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四法郎的補助費，到年底证明尚亏空二十三万零四百十八法郎。但是禍不单行：救济院的保健制度逐日改善；然而卫生的进步却成了一种灾害！天啊！这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呢！那么还該怎么办呢？有人认为，凡是把自己嬰孩送进救济院的母亲就得被迫接受一种使她受屈辱的义务：就是要她向一位警察局局长坦白她的錯誤。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如果使妇女們变得不知廉恥而习以为常，社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当青年們的一切荒唐行为得到官方的許可，当一切淫蕩举动得到社会默认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对于必須作这种痛苦的坦白所作的規定很快被习以为常所打破；如果妇女們从而受到不知廉恥的教育，而国家当局又在鼓励不顾貞节的行为，那么政府只有把一切违反廉恥的法律一笔勾銷。如果說最好还是把弃嬰收容箱全都取消；这不免是太大胆的要求。这真是濟神的願望！啊！你們发现百分之几的附加稅的数字在增大，这是可能的；但是，我們却不願意使杀嬰的数字增加。压在你們預算上的負担，使你們感到惊惶！但是，我們說，既然人民的女儿們在她們的工資中找不到維持生活的办法，那么，你們在这一方面虽然

① 法国西南部的省份。行政中心为蒙特馬尔山。——譯者注

② 法国西南部的省份。——譯者注

③ 法国西部的省份。——譯者注

有所收获，你们在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应当有所损失，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家庭就这样完了吗？唉！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应当考虑一下，如何把劳动重新组织起来。因为：有了竞争，就有极端的贫困；有了极端的贫困，那就会瓦解家庭。事情是这样突出！现制度的拥护者对革新的阴影战栗，而他们并没有觉察到，如果维持这种制度，那就会通过一条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道路把它推向最大胆的现代革新，也就是推向圣西门主义！

我们所攻击的工业制度的最丑恶的结果之一就是把孩子们推进工厂里去。我们读到牟罗兹^①的许多慈善家向议会两院呈递的请愿书：“在法国，有人招收各种年龄的孩子在棉纺工厂或其他工厂中作工；我们在那里看见有五岁和六岁的孩子。不论年龄，每天劳动的时间都是一样的；纺织厂里，除非在商业危机的情形下，每天的劳动是从未少于十三个半小时的。

“当你在清晨五点钟穿过一座工业城市时，你就能看到有那样多的人拥挤在纺织厂的门口！你将看到一些不幸的孩子，面孔苍白，身体瘦弱，发育不完全，眼色阴暗无光，脸色发青，呼吸困难，走路来僵僵着身躯，好像老人一样。你听听这些孩子之间的谈话吧：他们的声音是沙哑的、微弱的，好像被他们在纺织厂中所吸进去的污浊空气所遮盖起来似的。”

但愿上帝认为这种描写是夸大的！但是，这篇叙述中所指出的事实，是以官方文件和严肃人物蒐集起来的文件中所记载的观察结果为根据的。另外，那些证据也都是信而有征的：夏尔勒·杜

① 牟罗兹，法国上莱茵省的首府。——译者注

班先生^①在上議院說：在每一万个应召前去忍受战争疲劳的青年中，法国的工厂最多的十个省份提供了八千九百八十名残废或畸形的人，而在农业省份中，則仅有四千零二十九名。1837年，为了挑选一百名壮丁，在卢昂就要剔选掉一百七十名，在尼姆，一百五十七名，在埃尔柏夫，一百六十八名，在牟罗兹，一百名^②。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竞争的必然后果。竞争使工人过分贫困，于是工人不得不把小孩領到工厂去作工，以补充工資的收入。同样，無論在什么地方，只要竞争統治着，在工厂中使用童工就成为必然的事。例如，在英国，許多工厂的大部份工人由儿童所組成：据德奧賽先生引证的《每月評論》报导，在邓底^③的工厂中，有一千零七十八名劳工都还没有达到十八岁，大部分在十四岁以下，一部分在十二岁以下；有一些在九岁以下；最后，其中还有刚滿六岁或七岁的。然而，根据埃德賴斯当·都梅里尔先生所引证的《奥斯拉德报》，人們可以看出对于儿童剝削的后果：在曼彻斯特随便选择的七百名男女儿童中，人們发现：

在三百五十名未经工厂雇用过的儿童中，害病的有二十一名，健康不良的有八十八名，身体十分强健的有二百四十一名。

在三百五十名被工厂雇用的儿童中，害病的有七十五名，健康不良的有一百五十四名，健康良好的仅有一百四十三人。

因此，那种迫使父亲去剝削他們亲生子女的制度就是一种杀人的制度。并且，从道德的观点而論，誰能設想还有比在工厂中发

① 夏尔勒·杜班(1784—1873)，法国经济学家兼工程师。1836年为法国科学院院长。——譯者注

② 請參閱前述的那个統計表。

③ 英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譯者注

生性关系的情形更不幸的事情呢？这就是向孩子们灌输恶习。克敏斯医师曾在—所梅毒病医院医治—些十一岁的梅毒病患者，读了他关于这事的谈话，怎能不令人惊骇？而在英国的一些贫民收容所中，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根据这样的事实，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路易·勒·格朗学院的教授洛蓝先生，对王国所有的初等学校的状况写出了一篇令人悲痛的不寻常的报告。他在冗长地阐述了工业对教育的那些可恶的胜利和这种胜利对于儿童品行的影响之后，接着写道：法国已经开始感染了那些已在英国生根的同样习惯，在英国，根据《教育日报》统计，证明四天中就有一千四百十四名儿童去过十四家卖烧酒的小店。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一次劳动的改组，又怎能制止人民的这种迅速毁灭呢？是否用法律来限制工厂雇用童工呢？这是人们已经尝试过的事情。是的，在法国，立法者的慈爱心肠既是这样，因而终于有一天上议院规定八岁的儿童可以去看一台机器。按照这条仁爱 and 慈善的法律，八岁的儿童将只受到每天劳动十二小时的限制。这种法律不过是抄袭了英国的“工厂法”。怎样的抄袭呀！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必须实施这条法律。这种法律是否能实行呢？当不幸的家长向立法者说：“我有八岁、九岁的孩子。如果您限制他们的劳动，您就减少了他们的工资。我还有六岁、七岁的孩子。我没有养活他们的面包。如果您禁止我使他们受到雇用，那么您要让我使他们饿死吗？”试问这时立法者应该怎样答复呢？有人大声疾呼说：父亲们并不愿意。是否可以强迫他们愿意呢？这种对于贫穷所实施的强暴作法，是根据什么法律、根据什么公平的原则呢？在当前这种制度下，人们要在

孩子身上尊重人道主义就不得不在父亲身上大胆地破坏人道主义。

所以，如果没有一次社会改革，在这里就没有挽救的方法。因此，在这种竞争笼罩一切的情况下，劳动将给将来制备衰老的、畸形的、病态的、腐化的后代。啊！富人们！谁将为你们在边疆效命呢？可是你们总得需要士兵呀！

但是，这不仅摧毁贫困的儿女们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功能，而且也摧毁他们智力上的功能。根据法律的强制规定，的确，在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位初级小学的教师，但是到处都是以一种可耻的吝啬态度来投票通过维持该教师的经费。还不仅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走遍法国文化最高的两个省份，每当我们问到一个工人为什么不把他的孩子送到学校去时，他总是向我们回答说：他已经把孩子送到工厂中去了。因此，我们能够通过亲身的经验来证实从所有各种证据所得出的结论以及我们在大学教授洛蓝先生的正式报告中所读到的东西，下面就是洛蓝先生的话：“只要有一个轻工业工厂、一个纺织工厂、一个重工业工厂刚刚开办，那么，你就可以停办学校。”眼看着工业在向教育进行犯罪式的进袭，试问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学校还能有什么重要性呢？请你参观一些村镇吧！这里充当教师的是一些被释放的罪犯、流氓、冒险家；那里有一些挨饿的教员离开了讲坛去耕地，他们只是在没有别的较好的事情可做的时候才去教书；孩子们差不多到处都是群集在潮湿的、不卫生的屋子里，而且甚至是在马厩里，在那里，冬天他们就利用牲畜的体温来取暖。有些村镇的学校，教室同时就是老师的厨房、饭厅和卧室。穷人的子女所受到的正

是这样的教育。可是对这些穷孩子来说，这还是最幸运的呢。我再說一遍，这些情节都是从政府报告中得到的。那些政論家主张需要教育人民，他们认为要是沒有教育就談不到改善人民的状况，他们认为一切要从教育开端，試問这些政論家都想些什么呢？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当号召穷人在学校和工厂之間作出抉择时，他的抉择是毫不犹疑的。工厂在被优先选择方面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在学校里，对孩子进行教育，但是在工厂里，却有人給錢。所以，在竞争的制度下，人们在离开搖籃几步远的地方就夺走穷孩子，压制他們的智慧的发展，伤害他們的心灵，同时也摧残他們的身体。这是三重的邪恶：三重的杀人罪！

讀者，还要請您耐心一点！我就將結束这一悲惨的論证。人口的增加，在貧民階級中要比在富人階級中迅速得多，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根据《欧洲文明的統計》，巴黎的出生人口，在最为富裕的住宅区，是当地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而在其他住宅区，就增高到二十六分之一。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德·西斯蒙第先生^①在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对于这一点曾作了很好的解释，认为所以发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那是因为按日計工的劳动者是处在不可能有所希望和預見的地步。只有那种对明天有把握的人，才能够按照他的收入定額来估計自己孩子的人数；而任何过一天算一天的人，只好屈服在一种神秘的命运的桎梏之下，把他的子孙都寄托于这种神秘的命运，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寄托于这个命运了。况且，有的是救济院，它們使真正的乞丐洪流威胁社

^① 米昂納尔·德·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小資产階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是所謂经济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譯者注

会。有什么方法能避免这种灾祸呢？

如果瘟疫发生得比较频繁些或者和平存续的期间比较短些，那就好了！因为，在现行社会制度中毁灭，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无需再想其他挽救的办法了！但是，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少；霍乱却成为可望而不可得的疾病，这将怎么办呢？而在一定时间以后，我们对我们的那些穷人又将怎么办呢？显而易见，在一切社会中，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增加不如人口增加得那样快，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面临着深渊的社会。这就是法国的情况。律比雄先生在他的那本标题为《社会结构》一书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这一可怕的真理。

的确，贫困可以杀人。按照维累梅大夫的统计，在同一时期出生的两万个人，一万个生在富庶的省份，另外一万个生在贫困的省份，就死亡率来说，在四十岁以前死亡的，在富庶的省份里一百人中有五十四人，在贫困的省份里一百人中有六十二人。到九十岁还活着的人，在富庶省份里一万人中有八十二人，在贫困省份里一万人中则仅有五十三人。

这个用死亡来挽救贫困的办法是个最无效的办法！在保持着各种比例的情况下，贫困所产生的不幸的人，比它所能消灭的要多得多。再说一遍，有什么法子可想！斯巴达人杀死他们的奴隶，加雷尔^①令人把乞丐全都淹死。在法国，十六世纪中颁布的许多法令，把乞丐处以绞刑^②。人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惩罚形式之间随意选择。

① 加雷尔，罗马皇帝，305—311年在位。——译者注

② 见埃德莱斯当·都梅里尔；《预算案的哲学》第一卷第11页所引证的作者。

我们为什么不采用马尔萨斯^①的学说呢？不，马尔萨斯缺乏逻辑：他并没有把他的体系贯彻到底。

莫非我们要采用1839年2月在英国出版的《谋杀篇》的学说或采取马尔居斯的著作吗？在这本著作中，他提议工人阶级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以后，如果再生孩子就要把他们全都闷死，但是要奖励作出这种爱国行动的母亲们。你笑吗？但是，这本书确是由一位政论家兼哲学家严肃地写出来的，而且被一些最认真的英国作家们评述和讨论过；最后它是在公愤之下被当作一种残酷的但一点也不可笑的东西而摈弃了。事实上，英国没有权利去笑这些嗜杀成性的疯狂，因为那时候英国被竞争的原则所迫，已不得不征收一种济贫税——另一种异常荒谬的极端措施。

下面摘录伊·布尔维所著的《英国与英国人》一书中的数字，供我们的读者们深思：

独立的按日计工的劳动者，用他的工资每星期只能购买一百二十二盎斯^②的食物，其中十三盎斯是肉类。

由教区担负其生活的壮健贫民，每星期得到一百五十一盎斯食物，其中二十一盎斯是肉类。

罪犯每星期得到二百三十九盎斯食物，其中三十八盎斯是肉类。

这就是说，在英国，罪犯的物质条件比受教区供养的贫民的物质条件较为优裕，受教区供养的贫民的物质条件又比从事劳动的

① 托马斯·洛勃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其主要著作《人口原理》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译者注

② 常衡一盎斯合一磅的十六分之一。——译者注

忠厚老实人的物质条件较为优裕。这种情况岂不令人惊駭？可是这种情况却是有必要的。英国有一些工人，但是工人少于居民。既然在养活貧民或杀死貧民二者之間沒有折衷的办法，英国的那些立法者就在这两种办法之中采取了前者。他們沒有加雷尔皇帝那样大的勇气，事情就是这样。还需要知道的是法国的那些立法者是否能以冷靜的头脑去考虑从英国抄襲得来的工业制度所产生的可恶的后果！

竞争产生貧困：这是被数字所证明了的**事实**。

貧困的繁殖力非常惊人：这是被数字所证明了的**事实**。

穷人的生殖力把許多需要劳动而找不到劳动的不幸者投入到社会中去：这又是被数字所证明了的**事实**。

到了这种地步，社会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杀死全部穷人或免費养活他們：不是残暴就是发疯。

III 竞争是资产阶级崩溃的原因之一

我本来可以说到这里为止。但是一个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社会相类似的社会是孕育着内战的。倘若无政府状态就在资产阶级的脚下，那么，资产阶级以为自己内部并无无政府状态而自豪，也是枉然的。即使我们对于作为资产阶级基础的东西避而不谈，难道资产阶级统治本身就不包含着即将到来的和不可避免的瓦解的一切因素吗？

按照亚当·斯密^①和萨伊^②派的经济学家的说法，“廉价出售”这个伟大的字眼概括了无限制的竞争的一切优点。但是为什么只是根据消费者从“廉价出售”中所得到的暂时利益去考虑“廉价出售”的结果呢？“廉价出售”，只有在生产者中间撒下最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的种子的情况下，才有利于消费者。“廉价出售”是富有的生产者用以打倒不太富裕的生产者的棍棒。“廉价出售”是胆大的投机者用以毁灭勤劳人们的一种陷阱。对于那些无钱购买一种价值昂贵的、而他的更富有的对手们却有办法购置的机器的制造商来说，“廉价出售”就是宣告他们死刑的裁决。“廉价出售”是高度垄断事业的执行者；鲸吸掉中型工业、中型商业和中等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译者注

②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摒弃了亚当·斯密学说中的一切有价值的、科学的部分而利用了其中所有的庸俗部分。——译者注

资产；总之，这是为了几个工业寡头的利益而毁灭资产阶级的方法。

难道“廉价出售”，从它本身来考虑，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诅咒吗？谁也不会大胆支持这种荒谬的說法的。但是，坏的原则就是把好事变坏并貽害一切事物。在竞争制度下，“廉价出售”只形成暂时的和虚假的好处。当斗争还在进行时，“廉价出售”是被维持着的；而当最富有的人战胜了他所有的敌手时，价格就立即重新上升。竞争导致垄断：根据同一理由，“廉价出售”导致价格的暴涨。这样，在生产者中间曾是战争武器的东西，迟早会成为消费者们贫穷的一个原因。如果在这个原因上再加上我们已经列举的一切原因，首先是人口的过度增加，那么我们就应该很好地承认，消费者大众的贫困是直接由竞争产生出来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趋向于汲干消费源泉的竞争，推动生产达到一种高度的活跃。普遍对立所产生的混乱状态使每个生产者都不能对市场有所了解。他应该靠着侥幸来把他自己盲目制造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尤其是当每个生产者可以把自己的损失通过那种非常有伸缩性的工资转嫁到工人身上去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对他自己有所节制呢？甚至是赔本生产的，也不肯不继续生产下去，因为这些人不愿意丧失他们的机器、工具、原料、建筑物的价值以及尚存的顾客，并且因为在竞争原则的支配之下，既然工业只是一种碰运气的赌博，赌徒就不愿放弃掷几下交运的骰子所能使他侥幸得到的利益。

所以，我们应该强调这种结果是并不过分的，竞争迫使生产增长并迫使消费降低；所以，竞争恰好和经济学的目的相违背；所以，

竞争既是压榨又是疯狂。

当资产阶级武装起来反对在他们打击下而垮台的那些旧势力的时候，他们宣称这些旧势力是处在神志不清和冲昏头脑的状态下的。好吧！资产阶级今天也到了那个地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看出自己的全部血液已经外流，而且他们还用自己的双手撕裂着自己的肚肠。

是的，目前的制度威胁着中产阶级的财产，同时对穷人的生存也带来了一种残酷无情的危害。

谁没有看到“法国邮船公司”为了反对“拉斐特和卡雅尔邮船公司”同“皇家邮船公司”的联合而进行的诉讼呢？这是什么样的诉讼啊！虽然这件诉讼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赤裸裸地暴露了我们社会情况的弱点；人们对它所加的注意远不如人们经常对于议会中勾心斗角所加的注意。但是，在这一诉讼中，令人惊讶和大惑不解的是人们没有能够从中得出自然地应得出的结论。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什么呢？两家邮船公司为了压倒第三家邮船公司而联合起来，它们因此而被控告。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风波。法律被违反了，这就是那条为了阻止强者对弱者的压迫而不许可联营的保护性的法令；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条法令禁止拥有十万法郎的人与另一个拥有十万法郎的人联合起来反对第三个拥有十万法郎的人，因为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第三者的破产；然而那条同一法令却又允许拥有二十万法郎的人向那个只有十万法郎的人进行斗争！试问，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无论是在第一种情况或在第二种情况下，难道不总是一个较雄厚的资本向一个薄弱的资本进行攻击吗？难道不总是强者对弱

者进行搏斗嗎？难道不是仅仅由于力量对比不平均就使搏斗成为可憎的嗎？一位辯护律师在这件著名的案件中說过：“每个人为了使别人破产，可以使自己破产，这是許可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說的是真話，而人們也感觉到事情就是这样簡單：“每个人为了使别人破产，可以使自己破产，这是許可的！”

那些为現制度辯护的政論家們，当他們将信将疑地认为危险业已来临时，当他們像《宪政报》和《法国邮报》最近在文章中所表現的那样大声疾呼时，他們所主张的是什么，而希望的又是什么呢？

这两张报纸說：“唯一挽救的办法就是彻底实行这一制度；对所有反对这个制度全面发展的东西，都加以毁灭，从而最后以商业上的絕對自由来促成工业上的絕對自由。”什么！这就是挽救的办法嗎？什么！制止战争灾禍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大战场嗎？什么！在工业内部进行着的互相吞噬还不够，还得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之上增加一种新的顛复活动的无穷糾紛嗎？他們要把我們引入混乱中去。

我們也不理解那些人想用怎样的神秘方法把两种相反的原則結合起来。把社团結合在竞争制度上是一种无聊的想法，这等于用两性人来代替太监。社团只有在普遍性的条件下才能构成一种进步。在最近几年中，我們曾看到創辦了大批的合資公司。誰不知道它們丑恶的历史呢？無論是一个个人与另一个人进行斗争，或是一个社团对另一个社团进行斗争，反正总是爭斗和暴力的統治。然而，資本家集团之間又是怎样呢？这里是一些非資本家的工人，你把他們怎么办呢？你拒絕把他們当作成員，难道是想把他們当作敌人嗎？

是不是有人說，动产的过度集中会分散继承原則而受到抑制并使情况不再严重化，而资产阶级的势力倘被工业所瓦解，就会通过农业而重新形成呢？这是錯誤的見解！土地产权的过度分散，倘我們不加注意，是会导致重新形成大地产的。設法去否认这一点是徒然的，因为土地分割成小块，那就是小耕农制，也就是說用鏟来代替犁，也就是用老一套代替科学方法。土地的分割使农业不能利用机器，不能利用資本。沒有机器就沒有进步；沒有資本就沒有牲畜。在这情况下，小范围的经营如何能抵抗大規模经营的竞争而不被兼并呢？这一結果还没有发生，因为土地的分割尚未达到极限。但是等着瞧吧！在等待期間，你們看到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小土地所有者都是按日計工的劳动者，一星期中在家里做两天主人，其余的时间他就是邻居的“农奴”。他越增加他的土地，他就越来越接近农奴的地位。事实上，你也可以看看事情的经过是怎样发生的：某一个农民，自己只占有几亩貧瘠的土地，这几亩地由他自己去耕种，虽然每年使他可以得到最多不过百分之四的收益，然而一有机会，他还是要扩大他的土地的。他用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借得来的錢，去扩大他自己的土地。因为在农村里虽然缺少信貸，高利貸却是不少的。这就可以猜想到那些后果了！一百三十亿法郎，这是法国地产所負担的債務。这就是說，除一些成为工业的主人的金融家而外，又出現了一些成为土地的主人的高利貸者。因此资产阶级在城市里和乡村里都走向崩溃。一切都在威胁着他們，一切都在炸毀他們，一切都在使他們破产。

像今天那样組織起来的或者不如說那样无組織的工业，在資

产阶级内部，已经发生了可怕的道德沦亡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不预备多说什么，以免人云亦云，以免使真理成为空洞的理论。一切东西都成为可以买卖的了，并且竞争已侵入到思想领域中去了。

这样，工厂压倒手工业；豪华的商店并吞小商铺；独立自主的工匠被不自主的按日计工的劳动者所代替；用犁耕种土地胜过用镢耕种土地，并使穷人的土地落到高利贷者的可耻的支配之下；破产增加了；信贷的没有节制的扩张把工业变成一种赌博，在那种赌博中，谁也没有把握能否取得胜利，连骗子也没有把握；最后，这种只能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唤起嫉妬、疑忌、仇恨的广大的紊乱现象，逐渐扑灭了一切光明磊落的胸怀，逐渐使一切信义的、忠诚的、诗意的源泉都干枯了……这就是采用竞争原则所产生的后果；这是一幅丑恶而又极其真实的图景。

既然这种可悲的制度是我们从英国人那里抄袭得来的，那么，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制度给英国的光荣和繁荣做了些什么。

IV 被英国的例子所譴責了的竞争

英国人曾說，資本和劳动是两个天然敌对的力量。那么应该怎样使这两者并存而又相輔相成呢？对这件事情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工人永远有工可做；而业主在产品暢銷的情况下，得到公道地支付劳动工資的錢財。問題不就解决了嗎？当生产无限活跃而消費有无限伸縮性时，誰还有理由来抱怨或企图抱怨呢？工人們的工資将永远够用，厂主們的純利将永远是可观的。让人类的活动无限地发展吧！并且不让任何东西来妨碍它的活力。讓我們大胆而毫不顾虑地宣布放任政策吧！英国的生产是否太单調，以致不能长期給貿易提供久远的前途呢？好吧！我們就来訓練水手，建造船只，使我們可以在全世界进行貿易。我們住在一个島上嗎？好吧！我們可以到各大洲去靠岸。我們农业所提供的原料数量过于有限嗎？好吧！我們就到世界边缘去寻找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全世界的民族都成为英国产品的消費者，英国則为全世界的各族人民而劳动。生产，不停地生产，利用各种方法来刺激其他国家从事消費；英国的全副力量就放在这项工作上；那就将使英国发财致富，使它的后代的天才得到发展。

这是何等庞大的計劃！这几乎是一个既自私自利而又荒謬絕倫的計劃，而且这就是最近两世紀以来，英国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毅力所推行的計劃。嘿！当然，錮居在这样一个貧瘠多雾的小島上

的英国人，一旦离开那里，就以商品而不是以军队去征服世界；几千条轮船驶向东、西、南、北各方；教导很多国家去享受它们自己的财富；把欧洲的产品卖给美洲，把印度的丰富的物产卖给欧洲；使各国依赖英国的存在而生存下去，并且通过世界贸易的无数联系把这些国家系在它的腰带上；英国发现黄金是一种可以与利剑相比的力量，发现庇特^①是一个使胆大妄为的拿破仑也会踟蹰不前的人物；这一切组成了使人眩目而惊异的伟大气概。

但是，英国为了达到它的目的，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它那贪婪的欲望和狂热的妄想有什么止境呢？难道还必须回忆它如何侵占了埃塞奎博和苏里南，锡兰和德摩拉里，托贝戈岛和圣·卢西亚，马耳他和科福^②，而把世界囊括在它那庞大无边的殖民地罗网里吗？大家知道，自麦逊条约^③以来，它是怎样在里斯本建立起它的势力的，而且它是通过怎样的滥用强权而在印度建立起它自己的商业暴政的，这是在荷兰的势力范围之旁，混杂在由瓦斯哥·达·伽马^④和阿尔比克尔克^⑤所缔造的殖民残迹中建立起来的。此

① 威廉·庇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是反对革命的法国以及后来拿破仑的法国的欧洲国家联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译者注

② 埃塞奎博，英属圭亚那的一道河；苏里南，荷属圭亚那的一个地区；德摩拉里，英属圭亚那的一道河；托贝戈岛，英属西印度联邦的东南岛屿；圣·卢西亚，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中部岛屿；科福，伊奥尼亚群岛（希腊）的第二大岛。——译者注

③ 约翰·麦逊（1650？——1706），英国政治家。1703年与葡萄牙签订麦逊条约。该条约对英国商人甚为有利。——译者注

④ 瓦斯哥·达·伽马（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他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路。为了征服印度，三次到达印度。他的发现，先后成为葡萄牙人及其他欧洲人的掠夺性殖民政策的起点。——译者注

⑤ 阿尔奉苏·阿尔比克尔克（1453——1515），葡萄牙的航海家和侵略者，曾把印度沿海的许多土地变为葡萄牙属地。——译者注

外，誰都知道它的貪欲給法国所造成的禍害以及通过怎样不择手段的和背信弃义的挑衅性战争在血泊中推翻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統治。还有，对于很久以来給英国保证海上霸权的那些暴力行为，我們又能說些什么呢？英国曾经尊重或者甚至承认过中立国的权利嗎？它所实施的封鎖禁运不是已经成为一种最蛮横的暴政了嗎？它不是把船舶检查权变成一种最恶劣的海盗行为嗎？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讓我們再重复說一遍，这就是为了获得供工业用的原料和銷售市場。

两世紀以来，这种思想完全是英国的主导思想，因此，英国在自己的殖民地经常使人們不去种植像稻米、甘蔗、咖啡等等那样的生活必需品，而积极地推动他們去生产棉花和蚕絲。但是怎么样的呢？英国在粮食进口方面規定了特別高的和（假如可以这样說的話）杀人不見血的稅額，而一切原料則几乎可以自由进入它的所有港口；这真是一种丑恶的不正常的状态，以致律比雄先生曾經这样說过：“在世界各国中，英国人是劳动得最多而吃得最少的。”

的确，这就是这种冷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李嘉图^①曾殷勤地建立了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而馬尔薩斯則以这样冷靜的头脑从它那里得出了那种可怕的結論。

这一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帶有罪恶，它必然要使世界和英国遭到不幸。它以专心致志寻找消費者，也許應該补充說，寻找能够付錢的消費者作为基本政策。倘若不給人們以滿足欲望的能力，那

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譯者注

么，唤起这种欲望又有什么用处呢？英国为了想把一些民族作为消费者而以自己的活动代替其他民族的活动，就终于使这些民族破产，因为它吸干了他们的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这不是很容易预见到的吗？而英国人使自己专门成为生产者，他们能不能希望他们的产品始终在专门从事消费的民族中畅销呢？显而易见，这种希望是不明智的。总有一天，英国人会在使别人死于饥饿的同时使他们自己死于饱胀的。总有一天消费者的民族再也找不到可供交换的物资，这对英国来说，就会因此发生销路堵塞、无数工厂倒闭、工人群众贫困以及信贷总动摇等等的后果。

如果要了解缺乏远见、生产的盲目性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那就只要参考一下英国工业史和商业史就够了。有时，英国商人把滑冰鞋运到从未见过冰的巴西去^①，有时，曼彻斯特在一星期内把过去二十年間所没有消费完的更多的商品运往里约热内卢^②。生产在扩大自己的资源、耗尽自己的精力的同时，经常是不去注意可能的消费方法的。

但是，再说一遍，一个国家如果把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的责任放在别国身上，就是逐渐掠夺别国的资本，就是使它变得穷困；因而就使它愈来愈缺乏消费的能力，因为人们只能消费他们的能支付代价的物品。英国需要一些国家来消费它的产品，而它却使这些国家普遍穷困起来，这就是恶性循环。英国在这一循环中已经转了两个世纪了；你看，这就是英国制度的罪过、深重而无法补救

① 毛胡：《巴西旅行记》。

② 同上。

的罪过。这样（我們所以強調这一观点，是因为这一观点特别重要），英国就处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奇怪情况中，那就是它被两个同样有效的破产原因所支配着：即其他国家的劳动和它們的不积极劳动。前者可以給它造成一些竞争者，而这种竞争者是它所不能永远战胜的；后者則剝夺了它所不能缺少的消費者。

这就是在小范围内已经发生而在較大范围内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的情况。英国的产品增加得那么多，而預定作为交换这些产品的物資数量却达不到上述增加的比数，这一事实使它遭受多大損失呢？有多少次，英国按照預計的数字进行生产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以致受到惨痛的懲罰呢？人們不会很快就忘記那次重大危机，它成为英国人在墨西哥到巴拉圭之間的地区上所进行的阴谋的惨重失敗。消息刚传到英国說，南美給工业冒险家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园地，立即就举国欢騰，全都跃跃欲試。这曾經成为全国性的狂热。在英国，生产从来没有达到如此疯狂的程度。据那些投机者說，在几天內，用几只輪船，就可以把美洲所蘊藏的无限財富运进大不列顛来。信心很高，以致那些銀行也迫不及待地铸造輔币以期捷足先登。这次大規模运动的結果是什么呢？人們对于一切都計算到了，只是沒有計算到交换物品的存在与否和运输上的便利問題。美洲有着它的黄金，而黄金却不能从矿中开采出来；而受到烧杀的国家，既无法提供棉花，也沒有靛青来交换人們給它运来的商品。这一荒唐玄妙的事件，使英国人付出无数的代价和眼泪，这一点，英国人知道，欧洲人也知道。

人們千万不要认为我們是以个别的例子作为常規而論证的。我們指出的这一罪过产生了它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害处。因为，一

方面英国在国外用尽了难以想像的力量使全世界都受它工业的支配，另一方面它国内的情况给细心的观察者提供什么样的景象呢？工厂接连开设；发明相继而来；北方的高炉被西方的高炉挤垮了；工业人口在无限竞争的多种刺激下无限度地增长着；供人们食用的牛的数量远不及人们必须饲养的马的数量；施舍的面包逐渐代替劳动所得的面包；济贫税实行了，可是贫民的人数到处增加；最后，英国向惊讶而愤恨的世界展示了一幅贫富悬殊的图景：这些就是国家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为政策而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个原则就是英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到处去寻找商品的消费者。

为了形成这些灾祸性的结果，英国不是干着很多非正义的行为、鼓动叛乱、挑拨离间、制造战争、收买罪恶的同盟并攻击各种高尚的思想吗！

但是，我不再往下说，不去说完这段阴暗的历史，这是为了避免别人责难我，说我有意侮辱这一坚强而古老的英国民族。不，尽管英国给全世界和我国造成了灾害，但是我既不願意也不能忘記的是：英国也能在各民族的历史中占有几页不朽的篇幅；英国比欧洲各国先获得了自由；英国的法律，即使处在贵族压迫的桎梏下时，还能给与人类的尊严以惊人而庄严的尊敬；这是从英国的内心所发出的最猛烈最强有力的呼声，来反对宗教裁判所的暴政以及和它相结合的罗马教会的暴政；就是到了今天，它还是没有使政治上的狂暴把它变成使弱者不能存身和遭到杀害的唯一国家。最后，唉！贫穷而高贵的被放逐者们，没有被战败却受了伤的大力士们，这是在那里，你们终于找到了避难所；在那里，你们重振了我们残余的事业；在那里，你们享受着心灵生活和精神生活，

而这些是你们处在大灾难的情况下，你们的敌人的愤怒让你们保持的唯一东西；从那里，你们在思想方面也追随着我们，而我们却和你们几乎是同样地不幸、同样地被放逐似的；因为我们只能偶然在自己的周围找到祖国。我们固然生活在祖国，但是，唉！看到她这样受到委屈，我们不再能认识她了！

此外，英国已经得了全面的报应。一个近代的政论家曾经说过，报应是一部对每个人和对每个民族都适用的刑法法典。这一真理被英国的历史沉痛地证明了。今天英国的强盛达到什么地步了呢？它已经失去了海上霸权。它在印度的财产受到威胁。还在不久以前，英国贵族几乎为土鲁斯^①的战胜者执灯，他们不敢再把他叫做是滑铁卢^②的战败者了。

而世界上这个最有势力的最优秀的英国贵族阶级变成怎样了呢？让我们找一找他们的领袖人物吧。是不是一个无名画家的儿子林德赫斯特勋爵呢？还是被庇特封为男爵的棉织厂主的儿子、罗伯特·皮尔爵士呢？或者还是韦尔斯利的爱尔兰族的衰老的代表惠灵顿勋爵呢？这些就是英国贵族阶级的领袖人物；就是这些人领导着这个阶级，统治着它并代表着它。而这些人 and 英国贵族阶级并不是同一血统的！

有一天，维斯特敏斯特侯爵在上议院大声疾呼地说道：“有人说，我们这些英国土地所有人可以牺牲我们收入的五分之一。说

① 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大城市，1814年拿破仑的军队在这里战胜过英国军队。——译者注

② 比利时的居民点。在布鲁塞尔以南。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一役，拿破仑被英荷联军和普鲁士军队击败。——译者注

這些話的人，難道他們不知道其餘那五分之四是屬於我們的債權人的嗎？”

這幾句話顯然有些夸大。可惜，太真實的是：在英國，采邑的不能出讓就使貴族的大部分收入免于追訴，而這些收入却是無限龐大的。如果，這好像是確實的，這些收入對英國五百戶上議院議員的家庭來說就高達一億三千五百萬英鎊，而對男爵、爵士、紳士家庭的四十萬人來說就高達十三億英鎊，那麼，應該承認英國貴族從全世界剝奪來的財物中得到了相當可觀的一部分。但是，人們已經看到了在英國商業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威脅。貴族階級既是所有工業合股公司的股東，人們可以預言，貴族不久就要開始受到物質上的懲罰。

至於對貴族精神上的懲罰，也沒有比這更慘痛的了。這些大貴族的財富使他們受到無名的空虛的憂郁症的折磨，這是上帝賜與世界上大人物的一種疾病，好讓他們也處在痛苦之中，而痛苦是加於一切人身上的強有力的嚴厲的教訓！這些傲慢的貴族，在他們享受之中實際上所得到的的是什麼呢？他們所找到的是思想上的苦惱和心靈上的永遠不安。於是他們就不得不逃避他們小島的濃霧，挑着使他們感到厭倦的財富的担子，前往他們曾從那里奪得金錢的世界各處去散播這筆金錢。

現在，問題是要知道資產階級的法國是否也要效法英國。問題是要知道法國為了給自己的強大工業尋找永遠是新的原料，是否要想取代聖喬治宮在海洋上的那種可惡的統治。因為，對於一個偉大的民族來說，那就是競爭的邏輯所不可避免地要到達的地步。但是英國決不會不動干戈就讓別人把海上霸權奪走的。

V 竞争必然导致法英两国間 的一場殊死战

如果要使两个民族間的同盟成为自然而然的，就必须使这两个民族在協議中相互提供利益；所以，必須使它們拥有非共同的富源，必須使它們在組織上和在目的上有所差別。法国和英国是两个强国，它們要依靠外国的供給而生活，并要求向外扩张；因而，它們之間的一切持久同盟就首先发生了障碍。羅馬是用战争来扩张的，而当迦太基^①意图用貿易在羅馬面前扩张时，羅馬和迦太基終于在世界各处遭遇，并且发生了冲突。

法英两国間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結構在今天是一样的，并且这两个国家已基本上成为航海的国家。統治着我們社会秩序的原則不就是无限制的竞争原則嗎？无限制竞争的結果不就是不断地增长生产和进行冒险嗎？为了給发展得如此迅速和如此不規則的生产去寻找日新月异的銷售市場，难道不是需要在工业上去征服世界，并称霸海洋嗎？

从我們摧毁了行会头子和小业主的那一天起，自然而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世界上出現了一个多余的国家；或者是法国应当改变它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把英国从地图上划掉。的确，从那一天起，在这一长期的敌对情况上又增加了一些不寻常的复杂情

① 非洲一个繁荣的古代城市国家，是羅馬的劲敌，后为羅馬所灭。——譯者注

况，这种敌对情况在十五世紀时，曾使貝德福德公爵来到巴黎^①，使查理七世逃至布尔日^②。1789年，法国采用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传统；它按照英国民族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工业民族。踏上了剧烈的竞争道路以后，它不得不到处开设银行，在各港口设置代理人。但是要和英国争夺海洋，这简直就是要英国的命。英国也分明知道这一点。于是就产生了由英国买通而组成的同盟；于是就产生了对欧洲大陆的封锁；于是就产生了庇特和拿破仑之间的可怕的决斗。但是，庇特已经死去，拿破仑受到了慢性的暗杀，斗争却仍然必须重新开始。也许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个斗争：那就是使法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农业国，英国仍然是工业国。以上这些，我们的政治家们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梯也尔^③先生最近在议会中说道：“法国应该满足于做大陆国家中的首要国家，”这时，肯定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因为倘若有人向他叫嚷，问他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又怎样回答呢？不，尽管海洋多么广阔，而在这海洋上，却不能同时既有法国又有英国的地位，这两个国家是被同样的经济法则所统治着的，因此也受着同样精神的支配。既然这两个国家都想设法向国外扩张，既然它们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生活下去，它们怎能不时常互相遭遇和发生冲突呢？问题的概括就在这里。所以在最近的条约中，英国把

① 貝德福德公爵是英王亨利第六的叔父，英国于1415年在阿曾古尔地方战败了法国之后，他就任法国的摄政王。——译者注

② 查理七世于1422年在布尔日加冕为法国国王，在他当政时，法国人民把当时占领着法国的英国人逐出法国。——译者注

③ 阿道尔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的政客和历史学家，摧残1871年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译者注

法国排挤出去的动机也纯粹是贸易上的动机。关于这一点毫无疑问。帕默斯顿勋爵^①的报纸——《环球报》，说得更加明显。这家报纸说，倘若帕默斯顿勋爵要冒一切危险和法国绝交，倘若他促使圣-詹姆斯^②的内阁利用叙利亚爆发的叛乱来反对穆罕默德—阿里^③，这是因为他看到使叙利亚在商业上受英国的保护对英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帕默斯顿勋爵的计划很简单：他把叙利亚看成是东方的钥匙，而想把这柄钥匙放在英国手中。他们要和土耳其政府签订一个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的条文，叙利亚总督要完全按照英国政府代表的意见行动。英国首相，像人们可以看到的那样，对他的计划并不保守秘密。要给英国轮船打通三条可以通往印度去的航路：第一条经过红海，第二条经过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第三条经过叙利亚、波斯和俾路西斯坦；英国的希望大致如此。有人认为，英国为了实现这些希望，竟肯把君士坦丁堡让给俄国。《环球报》坦率地说，这三条通往印度的航路一旦打开，沿途就会到处都是市场。因此，今天的英国仍然是旧日的英国：今天像昨天一样，像以往一样，这贪得无厌的勇往直前的民族必须去寻找并且得到产品的消费者。英国有棉毛纺织品需要销售市场？快些征服东方，好使英国负责供给东方衣着。这是否要使法国屈辱呢？对英国来说，完全不是这回事，实在说来，这是它的生存问题；而它只有在通过自己的商人去奴役世界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因为这是它的经济体制

① 亨利·约翰·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反动的国务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首相等职。——译者注

② 圣-詹姆斯系指英王所居住的王宫而说的，这里的意义就是说“英国的内阁”。——译者注

③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埃及的摄政王。——译者注

需要它这样作的。

倘若竞争的原则仍然坚持下去，无论对英国或对法国来说，这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竞争必然给世界带来骚扰。假如法国为了民族自由而动武，那么所有勇士都会衷心拥护的；但是是否要从而造成追随英国残暴的后尘呢？如果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征收济贫税，那是不值得去掠夺全世界的。

目前的社会秩序是不好的，应该怎样改变它呢？

按照我们的看法，让我们来谈说明什么样的挽救方法是可能的。不过我们事前要向读者声明，我们下文指出的那种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我们只把它看做过渡性质的。

結論：按照我們的意見，人們可以用 什麼方法来組織劳动

政府应当被认为是生产的最高調节者，并且为了完成它的任务，被授予一种巨大的权力。

这项任务就在于利用竞争的武器去消灭竞争。

政府可以发行一笔公債，用这笔公債的收入在国家工业的最重要部門中創辦一些社会工場。

这种建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因而初建的工場数字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正如我們下面会看到的那样，这些工場根据它們本身的組織就具有庞大的扩张力量。

既然把政府看作是社会工場的唯一創辦人，那么，当然要由它来制定規章。而这种制訂的規章经全国代表大会討論和表决后，就具有法律的形式和效力。

在最初为了购置劳动工具而征集的資金的範圍內，所有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都可以被征召到“社会工場”去劳动。

虽然現在这一代人所受到的錯誤的和反社会的教育，使人們在增加收益的办法以外，很难找到起竞赛和鼓励作用的因素，但是工資将是平等的，一种完全新型的教育定会使思想和风俗习惯发生改变。

社会工場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指定各級人員。一年以后就不再如此了。工人們既然有時間可以互相鉴定，并且，正如我們

将看到的那样，他們既然都关心社团的成功，那么，各級人員就可根据选举原則产生。

每年都要結算純利潤，把它分为三份：第一份按照社团成員的人数平均分配；第二份专门用于：1)老、病、残废者的扶养；2)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因为所有工业都应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最后，第三份則用来为志願参加社团的人购置劳动工具，这样，社团就可以无限地扩展。

在那些可以进行大規模经营的工业的每个社团中，可以招收一些属于某种职业的工人，这些职业由于本身的性质，不得不分散而且又局限在一地。这样，就使每个社会工場都由各种不同的职业所組成。这些围绕着一个大工业而組織起来的各种职业成为同一整体的各个不同部分，它們都須服从同样的法律，并分享同样的利益。

社会工場的每个成員都有随意处理自己工資的权利，但是由于共同生活的显而易見的节约和不容置辯的优越性，不久就会从劳动的社团中产生出那种自願参加的关于需要和享乐的消費社团。

資本家也可以被邀請参加到社团中来，并且可以支取他們投資的利息，这种利息是在預算案中得到保证的；但是他們只能以工人的身分分得利潤。

一旦社会工場按照这样的原則建立起来，我們完全可以看到它所能产生的結果。

在主要工业，例如机器工业、絲綢工业、棉紡工业或印刷工业中，都会有一个社会工場和私人工业进行竞争。这一斗争是否能

長久繼續下去呢？不能。因為社會工場比起一切私人工廠來，有它的有利之處，這種有利之處是共同經濟生活的結果，並且是一種組織方式的結果，在這種組織方式中，所有工人都毫無例外地關心着生產得好和生產得快。這一鬥爭是不是破壞性的呢？不是的，因為政府總是採取辦法來阻止這些工場的產品價格降低到最低水平，以減弱鬥爭的效果。而今天，一個非常有錢的人和不太富有的人決鬥時，這種不平等的鬥爭只能是帶有災難性的，因為個人永遠只是追求他的個人利益；假如他比他的勁敵以便宜兩倍的价格出售他的產品，就能使他的敵手破產，並獨霸市場，那他一定會這樣做的。但是，當政權本身處於個人的地位時，那麼情況就不同了。

我們所要建立的這種政權，是否會對於打亂工業、動搖一切生計感到興趣呢？由於它的本質和地位，政權原來就是保護者，而在為改變社會的目的而同某些人進行神聖的競爭時，它還是這些人的保護者，這難道不是真的嗎？因此，在一個大資本家今天向一個小資本家宣戰和在我們制度中的政權向個人宣戰之間，是不能相比的。第一種戰爭必然會使用詭計、暴力以及非正義本身所帶來的一切不幸；而第二種戰爭的作戰方式則是不粗暴、不破壞，並且只是用這種方法來達到它的目的，就是用社會工場來逐步而和平地兼併那些私營工場。政府不會像今天的一切資力雄厚的資本家那樣，充當市場的主宰和暴君，而是將成為市場的調節者。政府使用競爭的武器，不是為了用暴力來推翻私營工業，——這正是政府所極力要避免的事——，而是為了不知不覺地把私人工業帶到組合中去。的確，如果一個社會工場在任何工業中建立起來，那麼人們就會看到，無論是工人或資本家都將為了這種工場給社員所

提供的利益而奔向它那里去。在一定的時間以后，人們将会看到有利于社团原則的沒有强夺、沒有不公正行为、沒有不可挽救的灾害的現象，而在今天所产生的現象則是非常可悲的，并且由于暴政，它服务于个人主义。今天，一个非常富有的工业家可以狠狠地打击他的对手，而把他們當場打死，这样他就能垄断一个整个工业部門。在我們的制度下，国家逐渐成为工业主人，而我們成功的結果将不是垄断，而是竞争的消灭：那就是社团。

讓我們假設在一个工业的特殊部門中已经达到了目的；讓我們假設那些机器制造商有意为国家服务，这就是說，有意服从共同管理的原则。既然同一种工业并不总在同一地点生产，而且既然它有不同的中心，那么，就有可能在所有属于同一种工业的各个工場之間建立一种在每个个别工場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团制度。因为在消灭了个人与个人之間的竞争以后，再让竞争存在于团体与团体之間，那是荒謬的。所以，在政府已经能够控制的每一种劳动領域內都要有一个中心工場，而其他一切工場則都作为附属工場而隶属于它。正如罗特希尔德先生^①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拥有企业，这些企业和总事务所所在地互通消息，同样地，每种工业都有一个总办事处和它的分办事处。从这时起，再不会有竞争了。在属于同一工业的各个不同生产中心之間，利益是共同的，而力量的集中将代替一切破坏性的力量的敌对。

我不再強調这一结构的简单性，这种简单性是明显的。事实上，你們可以注意到在第一年之后，每个工場都可以自給自足，而

^① 見第24頁注^①。

政府的任務只限於監督如何去維持一切同類生產中心之間的关系，並制止對於共同規章原則的破壞行為。今天，沒有一個公共機關不是比以上所說的更複雜百倍的。

試想一下，假如每人原來可以隨意負責帶送信件，而政府突然宣稱：“讓我來，讓我單獨來辦理郵政事業！”該有多少人反對啊！政府怎麼能夠在規定的時間內，正確地把三千四百萬人每天每分鐘可以寫的信送到三千四百萬人手中呢？然而，除了某些不是由於機構的本質而是由於我們的政權至今所存在的結構不健全而產生的缺點外，大家都知道，郵政工作是以多么驚人的準確性來完成的。我不談我們的管理制度以及這個制度所要求的一切機構的錯綜複雜性。然而你們看這個龐大的機器的活動該有多么大的規律性呢？的確，正如大家所說的那樣，是分工和再分工的方法使表面上看起來是最複雜的機械裝置自行開動起來的。怎麼！怎能認為在一個國家里不可能使勞動者行動一致呢？而人們看到，約二十年前，在那裡一個人能用他的意志來鼓動一百萬人，使這些人按照他的生活來生活，並按照他的步伐前進的。的確，這是為了進行破壞。但是，既然共同進行破壞是非常容易的，難道在事物的本質中、在上帝的意志中、在社會的注定命運中，就不可能共同進行生產嗎？此外，我再重複一遍，從實行困難的角度所提出的非難在這裡並不是嚴重的。我們要求國家用它所擁有的富饒的財富和各種各樣的手段，來做我們今天由一些個別的普通人所做的事情。

我們從一個工廠的全體工人的團結一致形成同一種工業的各個工廠的團結一致。為了使那個制度完整起見，就應該形成各個

不同工业之間的团结一致。为了这一点，我們就从每个工业已经实现的利潤分配額中抽出一笔款項，国家用这笔款項就可以援助那些受到突如其来的或特殊的情况的襲击的工业。此外，在我們所建議的制度中，危机一定要少得多。今天大部分的危机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是从一切利害冲突的残酷战斗中产生的，这种战斗既然造成一些战胜者，就不能不造成一些战败者，并且像所有的战斗一样，它把奴隶套在战胜者的战車上。消灭竞争，就可扑灭它所孕育的灾禍。不再有胜利；就不再有失败。从此，危机就只能从外而来。所以也就只需防止这些外来的危机就够了。和平和同盟的条約对此无疑地是不够的；然而，倘若人們以一个建立在工业需要和世界各地劳动者的相互便利的基础上的同盟体系，来代替这一可耻的外交——这种虚伪、欺騙和卑鄙的斗争，它是以几个幸运的强盗瓜分各民族为目的的——，那么，該能避免造成多少灾难呢？但是，我們应当注意的是，只要那种吞食着我們工业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这种新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实行。从几年来进行的許多調查来看，就显得非常清楚。怎样的凄惨景象我們沒有見到呢？这些調查不是已经給我們指出，殖民者武装起来反对制糖商、机器工人反对铁厂主、港口反对內地的制造厂、波尔多反对巴黎、南方反对北方、所有生产者反对一切产品的消費者嗎？在这些异常混乱的情况下，政府又能做些什么呢？一些人所迫切要求的東西，就是另一些人所憤怒地拒絕的東西：使这些人得以生活的東西，就是使另一些人死亡的東西。

显然，这种在利益之間的缺乏团结一致就使国家不可能有任何預見性，并使国家在它和列强的一切关系中受到束縛。对外用軍

隊，對內用憲兵，今天的國家沒有別的行動辦法，而它的整個效用必然只限於摧毀一方以防止摧毀另一方。如果國家堅決地着手領導工業；如果它能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來；如果它圍繞着同一原則把今天一切敵對的利益重新聯合起來：那麼，它的對外行動怎能不是更加明確、更有收穫和更加慶幸地具有決定性呢？重新組織勞動，不僅會預防在我們當中爆發危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會預防那鼓起我們船帆的風所給我們帶來的危機。

我是否需要繼續列舉新制度所產生的優點呢？在我們所處的这个工業世界裡，一切科學上的發明都是災害，首先因為機器排擠了那些為了生活而需要勞動的工人，其次，因為有多少機器就是有多少殺人的武器，給予有權利、有能力使用機器的工業家去反對沒有這種權利或能力的人們。在競爭的制度下，誰一談到新式機器，誰就談到壟斷；這點我們已經證明過了。但是，在社團和團結一致的制度下，不再有發明的專利權，不再有專利的專用權了。發明者由國家給予獎勵，他的發明很快被大家使用。因此，今天的毀滅性的工具將成為普遍進步的工具；今天使工人陷於飢餓、絕望並促使他起來反抗的東西，將只成為用來減輕他的工作負擔並給予他以足夠的空閒時間去鍛煉他的智慧的東西；總之，以前助長暴政的東西都將有助於博愛的勝利。

我們今天置身在不可理解的混亂中，在這種情形下，商業並不從屬於也不能從屬於生產。既然一切生產都歸根結底為了尋找消費者，而所有生產者都致力於爭奪消費者，那麼，怎么能免除經紀人、掮客、買賣人和小販呢？商業就這樣變成了生產的蛀蟲。介於勞動者和產品消費者之間，商業統治着這兩者，並利用一方來統治

另一方。傅立叶^①有力地攻击了目前的社会制度，以后，他和他的門徒維克多·孔西代朗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邏輯赤裸裸地揭露了人們称之为商业的这一社会的大禍害。商人應該是生产的一个代理人，分享生产的利潤，并与生产的有利与否休戚相关。那就是理智所要指出的，也就是全体利益所迫切要求的。在我們所建議的那个制度中，沒有比这点更易于实现的了。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工业中消除了各个生产中心之間的对立情况，这个工业就像今天的那些重要貿易公司那样，到处都有根据消費需要而設立的商店和倉庫。

信貸應該是什么呢？應該是給劳动者提供劳动工具的一种方法。而今天呢，正如我們在別处所指出的那样，信貸完全是另一回事^②。銀行只把款子借給富人。即使銀行也願意把錢借給穷人，它也不能这样做，否則它就会墮入深淵。所以，無論如何，以个人观点建立起来的銀行永远只能是一种設想周到的使富者更富、强者更强的方法。垄断总以自由的外表出現，暴政則总以进步的面貌出現！我們所建議的組織直截了当地消除了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特別地和不可变更地专门用于招募工人以扩大社会工場的这一部分利潤，就是信貸。这时候，你們还需要銀行做什么呢？取消它吧！

当他的收入有了保证时，任何劳动者必然会有遵守秩序的观念和預見的习惯，那时还怕会有人口过剩嗎？为什么今天穷人比富有的人繁殖得更快呢？关于这一点我們已经說过了。

在一种制度下，每种劳动門类都把一定数目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被同样的思想所鼓舞，按照同样的动机去行动，有着共同的希

① 夏尔勒·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譯者注

② 參閱論文《銀行問題》，載1839年12月1日的《进步杂志》。

望和共同的利益；試問，在這種制度下，偽造產品、投機取巧、漫天說謊、貪污舞弊等等的行為還有什麼存在的余地呢？而今天，每個生產者和每個商人，既然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要搶走鄰人手里的顧客和他的財產，就不得不去做上述的那些行為。所以，在這裡，工業的改革實際上是一種深刻的道德革命，並且，它在一天之內所能完成的轉變，要比講道者的說教和道學家的一切勸誡在一個世紀內所做到的還要多。

剛才所談到的有關工業的改革將使我們充分預見到，我們所要見到的農業改革將按照什麼原則並在什麼基礎上進行。濫用旁系親屬的繼承權，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種繼承權將要被取消，繼承財產所包含的價值將要被宣布為公社財產。這樣，每個公社就可以形成一片不得轉讓的莊地，並且，由於這種莊地只能擴大，就能在既不造成痛苦也不發生強奪的情況下導致一次龐大的農業革命；公社莊地的經營應該以較大的規模並按照和管理工業的法令相符合的法令來進行。我們以後再談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還需要加以闡述。

在目前的制度下，我們已經知道人民的子女為什麼不能受到教育。而在我們的制度下，受教育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們必須使教育成為義務的同時是免費的。既然勞動者的生活有了保障，他的工資也夠開支，他有什麼權利拒絕讓自己的子女入學呢？很多嚴肅的思想家認為，今天在人民的隊伍中來推廣教育是危險的，他們的這種看法是對的。但是，他們怎能不看到這種教育的危險正是我們社會制度不合理的有力證據呢？在這個社會里，一切都是虛假的：勞動不受尊重；最有用的職業被人蔑視；一個勞動者至

多只不过是受人怜悯的对象；然而，一个舞女却会博得无数的花冠。这就是为什么人民的教育是危险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立中学和一般学校给社会栽培出来的人只是一些野心家、一些不知足的人和一些草包。但是，应该教育人民去阅读好的书籍；教育人民使他们懂得最有利于全人类的东西才是最可尊敬的东西；使他们懂得在社会中只有艺术而没有手艺；使他们懂得没有比那些本质上就是为了腐蚀灵魂、向灵魂灌输骄傲的毒素、使灵魂远离博爱的实践并传播自私自利思想的东西更加值得轻蔑的了。然后，应该给人民的子女指出，社会是受他们学到的原则所支配的。难道这样的教育是危险的吗？人们把教育看作是能满足一切愚昧虚荣和空洞自利的垫脚石，因而人们就咒骂教育！有人参照坏的实例写出坏的书籍，因而有人认为有充分的权力来禁止别人阅读坏书！多么可怜啊！

让我们综述一下。应该进行一次社会革命的尝试：

1. 因为目前的社会秩序充满着太多的不公平、贫困、卑鄙，因而不能长久存在下去；
2. 因为不论一个人的地位、等级、财产如何，他不会不关心一个新社会制度的建立的；
3. 最后，因为这是一次十分必要的革命，所以有可能甚至不难以和平的方式去使它实现。

在革命使我们进入的那个新世界中，为了使博爱原则完全实现，可能还应该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一切都是教育的事业，至少就实现博爱原则这一点来说就是如此。人类业已远离他的目的，以致我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至今还受其束

縛的腐朽的文明打亂了各方面的關係，同時也攪亂了所有的思想，並且毒化了人類智慧的源泉。不公平變成正義；謊言成為真理；人們在愚昧無知中相互毀滅。

很多錯誤思想應當加以摧毀：它們將被消滅，我們對此不應當有所懷疑。舉例來說，總有一天人們會承認，誰從上帝那裡得到較多的力量或較多的智慧，誰就對自己的同類要擔負較多的責任。於是天才不再是通過他對社會所徵取的巨額報酬、而是通過他對社會所盡的偉大義務來確定他的合法地位，這是他的本份。因為，秉賦的懸殊不應歸結為權利上的不平等，而是義務上的不平等。

這一制度，其基礎還剛奠定，而自公布以來，就引起了很多的責難。這是必然的。今天在所有人們的頭腦里，對新事物有着小心翼翼的自然傾向。

然而，把我們的學說作為對象的那些批評，一般地具有一種恰如其分和不偏不倚的突出特點；這些批評甚至對於我們的努力的性質和目的表示了強烈的同情^①。

我們所談的這些問題具有一種特別的重要性；要解決它們，當然有巨大的困難。所以我們也只把這本書作為耐心和認真研究的結果來貢獻給大眾。如果我們犯有錯誤，就請給我們指出；我們的信心是堅定的，但我們也并非這樣自負，認為這些信心是根本不可動搖的。

^① 關於這一問題，我們不應忘記的是，這本書被禁止以後，曾經攻擊本書學說的「世紀報」就以最大的毅力起來反對那次訴追。毫無疑問，要使法院正確而迅速地糾正檢察機關的錯誤，固然無需這樣大的力量；但是我們仍然不應該不向「世紀報」的總編輯尚博勒(Chambolle)先生表示感謝，因為他在這種情況中會給予我們以高貴的和友愛的支持。

对各种批判的答复

我們將逐一研究人們曾經向我們提出的批判，并且，为了不致削弱这些批判的力量起見，我們把它們的原文轉載在这里^①。

請看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是用什么样的話来解释我們的制度的。^②

“讓我們直接研究这本书的內容而不去研究它的形式，也不加以評定。該书闡述的制度是公众所关心的。这就是在某些人头脑中所孕育的一些观念，除略有出入外，有些作家是不約而同地支持这些观念的，人們目前正在設法使这种观念在工人階級之間得到信任，并且已在工人階級中找到一部分拥护者。根据路易·勃朗先生作为解释者之一的該学派的观点，劳动組織就是由国家拨款开办社会工場，首先在国家的最重要的工业部門內創辦，然后相继在其他各部門內創辦。国家制訂社会工場的章程；交由全国代表大会討論，通过后，就发生法律的效力。

“一切在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都可以被招募到社会工場中去工作。

“第一年，由政府来安排各級人員；但在这一年以后的期間，工

① 直到目前为止，曾討論我們計劃的报刊，計有：《世紀报》、《宪政报》、《喧嘩报》、《法郎吉报》、《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环球报》、《十九世紀評論报》、《商业报》、《人民日报》、《两种世界評論》、《車間报》、《辯論日报》等。

② 見1844年8月21日的《辯論日报》。

人既然有了充分时间可以互相鉴定，各级人员就可以根据选举原则产生。

“纯利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由社团成员平均分配；第二部分专门用来扶养老、病和残废者，并用来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第三部分则用来扩大工场，给那些愿意参加工场的人提供劳动工具。

“在那些可以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工业的每个社团中，可以招收属于某种职业的人——这些职业由于它的性质而不得不分散开来和局限在一处。这样，就可以使每个社会工场都由各种不同的职业所组成，这些围绕着一个大工业而组织起来的各种职业成为同一整体的各个不同部分，它们都必须服从同样的法律，并分享同样的利益。

“工场成员之间的工资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是暂时的。按照路易·勃朗和他的朋友们所了解的平等和博爱的意义来说，在经过了一段时间，教育把人们的思想都准备好了之后，所有的工资都将变成相等的。

“社会工场的每个成员都有随意支配自己工资的权利；但是，不久就会从生产的社团中产生出自愿参加的关于需要和享乐的消费社团。

“资本家也可以被邀请参加社团，并且可以支取他们投资的利息，这种利息是在预算案中得到保证的；但是他们只有以工人的身分才能分享利润。

“不久，私人企业、小业主和工人，将成批地要求加入社会工场，并且由于这些社会工场的竞争能力是相当强烈的，所有的人都

把能参加社团看成是一种照顾。从此，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后，零散的工业就将消失，今天蹂躏着世界的竞争也将从世界上消逝；黄金时代将闪烁着光芒，阿斯特里^①就将统治世界。

“这就是这一制度的忠实的摘要。在摘录路易·勃朗先生的论述时，我们尽可能地采用了他的原文。

“这一制度以值得赞扬的情感出发，就是要消灭无限制的竞争所带来的令人烦恼的后果。五十年来，几乎无限制的竞争已成为工业上的法则；在这种竞争的后果中，有些灾难性的后果压在所有的工业阶层上面，压在工人身上也压在工厂主的身上；有些后果是人们所悲叹的，是为公共道德所谴责而要加以消灭的。不稳定、不景气、诈欺、暴力，经常是这一制度的特征，我们也会加以揭露，并且要求提出对它们的补救办法。但是，我们和一些有智慧、有理智的政论家一起把这些缺点看作是世界上最近实施的但实施得不彻底的一个新原则所产生的良好后果中的一些烦恼的后果，这一个原则就是自由的原则，它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和不朽的原则。如果要增产果实，我们想，只须修去树上的废枝，以小心和熟练的手法把杂乱蔓生的枝叶除去。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并且我们要求读者对此加以判断，路易·勃朗先生所属的那一急进学派却要人们把那棵树齐根砍掉。根据这种打算，不仅得到的果实少，甚至会一无所得：任何人都一无所得。穷人也会像富人那样饿死。的确，路易·勃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的信念则正与此相反；他们自负地认为他们可以使另一棵

① 正义的女神。——译者注

壮丽的树生长出来，人类可以在这棵树蔭下找到美滿无比的游息之处，而它的丰富的树汁可以供給人們一种鮮美的生活資料。讓我們来研究一下，他們是不是弄錯了。讓我們来看看，他們有意栽植在地里的那棵树能否从地底下吸取到一些营养的液汁，它是否有生活力，人类本性的規律是否不会使它立刻枯萎和死亡。

“誰拟訂一种改組社会的制度，誰就必然会受到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哲学思想的启发，也受到对于人类心灵的或好或坏的論证的启发。当他目光浅短、思想貧乏时，他是不加考虑地接受影响的；而当他具有一个能够思考的头脑时，他是有意识地、深思熟慮地接受启发的。我們把路易·勃朗先生列在第二类之中，我們要向他請問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路易·勃朗先生的主导思想，就是那些时时刻刻在他的著作中透露出来的思想，不外以下两点：

“第一：人类社会如果不是絕對地、也至少是主要地可以用責任感来治理自己。个人利益只是次要的动力；社会的和个人的进步，公众的和私人的幸福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靠个人利益来发生作用。沒有必要直接去刺激个人利益。一个間接的誘餌就足够了；个人利益并不值得人們更多地加以重視。誰談起个人的、直接的、切身的利益，誰談的就是貪欲。因而，路易·勃朗先生得出結論說，虽然社会工場的成員在很好地完成他們的任务时只得到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利益，他的那些社会工場还是会繁荣的；

“第二：社会的最后目的就是絕對平等。我們已经接近了这一目的；再加一把劲我們就会达到了。因此，在最近的将来，所有

的人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報酬。在社會工場成員之間，也就是說，在一切人與人之間的工資的不平等，只不過是一個暫時的意外事件，是全世界最高法則的暫時的例外；不久以後，由工資不平等所產生的差別就要被取消。以下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現在這一代人所受到的錯誤的和反社會的教育，使人們在增加收益的辦法以外，很難找到起競賽和鼓勵作用的因素，但是工資的差別將根據職務的大小而定，一種完全新型的教育一定會使思想和風俗習慣發生改變。

“但是，這兩種主導思想根本上是錯誤的。建立在這些思想上的一切社會體系是一種幻想。人類的心灵是和路易·勃朗的觀念相反的。他將對我說，人類的心灵是多麼無聊。——可能是這樣，但與其說人類的心灵是多麼無聊，還不如說您的計劃是多麼無聊！人是怎樣您就應該怎樣來對待，而不要把他當成您所希望的那樣來對待。在絕大部分人的心中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在日常生活的行動中，個人權利的感覺超過了責任感；利害關係的思想超過了犧牲的思想。個人權益的密切而直接的感覺是不斷地活動着的動力；在實業界中，在工業的交換中，在勞動領域內，這一感覺指引着並將永遠指引着人們。如果你加以抑制，工業就要蕭條，並且就會停頓。此外，在藝術上也再沒有進步，工人中也再沒有熱情，車間里也再沒有生氣了。法律和宗教向人們宣揚責任感，并把犧牲光榮化；對此，我們衷心表示感謝。一旦責任感消失，那麼社會也就要滅亡。一旦犧牲與克己不受人類的尊重，那麼社會就會腐敗。但是權利感是會自行發揮作用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權利感的說教者，並且可以發現自身是一個馴從的志願入道者。

与众不同的，是那些优秀的人物，也只有他们才不是这样。您可以替新西纳图斯^①建立铜像，您可以对殉道者奉献花圈，但是您不能希望人类在实际生活的习惯行为中，在饭碗问题上，把以上两种人的克己精神当做模范。而且，我以为，就是上述两种人在日常的交易中，他们自己也是按照一般的办法行动的，并且他们也许都有强烈的利害观念。——作为地主的新西纳图斯，在出卖他的谷物时，他大概也跟旁人一样，竭力要从买主手里得到最高的价钱。老伽图^②在政治上虽然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但在他的私生活方面却是非常精明的；圣保罗，伟大的圣保罗^③；当然是一位虔诚无比的人，可是当他制作帐篷时，如果他感觉到他每日的面包只有依靠他个人的劳动，也许他就不会有这样大的灵感了。

“对所有的人给以完全相同的分配来实现平等思想，这就是不懂得人和历史。我们祖先在1789年所宣布的并在18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种真正平等，未来也属于它的那种真正平等，是在于消灭由于出身不同而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一平等的意义就是在法国再没有世代相传的特权贵族和在贵族下面的第三等级。法国人是平等了，这也就是说法国是一个全国一致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的特殊荣誉应该属于有才干的和服务得好的人，而不看

① 新西纳图斯，纪元前460年罗马的执政官。他的生活简单朴素，并且亲自种地。古代罗马人把新西纳图斯看作是忠勇和生活简朴的典型。——译者注

② 老伽图（纪元前234—149年），纪元前195年为罗马执政官，纪元前184年为罗马监察官。——译者注

③ 基督的使徒。——译者注

他的出身如何。其意义也就是：国家应当对各个方面给予同样的支持和同样的关怀；国家应该保护这个人的土地，保护那个人的年金，也要保护既无年金又无土地的第三种人的劳动。这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教育来使所有的人培养成为对社会和对自己都是有用的人；教育的目的还应该是在村庄里像在城市里那样，在茅屋和陋舍之下像在大厦和富宅之下那样，到处细心地去发现社会所需要的超人，使社会的事务得到很好的领导。但是，使所有的人，无论是高级官员或者是最低贱的临时工，都毫无例外地度着同样物质生活的这种思想是只有天真的中学生才会有的幻想之一，正如这种中学生，当他刚出饭厅并不饥饿的时候，他对斯巴达人所食用的那种又黑又粗的粥糊抱有过高的想像那样。这不是平等，这是最可恶的暴政的粗暴的不平等。请您设想一下，所有的劳动者，也就是所有的公民，在一个军营里都过着路易·勃朗先生向他们建议的共同生活：王公或总理、部长们、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社会事务的领袖们、那些用思考来安排并管理着人民工作的人，使用公用的木碗吃着一般的饭食；在公共的大厅里，以一般人所用的同样的娱乐来松散他们的沉重思虑；在那种和最普通的公民所居住的相同的编号房间里思考祖国的命运、社会的一般利益；在与最普通的公民同样的环境中，在家庭用具和孩子们的吵闹声中，他们得到启发。这是不严肃的。只有在掌握权力的人兼并了所有的利益并且霸占了所有的财富时，才会使强烈的想像力狂热地产生出类似的空想，或让自己受到这些空想的诱惑。倘若我是在土耳其，作为一个被土耳其总督在前一天夺走了最后一只羊、砍去了最后一棵棕榈树的不幸的基督徒，我或许会产生这种梦想。但

是，在法国，在我们这个时代，公共职位的待遇是这样的微薄，以致对于一个有一点能力的人来说，接受这种职位就等于作了物质上的牺牲，并且公共职位也并不提供任何精神上的补偿；在我们这个时代，像革命的意识 and 革命的教育所造成的那种领导人的地位是值得怜悯而不值得羡慕的；在我们的国家中，既然首要的政治要求是使政府具有威信，而首要的社会要求就是要有各级领导人员，那么，这些使领导人的生活缩减到这种地步的计划，是无法自圆其说和无法加以谅解的。

“所以，路易·勃朗先生的制度所依据的两个基础是既不坚固又不一致的。仅仅靠责任感是不可能建设一个社会的；革新者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就会忽略人类一般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至少忽略那种能使人奋发的力量的一半。在社会建筑上，起凝结作用的是责任感；但是，使各种材料彼此聚合的却是个人的情感。绝对平等不只是妄想，而且是极端非正义的；这是对世界上最高贵、最纯洁的东西的蔑视，是一种可耻的黑白不分。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制度就会全部垮台。为了从另一个观点来评价这个制度，让我们在这种淋漓尽致地诋毁竞争的说法中，找出一些正当的和恰当的东西。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竞争本身是否就是一种灾害，人们是否把竞争说成是另一种东西，或者相反地，它虽暂时给予人们以痛苦（其苦味我也可以承认），却是路易·勃朗先生用他们的名义今天对竞争痛加攻击的那些人的前途得到改善的条件。

“自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路易·勃朗先生，通过他的社会工厂的选举制度造成了大多数人的暴政，并且通过绝对平等组织了对于

高尚人物的奴役制度。同样，由于取消了竞争，路易·勃朗就消灭了物质进步的动力；并使那种应该有一天能够完全消灭贫困，从而有可能使人类社会完全从贫困下面解放出来的力量陷于瘫痪。

“竞争造成了物价低廉：这一真理传遍了街头巷尾，同时也使身居高楼大厦的人感到不安。但是，人们在街头墙角、在雕梁画栋——如果这些雕梁画栋还存在的话——之下到处找得到的真理，就必然是一些好的真理。物价低廉，如果不是那些不富裕的阶级的物质方面的解放，该是什么呢？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减低到相当的程度，使得一个人——他除了仗着双手的劳动为生，别无其他生活的来源，并且他的智慧虽是平庸，然而他本人却是勤勉的、循规蹈矩的和诚实的，——可以用他自己的工资，随时为他自己和他的小家庭的美满生活而购置一些必需品，得到丰富而有益于健康的食品、一所在冬季可以把门窗关起来的和生着火房子，穿着洁净的服装，并且在星期天可以使他的伴侣穿上一套相当漂亮的服装，那时，就将完成一次对贫困的巨大征服了。我同意路易·勃朗先生的说法，我们距离这个目的还很远，但是他也同意我的意见，就是五十年以来，我们在显著的程度接近了这一目的。但是，我们要怎样并且通过哪条道路达到这一目的呢？

“1789年，我们的祖先曾想给法国找到这些幸福以及在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其他许多幸福。他们摸索、探讨，参考以前各世纪的经验，请教旧社会有才智的人们的意见，而且，他们即使把基督教义踩在脚下，却也从它那里得到启发。最后，在作了长时间的内心的检查，对他们的周围作了长时期的观察之后，为了

希望人类能够达到幸福的前途（神明的启示告诉他们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肯定的，然而他们对于使他们的后代得到这个幸福的前途比他们自己达到这个前途希望得更加热烈），为了达到像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平等（这种平等在他们的思想中包括上述一切优点），他们就选择了自由的道路。

“但是，在工业上，自由就意味着竞争。

“所以，绝对地、系统地谴责竞争，这就是不赞成1789年的原则，这就是否认那采用了这些原则的文明；这就是要我们的祖国椎胸自悔，请人类饶恕它把人类引向错误，并且这就是要我们的祖国满脸羞愧，内心绝望地向后倒退。

“竞争是自由在工业上的化身，因此，竞争就像自由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具有它的流弊那样也产生了流弊。竞争场上标志着一些失败、一些灾难，并且撒播着破产，它往往是浸透在泪水中的。有多少次，家庭的前途在这里被毁灭；多少正当的希望在这里变成泡影；多少不容易累积起来的储蓄在这里被吞没；多少勤劳忠实的人们在这里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名誉；我并不隐瞒这点，我对这点比任何人更加感到惋惜。但是，自由的竞赛场上布满着断垣残壁，无耻的行为玷污了它那神圣的土地，它也曾浴于鲜血之中。有一个时期，曾开始运用了可怕的断头台，我还可以说，神化了断头台，因为人们还说它是‘神圣的断头台’；无神论在这里统治了几天，值得人类诅咒的魔鬼在这里制订了法令。难道说，这样就应该咒骂自由吗？

“所以，为什么要使竞争对于用它的名义已经造成并且正在造成的谎言、恶行和强暴负责呢？竞争的原则如果不是永远地、也至

少在长时期內将成为工业上的法則。我們这个时代的人所应当做的，就是在它的实施中防止它走向极端。千万不要让自己受邏輯的指引，对一个独特的原則作出极端的推断。應該在那些互不相容的原則的相互之間維持平衡。因此，为了避免竞争的流弊我們不應該忽視任何一点。倘若現在我們不能完全治愈竞争所发生的灾害，那么我們就應該設法减轻这些灾害。为了得到这一效果，我們要为竞争、即为工业自由做出我們曾为政治自由有成效地作过的事情，这一成就不久就会更加显著。自从1830年革命的那些日子后的第二天起，我們就把政治自由和秩序联合起来，并把公共秩序与自由并列，这曾经是一次有益而伟大的进步。有了这种新方向的法国政治不是就曾避免了不少的不幸嗎？同样地，在工业方面，我們不要再把竞争的概念与联合和团结一致的概念分离开来。这样立刻会产生成千上万的稳健而富有生命力的措施。但是取消竞争，那是绝对不行的！

“可供人类使用的原則并不太多。文明不能像人們換衬衫那样改变原則。所以，讓我們尊重那些原則，这些是我們祖先費了那么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并且它們毕竟是像世界那样古老、像正义那样永恒的。在我們祖先用血凝成的基础上，我們应当尽力不作任何与他們高尚情感相抵触的事情，这种情感鼓舞了他們，給他們启发了那么大的力量，而且也是他們所遺留給我們的。但是，我們千万不要試图推翻这个基础。如果这样做，这是一种褻瀆神圣的企图；也是一种對我們自己的侵害，而且我們将会失敗的。自由的原則同荷馬所說的那些巨大的岩石一样，荷馬說，齐集在特洛伊城前的希腊的英雄們曾用他們有力的双臂把这些岩石举起来，并把

它們拋得很远；但是，后世的最强壮的人企图在地上把它們推动也都没有办到。

“米歇尔·舍伐利埃。”

对于讀者刚才所閱讀的这篇《辯論日报》上的文章，我們用下列函件作为答复，这一函件登在1845年2月17日的《辯論日报》上。

編輯先生：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在評論我在四年前所发表的题为《劳动组织》一书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思想加在我身上，并且根据这些思想来反对我所主张的制度，对这一制度，我在受到他的批判之后，仍然坚持是好的。先生，能否允許我請貴報讀者在我和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之間担任評判員，因为所引起的問題也許有着十分普遍的重要性和十分重大的意义，足以证明这样的一次破例举动是必要的。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一开始就責备我，說我把我的制度奠基于下列思想上：“人类社会如果不是絕對地、也至少是主要地可以用責任感来治理自己，而个人利益只是次要的动力。”

是的，我相信，我很荣幸地相信通过教育而适当地得到发展的責任感的力量。在这方面对我的責备使我很高兴，我接受这种責备，并且引以为荣。但是，像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以及所有的人那样，我认为，人类的活动可以在个人利益中得到一个非常有力的和无可怀疑的动力。可是，他們也許将同意我的看法，就是个人利益必須与責任感相結合，以免以不光彩的手段对付社会；他們也許将同意我的看法，就是当社会秩序不是使上述那种結合成为永久

的和自然的，而相反地使它成为不可能时，这种社会秩序基本上是坏的。現在，問題就在于此。

竞争制度，从它的性质来说，给予个人利益以一种反社会的倾向，给予它一些和责任感相违反的鼓励；为此就必须攻击这个制度。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幼稚地去否认个人利益的力量，而是要使它高贵化、纯洁化，使它富有活力。

我们看到在社会中竞争起了什么作用？竞争给个人利益安上了兀鹰的翅膀和贪得无厌的心。在生财之道上，成千上万的竞争者蜂涌前进，他们疯狂地彼此挤压，互相碰撞，互相践踏。而人们竟敢冠以“自由”的漂亮名字的工业上的无政府状态，在每个劳动领域中，吸引了不受数目限制的并且不断增加的生产者，因此，新来的人为了得到自己的地位，就不得不对竞争道路上所碰到的人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呢？那就是伪造贗品、有计划地降低物价、造謠、誣蔑以及各种各样的狡猾手段。为了增加自己的顾客，商人就必须把邻人的顾客拉去。科学在发明了新的方法时，也只不过把一根棍棒交给某些人来粉碎他们的对手。在竞争制度下，一个人的发财致富岂有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用别人的破产造成的呢？谁能说一个暴发户的幸福不是由许多零星的灾害组成的呢？你们是上升了，但是你们是用受害的人来做你们的台阶的。这就是在目前的制度中正在起着作用的个人利益。试问，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责任感还有它自己的地位吗？

我所谈的这一斗争不仅是激烈的，而且还是极端不平等的；这一斗争使穷人和富人、使弱者和强者、使具有一切冒险机会的投机

者和只有劳动机会的诚实人进行交锋。胜利属誰还会有疑問嗎？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很懂得，像在其他战役中，胜利是属于拥有巨大兵团的一方那样，在工业战争中，胜利是属于拥有雄厚資本的人的。在这样的社会場合，个人利益只是通过一系列激烈的斗争、通过一連串不公平的失敗、通过各种无情的貪欲之間的不斷冲突、通过普遍的和空前的貪得无厌而表現出来的，而人們却夸张个人利益的力量！可是人們責备我們，說我們否认了个人利益的力量，因为我們反对这种力量的这些丑恶的表現。

但是，該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要改变那种在本质上使个人利益和責任感不能互相結合的社会制度；并且，要拿出善良的心腸来奠定这样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这个社会制度中，任何人只有通过公共利益的胜利才能找到个人利益的滿足。組織劳动社团就解决了这一問題。例如，在我們所建議成立的社会工場里，个人利益毫无疑問是得到照顾的，因为每个劳动者都能分享利潤。只是，不提高大家的利潤，也就不能提高某几个人的利潤。这样一来，竞赛並沒有被消灭，而是純洁化了；个人利益不再挑起仇恨，而成为一种彼此亲善的方法，一种对于博爱的鼓励；对个人的鼓励并不丧失它的力量，并且成为道德上的力量了。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預先非难說，在一切社团制度中，个人利益总是間接的，因为它帶有一种集体的性质。我认为他的这种結論是不合邏輯的。一个工人既然可以分享利潤的一部分，那么，利潤的增长对他是有利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利益更为直接的了。但是，什么！难道在集体利益中沒有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作用嗎？难道在軍隊里，对国旗的忠誠不就是属于集体荣誉的利益嗎？

难道人們沒有見到成百万人在光荣的集体利益的影响下热情地奔向死亡嗎？难道不是由于一种集体感才产生了天主教的无限权能，奠定了所有伟大的机构，鼓舞了所有伟大的事业，产生了所有的行为，通过这些行为，在历史上出现了人类意願的最高权能嗎？这种使我們對我們民族的尊严如此关心的利益，这种叫做“祖国”的集体利益，难道沒有力量嗎？人們既然能够把上述的那种利益完全用来为战争和破坏服务，那么怎能叫我們信服，认为永远不可能把它用来为生产和人类的博爱而服务呢？

請明白下列各点：我們并不主张人們为了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人类的人格、个人的权利，但是，我們要求通过社团原則的既謹慎而又广泛的应用，个人能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希望和欲望同社会其他成員的福利結合起来。

我是否认真地尊重个人的利益呢？是的，这是当然的事；正是为了个人利益，我們才攻击这个产生无产者的制度的。个人利益的那些需求既然如此值得人們加以尊重，那么，对于那么多不幸的工业奴隶和传动带的仆人，你們为什么又不尊重了呢？什么！个人利益是非常神圣的，可是在你們給它辯护的那个社会里，我看到有很多人过一天是一天；他們弯着腰干着沉重的劳动，掙的錢只能使他們免于餓死；他們耗尽体力去創造一些他們永远不能分享地享受。啊！那些了解人类心灵、并且不把理論建立在幻想上的人們，那些真正实际的人，只有他們懂得：个人利益如果在一些人身上受到尊重的話，那么，在其他人身上也應該受到尊重。在今天的社会里，摆在我們眼前的是什麼景象呢？在上面，是吃人的和沒有节制的竞争；在下面，則永远是帶有威胁性和悲惨性的单調的劳

累和痛苦。这是一种正常状态嗎？回答是很简单的，并且也非常可怕的。今天，没有一个人在入睡时能够很有把握不会在暴风雨中醒来；我們明智的政治家們仅能了解到，革命随时准备着敲打社会的大門。

再来談談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的另一种錯誤。他責备我，說我指出絕對平等是社会的最后目的。这里，重要的是正确了解我們。人們既沒有相同的机能，也沒有相同的需要，而且只能仗着使用基本上不同的秉賦来生活在社会中，显然，宣传絕對平等，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用来批評我的那些辞句，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曾經肯定过的并且我願意再重复一遍的就是：如果根据能力規定的等級制度是必要的和富有生命力的話，那么，按照能力而分配的制度却就不然。领导人类社会这项使命并不是一件小事，因此不能把它也当作可以进行买卖的东西；誰当领导人，誰就應該作出牺牲。毫無疑問，报酬必須足够得使人們能够从容地去执行职务；但是，为了不使政权变质，不过分貶低政权的地位，不誤解政权的本质和它的伟大，人們就不能根据收入的多寡来权衡职务的重要性。

此外，使大公无私的精神成为行使权力的条件，这就把秩序和紀律的原則应用到行政等級中去；因为这样可使政权更多地受到尊重和更少地受到嫉妬；这样可以杜絕貪婪的和扰攘不宁的庸人以及丑陋的野心家成为候补人；这样才可以把政权委托那些认为必需发展自己精神上的最高才能和应用有益思想的人去执行；这样就可以使对权力的服从成为一种感恩的行为。

我在別处已经讲过：那些由于自己較为聪明而能够获得世界上一大部分财产的人，无权去咒罵那些在野蛮时代由于体力优越

而奴役弱者的强者。倘若人們回答說，才干需要由報酬來刺激，社會的利益需要這樣做，那麼請問，是否這種報酬必須是物質的呢？是否這種報酬必須用財富來估價呢？那些真正高尚的人所尋求和獲得的主要報酬就在於運用他們的才能。如果社會要想給予牛頓報酬，它是報酬不完的，對於牛頓來說，只有一種公平的報酬：即當他的天才發現了支配世界事物的規律時他所感到的那種快樂。如果物質需要意味着上帝給予社會而應該再由社會給予個人的東西，那麼，才能不就是上帝給予個人而應該再由他來給予社會的東西嗎？所以，按照標志在每個人的身體結構中的那條神的法律，一個人智慧多，就應當多做些有用的工作，而不應要求更高的待遇；秉賦的不平等只能邏輯地、合理地得出責任的不平等的結論。

在這一問題上，米歇爾·舍伐利埃先生提到在我國卓越的職位所得到的報酬不多。所以他不就承認了我們的理論並未越出當前社會的作法，不就承認了我們並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嗎？此外，當我們的制度即使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已經得到最幸運和最有意義實施時，他的這種主張也是不正確的。

米歇爾·舍伐利埃先生把競爭當作興奮劑而加以吹噓。但這種興奮劑的性質是什麼呢？它是用什麼方法影響人類的活動的呢？飢餓就是一種有力的興奮劑：它有時可以使大道上的竊盜膽壯。復仇是一種有力的興奮劑：它有時激起那些被欺侮的人去殺人。貪欲也是一種強有力的興奮劑：他能產生投機和投機的丑事。我們要為貪欲、報仇以及飢餓去立廟奉祀嗎？

所謂由於競爭而產生的物價低廉，它代表着什麼呢？它所代表的是在勞動力上所作的節約或使用新機器而得來的節約。所以，

物价低廉只是把从贫穷生产者手中夺来的东西给予富有的消费者。竞争使物价低廉成为一种斗争的方法，在这种斗争中，物价低廉总是或者和工资的普遍降低相呼应，或者和实行残忍的垄断相呼应的。因此，对某些人是进步的东西，对另外的一些人则是增加贫困。唉！那些幸运儿的幸福只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由穷人的不断增加着的痛苦所造成的！

固然，竞争并不总是转向不利于工人的一面。当产品在工人稀少的地方受到迫切需要时，他们的地位就颠倒过来了。受到条件支配的将是厂主；工人提出条件，他们昨天还是被压迫者，第二天可能就变成压迫者了。

在这里，我们也许应当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只能看作是例外；富人有着穷人所缺少的金钱可以规避这种暂时的压迫，而法律对厂主之间的同盟的处罚要比对工人之间的同盟的处罚轻得多。然而，我们并不这样说，如果人们充分提出反对的意见，我们是欢迎不暇的，而且我们也急于要利用这些反对的意见。不管暴政是从上而来或是从下而来，在我们看来差别不大；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认为暴政都是可恶的。我们是人民的保卫者而不是人民的侍臣，因此，我们不願意使人们可以例外地从中得到利益的混乱比那些使人们惯常遭到痛苦的混乱发生得更多；并且我们应该声明，在任何制度下，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除去采取报复的手段之外，根本得不到其他任何补偿的办法，同时，除去工业上的罗马农神节^①

^① 指罗马时代的每年十二月十六、十七和十八日三天的盛大节日，在节日期间，所有的人包括奴隶在内，都必须尽情作乐。这里引用这个名称意即无产阶级除去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外没有其他任何自由。——译者注

外，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节日，那么这种制度是十分不幸的。

至于因为稍稍触动一下现行制度的基础就怕所有的人都会饿死，对于这一点，难道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所表示的担心是很严肃的吗？怎么！一个工人为自己劳动，因而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和快速地去完成那些在今天说来他是慢腾腾地、满怀反感地、口出怨言地、甚至往往内心带着反抗情绪做着的事情，在这个时候，难道所有的人反而会饿死吗！当社会中不再有像今天那样混水摸鱼的寄生虫时，当生产不再在盲目和混乱之中进行，不再导致商品的滞销，以致博学的经济学家们说现代国家的贫困是由生产过剩产生时，难道所有的人还会饿死吗？今天，不可计数的资本损失形成商店歇业、工厂倒闭、破产频仍、商品滞销、工人失业、工人阶级由于经常劳动过度和时间过长而发生疾病，总之，混乱的、规模庞大的和普遍的竞争产生了一切灾害；在竞争消灭以后，当我们不再为这些现象悲叹时，难道所有的人还会饿死吗？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可以绝对放心……至少关于实行我们的理想这一点，可以绝对放心；因为目前社会制度的任其发展的情况，只能使人感到触目惊心。当然，我很容易证明：既然这种制度对人民的美满生活没有任何保障，那它就使社会陷于一种侥幸的生存状态；人们所吹嘘的这种工业自由只是为了劳动工具占有者而存在；这种工业自由让穷人被意外的事情所支配；这种自由是由压迫和无政府状态所组成；这种自由只给强者增加力量，给富者增加财富，给那些最不需要贷款的人增加贷款。上天知道，我决不是在这里煽动无产阶级，给他们灌输不幸的急躁心情！资产阶级本身

也受着相当大的威胁，人们应当向资产阶级发出呼吁并要他们认真地来考虑这种情况。唉！如何能否认这点呢？竞争是为了大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所以，在压倒了小资产阶级之后，这个竞争就将压倒中产阶级；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以触目惊心的朕兆表现出来了！不妨看看乡村的情况，那里受着高利贷的无耻的封建制度的压榨。请研究一下大城市的工业生活，那里到处揭示着金融寡头的形成，而逃避这种金融寡头的桎梏变得愈来愈难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手艺人成了一个不能独立自主的按日计工的劳动者，小商店倒闭了，它们被豪华的大商店挤垮；在竞争的斗争中，奢侈成为一种可靠的和杀人的武器，大资本家的联合包围了中小资产阶级，并且把他们闷死。怎样来避免这些祸害呢？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说，我们只要把竞争纠正一下就可以满足了。但是用哪些办法呢？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并没有把它们指出来，而我们却很想了解一下这些办法。什么，原则已经肯定了，他们却不希望它产生自然的结果！什么！战争已经发生，他们却还抱着这种不会有牺牲者的奇怪幻想！但是善与恶同样有它的逻辑；当他们指责结论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坚持保留它的前提。现在我再重复一遍，这里的结论就是建立一种比军事专制更沉重百倍、更卑鄙百倍的专制。难道不就是把运输的垄断也就是把工业的活动、它的灵魂、它的生存和它的呼吸都出让给一小部分的富翁去垄断吗？这样，你们就可以采取放任主义，可以使你们自己满意于你们响亮的词句，可以使自己颂扬那些在自由的名义下使无政府状态成为合法化的立法者的智慧。在这等待期间，站在忍受痛苦的人民头上的资产阶级日趋瓦解，而资产阶级的侍臣

們并不設法把資產階級營救出來，只知道用甜言蜜語去哄騙資產階級沉沉入睡。

路易·勃朗

以下是《商業報》在1841年8月3日有關本書所發表的評論：

“變為工業企業主的政府怎樣執行職務呢？我們如果以公共工程部的例子來判斷，那就可以推測，政府的措施，不論在節約方面、積極行動方面、企業的發展和改進方面，都不是出色的。我們還可以設想一下，當政府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時候，它是為了公用事業或者為了靠稅收征集產品而領導勞動生產的。但是，當國家成為唯一的製造商並獨自負擔供應私人消費需要時，它將用什麼方法來銷售產品、尋找國內外的銷售市場呢？”

如果這些非難一點也沒有指錯的話，那麼，無疑地這些非難是十分嚴重的。當然，如果國家成為工業企業主並且負責供應私人消費需要，那麼肯定它就要在這一巨大任務的重擔下失敗。再進一步說：假如國家能這樣做，那麼，這樣一個制度的結果所能造成的就會是暴政，就會是在公益的假面具下對於個人所施行的強暴，就會是喪失一切自由，最後，就會是普遍的窒息。但是，難道我們提出了類似這樣的東西嗎？這種非難如果對聖西門^①主義提出，還能成立。但是我們的學說與聖西門學說之間有什麼共同之點呢？我們曾經說過，國家應當是工業的調節者；難道這就是說國家應該對工業施行壟斷嗎？我們曾經說過，國家應當創辦社會工場，

① 昂利·克勞德·聖西門(1760—1825)，法國卓越的思想家、空想社會主義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譯者注

供給劳动者以劳动工具，規定那具有法律形式和效力的工业章程，难道这就是說，国家应该变成投机者、工业企业主嗎？这里，誰不感觉到，他們是用不是我們的立場来攻击我們的呢？請再閱讀一下我們的計劃：大家会看到在社会工場所得利潤的分配中，我們並沒有分給政府任何一份；所以，在我們的制度中，政府既不是垄断者，也不是投机者。的确，我們让政府在社会工場成立的第一年間来参与工厂的行政管理。但是，为什么要把一个制度的基础和推行这个制度的方法混为一談呢？我們說了些什么呢？“社会工場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安排各項职务的等級。一年以后就不再如此了。工人們既然有時間可以互相鑑定，并且，他們既然都关心社团的成功，那么，各級人員就可以从选举中产生出来。”意思就是說：机器一经安装起来，自己就可以开动。国家只須像它监督所有法令的执行那样来监督章程的遵守。可是，这些章程既然是实施一种关于联合和博爱的学說，那么，工业立刻就会走上新的道路，以致国家除了排除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企图为对抗这个运动而制造的种种障碍以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請很好注意这一点：我們不像圣西門学派那样，要求国家亲自去做一切事情，我們只要求国家发动一次以社团原則代替竞争原則为目的的工业革命。我們并不要求国家成为工业企业主和把所有的垄断权都集中在它的手中，我們要求政府出面干預，以便給予某些工人团体以劳动工具，并給这些工人团体制定法律，使它們不可能不在王国的整个地面上不知不觉地扩展起来。

“有一个国家，大約从三百年前起就在大規模的范围内施行着一种和路易·勃朗先生所提議的相似的制度，这个国家就是巴拉

圭。在南美殖民地叛变之前，这个国家处在完全实现了公有财产和社会博爱的烏托邦的神权政治的統治之下。表面上，这个政府是符合公民的願望的，因为，那些从宗主国的权威之下解放出来的公民，除了以联邦制的形式代替单一制外，願意沒有其他变动而保留这个政府。新組織的領導者弗兰西亚博士^①改善了旧的組織，并且除了根据人民一致拥护的意見外，并未通过其他任何形式就維持了他过去所处的地位，雷納耳^②根据一致公认的证据叙述了巴拉圭的制度之后，发现了一种他不能解释的現象。他說：在那种政体之下人口似乎應該極快地增长起来；因为在那里，沒有一个閑人，沒有一个工作过忙的人；在那里，食物是有营养的、丰富的、对于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公民穿得也很舒適；在那里，老人、寡妇和孤儿依靠土地的剩余产品而得到大量的贍养；在那里，人人可以不計較利害关系而自由选择对象；并且，在那里，儿女成群是一种慰借而不会是負擔；在那里，从不发生那种同腐蝕穷人和富人的那种游手好閑分不开来的、加速人类生命死亡或衰頹的荒淫，在那里，絲毫沒有什麼可以激起不自然的情欲、破坏正常食欲的东西；在那里，人們可以享受貿易的利益而絲毫不受到奢侈恶习的影响；在那里，粮食滿仓，在同一宗教的博爱下，各民族联合起来，彼此进行无偿的援助，这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它可以防止季节的变化无常或风雨不調所引起的歉收；在那里，社会懲罰永远沒有必要对任何一个罪犯判处死刑、受辱和徒刑；在那里，人們不知道

① 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盖斯·弗兰西亚（1766—1840），1814—1840年巴拉圭的独裁者。他沒收了修道院的财产和地主的一部分土地。他对反动势力和外国干預巴拉圭事务的陰謀进行了斗争。——譯者注

② 季育姆·雷納耳（1713—1796），法国的历史家和哲学家。——譯者注

什么叫征稅和訴訟——这是到处使人类受苦的两个灾害：看起来这样一个国家应该是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国家。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事实是，在和法国一样广阔的土地上，巴拉圭可能只有五十万居民。这一定是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组织所含有的深刻弊病，抵消了这么多的利益。”^①

我们不难指出在巴拉圭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我們所提倡的制度之间的根本不同点。如果我们承认那种比拟是正确的話，那么，我們刚才讀到的引文对我們的結論是一篇多么有利和卓越的辯护詞啊！怎么！德行和幸福就是一个社会在应用了你們所攻击的学說时所得到的东西！你們除了給我們描繪一幅关于这些学說所提供的利益的引人入胜的图画以外，找不到任何东西来攻击这些学說：“巴拉圭本該是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国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住在巴拉圭的那些人既善良而又幸福，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根据雷納耳的說法，“在他們那里絲毫沒有加速人类生命的死亡或衰頹的东西”，那么，人口不多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口的增加是否总是繁荣的象征呢？我們可以看到，巴黎人口的出生率，在富裕地区占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而在最貧困地区就提高到二十六分之一。但願上帝的意旨是使那眼光短浅的经济学家們所互相祝賀的我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那么显著、那么迅速！啊！你絕對相信人口增长是件好事嗎？那么請你看一下你的周围：飢餓的人繁殖得最快。我們的祖国很快就要容納不下我們了；这一点你还看不到嗎？現在我們不是已经在互相窺伺，等待互相吞噬的机会嗎！让那些

^① 參閱1841年8月3日的《商业报》。

征服者去要求母亲們多多生育吧；这些人需要人丁兴旺，因为他们們需要一些人来做炮灰。

“如果竞争是貧困和破产的必然原因，那么，怎样去解释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竞争制度的国家的繁荣呢？”^①

沒有再比作出这种解释更容易的了。美国人并不像我們那样拥挤在一个不能任意开拓疆土的国家里。至少到现在为止，他們之所以能够部分地避免竞争的灾害，简单說来，正是由于还存在着空地。但是，怎么啦！那个强暴地驅使英国人走出他們的島屿并使他們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必須征服的市場的压力，那个不可抗拒的压力，現在不是已经統治着美国了嗎？銷路問題在美国不是已经像在英国过去和現在那样日漸显得严重了嗎？我們不是已经听到美国总统杰克逊將軍^②面对着他的国家由于信貨的极端发展、私人投机的狂热、无限的竞争在人們心灵中所燃起的熾烈的欲望而即将发生的危險，在大声呻吟嗎？我們且不談竞争使美国个人的才能带有的那种毫无节制的冲动所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恶习：貪欲、自私、恶意、粗野的思想和风俗。

竞争早晚要成为一种压迫，美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所采取的社会制度的罪恶，现在已经严重地威胁着那个作为他們政治机构基础的平等原則。只要銀行制度在美国受到支持，那么民主制度就要失败。杰克逊大声地声明了这一点，而且他在这一点上的意見也就是所有那些美国民主主义的忠实拥护者的意見。

① 參閱上边所引据的同一期的《商业报》。

② 安德留·杰克逊(1767—1845)，美国政治家，曾于1828年和1832年两度当选为美国总统。——譯者注

这个结果是值得大家来彻底加以研究的！

“对路易·勃朗先生的计划的主要指责，是说他的计划固然以通过社团消灭竞争为目的，然而这个计划本身只是一种竞争制度而决不是社团的制度。这个计划的本身含有不纯的因素，这种不纯的因素却是计划的拟草者的那种敏锐的思想所不应当觉察不到的。

“的确，路易·勃朗先生许可资本家加入社团，条件是资本家可以支取他们投资的利息，但是，他们必须取得工人的身份才能分享利润。

“这样，资本家不管社会工场获得利润或遭到损失都有权得到固定的年金。这样，他们不但不和工人协作，反而只关心得到他们资本的最高利息，而工人的利益恰巧与此相反。因此，在参加生产的两方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造成一种明显的对立，并且由此产生谎言、舞弊、仇恨，换句话说，就是竞争本身和它的全部结果。但是，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资本并不单单是货币。如果资本单单是货币，那就可以把敌对利益缩减到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之内。在资本这个字义里包含着全部劳动工具、产品的一切来源、生产的全部面貌。因此，地主、厂主、牧场主、动产与不动产的所有人将完全和劳动者分裂开来。本来应该在这一计划中被克服的竞争却得到了庄严的承认。”①

给我们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是否已经考虑到今天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产生明显的对立的原因呢？而这种对立是提出上述

① 见1841年3月1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

意見人甚至在我們的制度的實施中也感到害怕的。在生產的事業中，一些人的使命是提供勞動工具，另一些人的使命是提供勞動力，這樣，資本家和工人就互相進行鬥爭，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什麼東西來調整他們之間的關係，因為專橫在這裡支配一切。工人感到需要得到工具時，資本家就在這種需要上進行投機，同時工人也利用資本家試圖使他的資本獲得利潤的需要而設法從中得到利益。我們的制度把社會工廠的成員和資本家安放在與上述完全不同的地位上。大家不要忘記，社會工廠有國家給它提供的資本，這種資本是集體的，它應該不斷增長，並且它是屬於社團自己所有的。因而，在這裡工人是可以自給自足的。利率一旦確定（絲毫沒有理由去禁止人們在一定的時期內用立法手續來確定利率），可以許可願意為社會工廠服務的資本家在事先規定的條件下參加投資；相反，那些資本家如果不滿意這些條件，可以保留他們的金錢，而工廠可以不用他們的錢。我們的制度給社會工廠創造了這樣一種形勢，就是使資本家的協助對它永遠是有益的，而不是使這種協助成為非此不可的，所以，就沒有發生爭論的可能。

更好的是：隨着我們制度的發展，集體資本就增長起來；大部分勞動者愈來愈獨立；個人投資的機會日益減少；資本的暴政被擊中了要害。

“當你按照職務的等級來規定工資時，你無疑地承認了，一切勞動具有不同的性質，因而也就無權得到相同的報酬。那麼，為什麼在利潤方面你卻又建立起你在工資中認為是不合理的那種平等關係呢？”^①

^① 見1841年5月1日的《阿韋龍省和羅得省評論報》。

我們曾經預料到这种非难，并且事先用这样的詞句做了答复：“現在这一代人所受到的錯誤的和反社会的教育，使人們在增加收益的办法以外，很难找到起竞争和鼓励作用的因素，但是工資的差別将按职务的等級而加以規定，一种新型的教育定会使思想和风俗习惯发生改变。”至于現在，我們在工資方面不采取平均主义的报酬办法，并不是认为那种办法是不合理的，而是认为它会給习惯以猛然的打击；根据我們的看法，只有教育可以有力量来改变这些习惯。在利潤的分配中，我們所認可的平均分配办法是在“現在怎样”和“应当怎样”两者之間安排得够好的一种过渡办法；因为我們已经讲过，我們再說一遍，总有一天人們会承认，誰从上帝那里得到較多的力量或較多的智慧，誰就对人类要担負較多的責任。因此，天才不是通过他从社会取得的巨額报酬，而是通过他对社会所尽的义务的光輝成就来获得社会的公认，他應該这样做，也只有这样他才不愧为天才。秉賦的不平等應該得出的結論是責任上的不平等，而不是权利上的不平等。

“根据那个計劃，第一年各級职务将由政府来安排；但从第二年起，各級人員就要根据选举原則产生。

“讀者如果曾經注意或参与过省、市或国会的选举，他就会知道有多少阴謀、謊言、誣蔑和虛伪的諾言、不道德的威胁施展在这些斗争中，讀者就不会不知道，这是家庭不和睦和国家风俗败坏的一个机会；并且，只有某些旧式自由主义的落后公民才幻想着国家生活本身就是斗争。此外，每个有理智的公民都会沉痛地看到，这些周期性的动乱的来临就使一切丑恶的情欲又一次在社会上泛滥起来。然而，所涉及的問題只是一些遙远的和人們不很了解的利

害关系，至多只涉及到通过选举的选择来保障某些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倘若把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现状和前途都交付给选举来决定，倘若公民们不光是指定候选人，而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作为他们有权可以获得尊敬和财富的衡量标准，这就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了呢？我且不說最末一等的人，就是第二等和第三等人又有誰願意去充当呢？什么是調节个人貪欲的天平呢？”^①

是的，在省、市或国会的选举中，有关的只是一些遙远的和人們不很了解的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些选举才是这么多的动乱和阴谋的根源。此外，你怎么会沒有看到，选举的无政府状态本身只不过是在目前社会中由于阶级区分、利害关系的多种多样性、奋斗目标的不一致而产生的混乱和对抗矛盾的結果呢？

社团的每一个成員都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并且都同样关心着共同事业的繁荣，如果把选举的原則介紹到这样的社团中来，不就会面目一新嗎？如果选举人不是不凭了解而以本能或往往以盲目的热情去进行投票，而是在完全了解事情的情况下，在他们全部生活所接触到的范围内，总之，在完全了解他们的利害关系的情况下进行选择的話，那么，这又将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为了选举得好，那就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利害关系和能力。是啊！社会工場的成員显然都是具有这两个条件的。他们关心着很好地进行选择，因为社团的成就是由他们的选择来决定的，而社团的利潤則又是由他们来分享的；他们有能力很好地进行选择，因为

① 見1841年5月1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他們每天随时随地都彼此見面，他們在一起劳动，他們具有很好地進行鉴别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一个工人能否对他的工长作出鉴定呢？如果一个工人應該从他的工长的才能中得到他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他是否願意找一个无能的工长呢？問題就在这里。

“路易·勃朗先生承认，创办社会工场的国家在第一年中将管理各种职务和利潤。假如国家一旦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为什么要让它失去这种特权呢？”^①

这是因为担心国家在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时，会滥用这种制度所給予它的巨大权力，也是因为担心当国家管理的不再是某一个工場，而是所有的工业部門时，它的任务会变得太沉重。

我們要避免圣西門主义所碰到的暗礁。这个学說的奠基人早就很好地看到，只有国家机关才有足够的力量把社会从危险途径中挽救出来，但是，由于他們过于強調政府首創精神的优越性，因而超越了那个目的。他們不是把指导和調整工业生产的責任委托給国家，而把管理工业的瑣碎事务都放在国家的肩上；因而使国家的行动极不方便，而暴政反而成为可能。

当然，我們并不是咒罵权力原則的人。我們會多次反击了那些既危险又愚蠢的攻击来保护这个原則。我們知道，在一个社会里，当有組織的力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到处都是专制。在这本书里，沒有一行不是以我們的名义来沉痛地抗議，抗議人們把穷人可恥地遺弃不顾，还有人竟敢把这种遺弃叫作是自由！但是，即

^① 見1841年3月8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使我們希望有一种强有力的和有效的政权，我們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认为政权是不会有錯誤的，那就是发疯；我們并不掩飾，不管产生政府的政治組織怎样完美，一个政府总是由能犯錯誤和能为情欲所迷的人所組成的，而社会的生存是不应当由这些錯誤和情欲来决定的。所以對我們來說，要解决的問題是：給政权造成一种强大的富有首創能力的力量，然而要避免政权的活動侵入社会的一切活動。

“国家提供了原始基金。然而，看来似乎既不許可国家分享利潤，也不許可它征收任何利息。国家与其他資本家之間的这种差別是不公平的。”^①

但是，为什么要說这是不公平的呢？难道你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投机者嗎？难道国家同它所代表的和反映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利益嗎？

“一部分利潤指定用来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因为所有那些工业都应该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援。如果其他工业也把它們的利潤交給社会工場的話，那就太好了；但是，根据它們自己的組織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也不合理。”^②

按照我們的計劃，这种互相救助只能在集体組織起来的各种工业之間进行。

“另一部分利潤專門用来为那些志願参加社团的人购置劳动工具。——应当加一句，这笔款項将从工資中扣除下来；这是一笔

① 見1841年3月10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② 同上。

墊款，而不是饋贈，不然就会是不合理的；因为資本既然是由国家供給的，那么，无偿地把劳动工具送給某些工人，那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剝夺大多数人。”^①

如果我們所提倡的制度的发展不包括全体工人，那么你就說对了。但是，为了达到我們的目的，我們才从社会工場的資本中提出一部分来，而这一部分資本只能用来扩大社会工場，因此，它事先就毫无例外地是属于全部工人的。从工人的工資中扣除工人为了生活和为了服务于他所属的社会而必需的工具的价款，这岂不是一种不合理和苛刻的行为嗎？庇特本人就曾說过，国家应该供給人民劳动或面包。

“劳动組織将从工业开始，其实，它应该从联合起来的工业与农业方面开始进行。”^②

为什么要凭空使困难复杂化呢？革命由工业改革开始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革命来引起与之相結合的农业改革。要知道，我們並沒有忘記这一个必要的联盟（見本书第87頁）。

“路易·勃朗先生的思想基本上是圣西門的思想。事实上，圣西門不断主张政权取得工业領導权，同时創辦服从政府所制訂的規章的工場，在这些工場中，政权应该分配每人的职务、每人在工业等級中的地位以及每人在生产或利潤中应得的部分。”^③

我們已经答复了这一指摘，使我們吃惊的是：向我們提出这个指摘的是一种宣传傅立叶社会主义的报纸，換句話說，就是一种专

① 見1841年3月10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② 同上。

③ 見1810年9月23日的《法郎吉报》。

門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說的报纸。

圣西門的学說和我們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学說之間，区别是明显的、带有根本性的；同时这又是理論上的和实践上的区别。

在圣西門学說中，政权就是一切，政权行使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政权从自身取得那种可以对社会实施强制的权利，以后就随意支配社会，把才能分成等級。政权分配职务，领导一切人的劳动，进行财富的分配。在圣西門的学說里，国家就是工业的教皇。相反，在我們的計劃中，国家只給劳动制定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工业活动就可以并且也应该完全自由地进行。国家只是把社会放在一个斜坡上面，社会一旦被安置在那里之后，它就由于事物的力量和既定的机械作用的自然結果而滑落下去。

在圣西門的学說中，等級制度基本上是通过“从上”而来的选择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們的計劃中則相反，等級制度基本上是通过“从下”而来的选举而建立起来的。

在圣西門的学說中，国家对于工业的干預是有永久性的；而在我們的計劃中，国家只不过在最初时期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涉。

在圣西門的学說中，社会的功能完全消失在政权的职能之下。在我們的計劃中，社会从政权那里得到推动力量，而在取得这种推动力量之后，它就仅仅受政权的监督了。

在圣西門的学說中，利潤分配問題是通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而得到解决的：“按才分配，按才派工”。在我們的計劃中，秉賦的不平等，只在过渡时期作为报酬上的差别的基础，并且还带有重大的限制。因此，形成圣西門的道德原則的东西，在我們的計劃中，只不过是一种对于那些我們认为是錯誤的思想的必要的让步，并且我

們願意依靠教育使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战胜这些錯誤的思想。

因此，圣西門的学說和我們的学說之間在最終的目标上、在方法上和在道德上，絲毫沒有共同之处。

“至于那些資本家，路易·勃朗先生很願意他們資本的利息在預算中得到保障，然而他却完全不准他們分享工場所得的利潤。对于这种奇怪的排斥，我們只提出下列两点意見：第一，不让資本家对于工人階級命运的改善直接感到兴趣，这是太不了解工人階級的利益。其实，如果我們所談到的那些企业應該改善这些階級的地位，那么就要增多这些企业；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它們成为对資本家有利的投資場所，所以資本應該享受利潤的分配。第二，資本作为有助于生产的一种手段，它是否具有和其他生产手段相同的合法性呢？問題就在这里。假如資本是不合法的，那么，它在生产中要求得到的一份也是不合法的，那就應該排除它，它也就不該得到利息；反之，如果資本是合法的，那么，它既然有助于利潤的增加，就不能合法地被拒絕分享利潤。”^①

前几段中，問題是以一种毫无系統的方式提出来的。毫無疑問，作者的意图是向我們詢問，根据我們的意見，在生产的利潤中，允許資本家分享一份和工人相等的利潤是否合理。

我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在正常的社会中，这是极端荒謬和极端不合理的。怎么！一个人在继承父亲的遺產时得到了一百万法郎，这笔錢原是他的高祖父积攢起来的，来路的好坏不得而知。

^① 見1840年9月23日的《法郎吉報》。

这样，他就像博馬舍^①书中的那个贵族那样，只因出生关系而成为富有，他愿意拿这一百万法郎投资到工业中来，使它产生利润。除此而外，他却以打猎来消磨岁月，看戏游荡，通宵赌博，他的全部生活都用在享乐上面，或者用在满足他的以个人主义为目的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上面。因为他不是愚蠢地把这一百万法郎埋藏在地下——这一百万法郎，没有他也可存在，并且在他之前已经存在，他不懂得怎样使这一百万法郎增多的艺术，而最后他只知道领取和浪费这笔款项的利息——，你却要在这些生产的果实中分给他一份与聪明和勤劳的人相等的利润。这种财富是通过聪明而勤劳的人增多起来的，而它们为所有的人服务，它们的一生完全贡献于社会。天啊！这是什么合理的分配啊！那些立志改革世界的人，却不理会到利润的这种分配原则是对所有正义法则的一种粗暴侵犯和对人类理性的侮辱。试问你对这些人又当作何感想呢！

你是不是说，在生产事业中，资本和劳动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因素呢？我们倒要弄清楚。由于资本和劳动同样是创造财富的两个必要的因素，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公正的观点上，资本家和工人是同样有功绩的人吗？这样一种结论是不合乎情理的。

你是不是说所有的资本家并不都是游手好闲的吗？我同意你这种说法。但是，为什么要使那些游手好闲的资本家得到那么大的利润呢？而在那些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们中，为什么要使富人比

^① 比埃尔·奥古斯丁·卡龙·博馬舍(1732—1799)，法国作家，卓越的喜剧作家。——译者注

勤勉的人得到較多或相等的报酬呢？

你是不是說，这样作即使不太公允，至少也是有益的。不过，首先，一种把有益的和正义的东西分割开来的哲学是貧乏的和过时的哲学。其次，你敢于主张的是什么呢？如果社会把資本家所提供的非亲自参加的服务和工人所作的亲自参加的服务等量齐观，对于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呢？劳动是和劳动者一起死亡的；但資本是否和資本家一起死亡呢？在靠着集体資本而生存的社团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并且历史也給我們提供了关于这类社团的很多的例子。因此，人們可以設想一个沒有資本家的社会，但是能够設想一个沒有劳动者的社会嗎？所以，虽然資本和劳动同样是必要的，但資本家和工人并不同样是必要的。社会的存在并不絕對取决于資本家，而它却絕對取决于工人。因此，如果工人得到的待遇不如資本家的話，那么，这就是把所有正义和真理的观念都顛倒过来了。这是由于文明誤入歧途而造成的，这不是明显的事嗎？

你能否认这一点嗎？請注意，倘若你要这样做的話，你就沒有資格来談論公正、道德和进步；你就沒有資格来談論上帝。上帝就会消失而让位于最盲目、最粗俗的宿命論。

讓我們再来談談那个两端論的說法吧。我們把原文归納如下：“倘若資本是不合法的，那么它要求在产品中分得一份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就应当把它排除出去，而不应让它得到利息。”这只不过是一种詭辯。傅立叶的門徒們和我們一样清楚地知道，既存事实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不管社会組織是好是坏，它是由錯誤的观念、庸俗的偏見、普遍的无知以及存在了几世紀之久的传统邪恶所

造成的。倘若我們想要得到一个实际的解决办法，那么就要很好地看清这一切。我們所以要求社会工場給資本家的資金支付利息，一种优厚的利息：第一，因为有必要使我們所提倡的社会工場不排斥任何可以促进它們发展的方法；第二，因为我們計劃的目的既以整个社会的革新为終点，因此，需要邀請資本家們尽可能踊跃参加社团，以便迅速地把所有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

“要达到这种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資本家分享利潤。”

我們并不否认，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資本家的吸引力不是很大的。但是，問題是要了解，为了吸引資本家，如果对他們的資金付給和国家今天付給公債持有者相等或更高的利息，这是不是够。因为，如果这样就够了的話，那么超过这个程度，那就将是疯狂的行为，因为这会是无益地牺牲原則的严肃性。然而我們說，社会工場一旦建立起来，資本家就会乐于参加到社会工場中来，因为由于这些社会工場的发展，个人投資的机会就将一天一天地愈来愈减少。

或許你要問我們，既然在我們的計劃中个人資本的兼并迟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有什么理由使我們对資本家照顾得这样多，并且要去把他們不可能不走的下坡路緩和到这种程度呢？其实，使我們采取这些照顾办法的理由，并不只是希望同无数的矛盾和根深柢固的成見妥协，而且还有比这更多更好的理由。这就是改革社会而不把它推翻；給各种利益指出各种不同的和可靠的方向；不用野蛮急躁的方式来动摇即使是那些建立在流弊之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人們所要摧毁的，总之，要給将来作好准备，而不是粗暴地和过去一刀两断……难道这仅仅是一种策略嗎？不是，这是一

种責任。

“路易·勃朗先生的言論缺少一种基本的东西，缺少了这一点，他的言論就失掉了依据，我們所要說的就是确定那些和竞争有关的事实，因为这种被路易·勃朗先生根据它所产生的惨痛的后果而正确譴責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是結果而不是原因。要知道，如果我們要得出精确的結論，不是完全有必要来确定那些与竞争有关的前因后果嗎？可是，这就是路易·勃朗先生完全忘記去做的。

“我們的确在他的文章中讀到这样一句話：‘我曾說过，竞争是从个人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我們要想在路易·勃朗先生的全篇文章中找到一段关于他所主张的由个人主义产生竞争的理論，那是找不到的。我們現在还在寻找。——而且，在这里他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什么呢？也許人們并不把个人主义理解为各种工业的分散，或理解为家庭分离以組成各种工业团体，不相联結并被迫彼此进行斗争，这就是說，不得不以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方式进行竞争。对于这种工业的分散和家庭的分离，路易·勃朗先生只字不提。可是这就是他所悲叹的竞争的最大的原因，是他提醒政論家和当局注意的所有工业上的和道德上的貧困的重要根源。这样的健忘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嗎？怎么！你向我們推荐一种医治某些社会創伤的药品，你认为这种药品是合乎邏輯的和合理的；你要我們拿理性来判断这种药品，却忘記告訴我們产生这些創伤的原因！”^①

《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的編輯事前已经替我們答复了

^① 見1840年9月23日的《法郎吉报》。

《法郎吉报》編者的这项非难。我們在此再来重复一下这一答复，这一答复是有力的，它說：

“有人曾向路易·勃朗先生提出（《法郎吉报》，1840年9月23日）：‘为了医治竞争的禍害，也許应该追溯这个竞争的原因，那就是工业的分散，家庭的分离，并从根本上去打击禍害，而路易·勃朗先生却并没有这样做。’在我看来，这一指責是不公正的。

“竞争的真正意义（就是一起跑步）是不同的个人同时要求得到同样的产品，这种要求就带来了斗争。这种要求是一种从人类的天性中产生出来的原始事实；而不是家庭的分离和工业的分散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像劳动工具之间的分散那样。这是两个同时并存的、有连带关系的和互为因果的事实。社团在代替了分离的家庭以后，确实可以增加生产，但是如果沒有其他許多条件的协助，无论竞争或斗争是决不会因此而被消除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在工业中，像在农业、商业中那样，劳动决不是由分离的小家庭和家族来进行的，实际上它经常是由很多属于不同家庭的、在一定条件下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来进行的。我們甚至有理由认为，分离的家庭（分散方式）的生产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并且也是难以想像的。既然資本、劳动和才干是生产的三个要素，就必须假定有一个可以自給自足的家庭，它永不仰仗別人的帮助，也不仰仗別人的工具、消費品和資金，簡言之，一个和人类完全断絕一切关系的家庭，这至多只是某些野蛮人的情况。在我們一切社会中，家庭早已脫离了这种孤立状况，而在生产事业中結合起来，固然它們結合的方式是不完善的和不完整的，它們通过相互交換，通过借用或租用工具、才干和劳动力而不断地結合起来。和这种絕

对孤立相适应的绝对分散也是脱离现实的。因此，这两者都不能成为产生竞争的原因。我再重说一遍，竞争和分散是两种并行的规律的两个原始事实，并且是互相支持的。攻击竞争，同时也就是攻击分散；破坏了分散，也就摧毁了竞争。家庭的孤立同时是由劳动工具的分散和工具所有者的竞争所造成的，因此，家庭的孤立必然是与这两者的命运相始终的。

“所以，路易·勃朗先生从直接针对竞争的角度来处理劳动组织问题，就把这个问题提到相当的高度。”^①

《宪政报》专门为了说明我们的计划而登载了一篇对我们充满善意的论文。不幸的是我们的思想在这篇论文中虽然得到了说明，却没有受到讨论。作者仅用笼统的词句责备我们的前提过于夸大和我们的结论过于绝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依据的事实，大部分引自官方报告的数字。就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而言，读者可以判断我们如何努力使逻辑服从于准备过渡的需要。那篇论文的作者写道：

“那些利害关系的环境，也许像我们的生活环境那样，需要一些可以使它纯洁的暴风雨，并且可以肯定说，不管暴风雨是怎样的强烈，时间久了平衡是会逐渐地恢复起来的。”^②

但是，我们所叙述的祸害，难道是一种偶然的祸害吗？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出生到进入坟墓都在受着贫困的折磨，他们不是经常不断地在忍受着痛苦吗？这种可怕的斗争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并从这种斗争中产生了受到最残酷的灾难的磨练的最丑恶

① 1841年2月15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评论报》。

② 见1840年12月19日的《宪政报》。

的禍害嗎？如果你用“暴风雨”这个名詞来指工业危机，那么工业危机就是禍害的暫时的加重嗎？还是全部禍害呢？你根据什么来断定工业危机可以澄清那些利害关系的环境呢？

在工业的风雨飄搖中，我們看到工厂倒閉，資本匿迹或被消灭，破产相继发生，财产相继傾复，广大失业的无产者面色蒼白，在叛乱和布施之間去寻找他們的面包；难道社会在这种崩潰的翌日就能找到最好的出路嗎？時間久了，平衡会恢复嗎？啊呀！你不知道你是把應該放在血迹斑斑的政治年鉴中的“华沙恢复了秩序”^①这句名言搬到工业史中来了！

在这自称是光明的世紀中，为了不讓我們看見那些腐蝕我們的創伤，人們竟用黑暗把我們包围起来，这实在是一件怪事！难道否认創伤就能治愈伤势嗎？我們多么像古代的那位哲学家啊！他在受到最大痛苦时叫喊着說：“噢，痛苦！你永远不能迫使我承认你是一种禍害！”这是多么幼稚的驕傲呀！我們要努力驅逐病魔，为了向病魔挑战，我們不需要自己对自己說謊。

但是，竟有一些向上帝說出这样侮辱的話的人敢于肯定禍害是永恒的。下面就是《环球报》對我們的学說所提出的反对意見：

“誰否认目前社会秩序的創伤呢？当然不是我們。我們看到了被称为奴隶的非洲人以及被称为公民的欧洲人，我們从无产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这两种人进行过观察。当然，我們知道哪方

^① 1830年法国革命之后，在波兰华沙发生了一次革命的大暴动，这次暴动被残酷地鎮压下去。“华沙恢复了秩序”这句话，是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賽巴斯底阿尼在国会中答复議員責問时所說的一句話。因为它是为了掩盖华沙流血惨重的鎮压情况而說出来的，所以已成为政治历史上的名言了。——譯者注

面是最貧困。但是，大家经常談到的这些物质上的不幸，被激进党刊物用来作为经常写作的資料，它們是否就揭示出人們想要談到的极不正常的情況呢？是否就揭示出必須用一切代价排除的那种情況呢？还是相反，它們是一切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只需稍加修改的（比較完善的立法所應該做的好事）不幸呢？我不想提出其他論点来证明这一真理，我只用你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論点。你說：富人在共同受苦的折磨下，慢慢地屈服于一种神秘的創伤，并在表面幸福的气氛中逐漸弯下腰来。

“你在写这几行时，是否想到从这几行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哲学推論？你只从中得出下面一个推論：使富人痛苦的就是穷人的貧困。这是背离唯物主义哲学的奇怪謬論，它和真理相抵触，并使真理变成謬誤。事实并不是那样！造成富人的痛苦的并不是穷人的貧困，而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穷人的貧困倒正是上帝对富人受痛苦的一种解释。你所說的那些神秘的創伤，使富人在其影响下逐漸屈服，难道这不是向你說明了，任何人类組織都不能实现物质上的幸福，都不能用純人类的方法来实现这一幸福嗎？”^①

你真这样想么？你要用这种学說直接去否定一切进步嗎？你有什么权利来肯定人类有責任去摧毀的禍害只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呢？在前进的道路上，許可达到的和不許可超过的界限固定在哪里呢？

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进步呢？如果你相信进步，那么我抗議你規定它的界限。如果你不相信进步，我就不必再跟你討論了。

^① 見1841年3月15日的《環球報》。

人們把所有的禍害几乎都归罪于人性的墮落，實則應归罪于社會制度的邪惡。請看一下你的周圍吧！有多少有能力的人安置得不恰當，因而就敗壞了這些能力！多少活動因為找不到它們的合法的和自然的目標而變成了騷亂。人們強迫我們的热情受邪惡的感染，結果都變了質，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這是把一個健康的人放入傳染瘟疫的氣氛中，在那裡呼吸着死亡的气息。

“基佐先生^①曾經說過：人類天性本身就帶着一種人類的努力所不能控制的禍害。在我們身上就有着紊亂。分配得不平均的痛苦是我們命運的天意法則所規定的。”^②

這就是他們的哲學！這就是一種使人絕望的哲學——如果能稱做哲學的話——但是，對於那種使群眾受苦成為神聖化的制度，這種哲學是很合適的。

好吧！以下就是在這種制度下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怎樣來說服這些被認為注定要受苦的廣大群眾得不到安慰而去受苦，毫無希望而去受苦，並且按照天意的法則而去受苦；又怎樣去說服這些群眾，使他們相信自己應該聽從自己命運的擺布呢？怎樣去防止群眾的失望呢？怎樣去遏制群眾心中所引起的那些不能滿足的熱烈欲望呢？

在古代社會中，忍受痛苦而沒有希望的人就是奴隸。

摧毀了奴隸制以後，天主教做了些什麼呢？天主教為了迫使它所不願意解放的人民滿足於他們自己的命運，就用“受苦將來可以

① 法朗蘇瓦·基佐(1787—1874)，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反動政客。——譯者注

② 見1958年的《法蘭西評論》。

受賞”这一著名的教条代替了古代的宿命論。它对这些不幸的人叫喊着：你們忍受痛苦吧，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痛苦是神圣的；你們要愉快地忍受着痛苦，因为上帝为了你們的痛苦保留着天堂的和难以用言語形容的补偿。

但是，这个教条对人們来說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人們懂得这不过是一种阻止被压迫者起来反对压迫者的合法反抗的純粹詭辯，这种不道德的詭辯已和作为它們的基础的暴政一起垮台了。

現行制度的哲学家、邏輯学者們，你們怎样来解决这一“听天由命”的严重的問題呢？被你們的哲学判定永远受苦的人，試問你們用什么道德上的控制来使他們停留在他們的貧困中呢？你們沒有看到我們所经历的革命使人民觉悟起来，使他們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嗎？你們是否知道这具有魔力的要求平等的呼声，已经从社会的这一端响彻到另一端，深入到所有的灵魂深处，唤醒了那些至今还没有被人意识到的願望呢？这就是你們应当重視的一件事情。不論这一事实是凶是吉，是受人贊成的还是受人咒罵的，它是存在着的；它控制着你們，并带动着你們。

当基佐在議會中大声疾呼說“劳动就是一个控制的工具！”的时候，他感到了这一問題的重要性。

我明白了：对于古代社会的奴隶就有宿命論，对于中世紀的农奴就有听天由命的教条，而对于現代社会的穷人就是忍受飢餓；讓我們强迫人民为生活而夜以继日地去劳动吧；让他們的生活完全消磨在沉重的劳动中，不让他们們有时间去想到自己是一个人，这样，世界上那些享福的人的安全就再不会被扰乱了。

这一切全都是梦想和疯狂！这个方法不只是野蛮的，而且在目

前的社会中还是荒謬的。

如果要使“劳动成为一个控制的工具”，至少它所应当控制的那些人都不应当缺少工作。但我們已经证明，无限制的竞争的結果必然会使很多的工人失业和挨餓。

有一次，在王国的第二大城里昂，有成千的工人走出他們的工厂，目光炯炯，手中拿着枪；在广场上飄揚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不是在劳动中生，就是在战斗中死。”这一次，里昂的工人大約是缺少基佐先生的那个道德控制工具了吧！

在那种以道德控制工具为絕對必要的学說中寻找这种道德控制工具，这是在目前制度下所办不到的事情之一，这是应该絕對解决的問題之一，并且，这是我們为了穷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富人的利益、为了弱者的利益也是为了强者的利益、为了受苦的人的利益也是为了享福人的利益而提出的問題。因为，我們有必要在反复地說过多少遍之后再重复說明，为不幸的人們的事业辯护就是为整个社会的事业辯护。

“有一个暗礁是路易·勃朗先生沒有充分注意而加以預防的：这就是对工人所受的禍害給以有力的同情就会引起对我们劳动組織的原則本身宣布一种严厉的裁判；这样就把那些与最近进行而尚未完成的事业分不开的現象說成是制度本身的內在缺点造成的。”^①

按照《世紀报》編輯的意見，他的結論就是竞争是一种新的体系，而这种体系还只是刚刚出現，需要加以改进。但是，人們只要

① 見1840年8月22日的《世紀报》。

稍稍注意閱讀我們对这一体系所給予的批評，就会相信我們所攻击的正是它的那个原則本身。我們曾竭力证明我們所揭发出来的灾害在邏輯上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竞争所产生的后果中，我們所強調指出的不是一些偶然的和临时的弊端，而是一些根本性的弊端，这是《世紀报》編輯自己也承认的，他在下面的几行中写道：

“对于自由竞争的譴責以它使劳动者受到最残酷的痛苦为基础，这是彻底改变劳动組織的必要的前提。路易·勃朗先生很清楚地建立了这个出发点。在閱讀了这些充滿着自信的、这样生动的篇幅之后，人們就了解到：作者确信应该以最大胆的尝试为代价，来阻止社会墮落，使它不致陷入可怕的大灾难中去。”^①

作者又补充道：

“尽管对自由竞争作了这样多的指責，但还应该說，竞争带来的是利多弊少。对于人民痛苦的正当同情不应该使我們成为忘恩負义的罪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群众的痛苦并不比今天少。今天，工人住的、吃的、穿的都比过去好。人民命运的逐渐好轉成为一个不容爭論的事实。这一好轉尚未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但是毫无疑問的是，貧困至少是比以前小得多了。”

我們本来可以簡單而干脆地否认这一事实；因为我們能到哪本书里去找这一事实的根据呢？老年人的記憶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关于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物质条件的概念。但是，应该注意到，人們以一种表面上的确实性所引证的事实只不过和这一制度的衰微有关，和这一制度的腐敗有关，它的腐敗如此彻底，以致它就带来

^① 見1840年8月22日的《世紀报》。

了这个制度的崩潰。其次，哪位历史学家写出了人民貧困的历史呢？只有一个人嘗試着写这种历史，那就是蒙泰伊先生^①。蒙泰伊先生所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紀的人民，在我們看来，并不比我們目前的人民更遭殃。

此外，問題并不在于要知道今天人民比他們祖先所受的痛苦是多还是少，而是要知道他們受苦受到什么程度，他們为什么受苦。但是，我們证明了什么呢？我們证明了他們的貧困是深刻的；而这种貧困是由竞争的原則而来的；只要听任这一原則随意发展下去，貧困就会有增无已。

我們刚刚浏览了那些通过报刊而向我們提出的批評。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批評是通过信件或口头提出的，我們就把它們来加以研究。

有人問过我們，是不是消灭了国内竞争就不可能解决关稅的問題。我們来談談这个問題吧。

有些人說，禁止进口的关稅制度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阻止某些外国产品的侵入，就会給国内的同样产品一种致命的竞争；而那些被这种竞争所威胁着的本地工业就会变成怎样呢？假如你不同情工厂主，至少也要可怜那些工人呀！你是否知道，当整个工业范围遭受波动时，这个注定要受罪的、只能以劳动为生的工人阶级要遭受多少痛苦，流多少眼泪呢？国家本来就是全国一切利益的保护者，它运用它的干預的权利来保护富人的发财致富的企图和穷人的工作，試問还有什么比这种干預权的行使更

^① 蒙泰伊·阿尔諾—阿萊克西斯(1769—1850)，法国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各阶层的法兰西人的历史》。

高贵的呢？

另一些人回答说，禁止进口的关税制度是不祥的，因为它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是有害的；因为它强迫穷人和富人往往要出高价来买得他们平常可以廉价买到的东西。以禁止进口原料为例，那么这种制度是不祥的，因为它会使全国生产的源泉趋于枯竭，同时会剥夺就业的因素。倘若禁止进口的是制成品，这一制度也是不祥的，因为它使某些不能真正持久的工业受到一种后果不好和欺骗性的鼓励。还有，在这种保护之下，国民的天才会趋向颓废，试问这种保护有什么意义呢？不以鞭策来推进工业，而用背带把它背在背上，难道这种政权可以称得起是很明智的吗？一切关税会引起报复。我们在自己的港口拒绝任何外国产品，同样，外国也会在它的港口禁止输入我们的产品。所以，禁止进口的关税制度只有在使一些人破产的条件下才使另一些人得到好处。铁的关税过高就会直接妨害产酒国家的繁荣。如果铁厂的主人眉飞色舞，葡萄园的主人就要发出苦痛的呻吟。使一切利益彼此发生冲突的保护该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叹的保护啊！使无政府状态严重十倍的干预该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干预啊！

双方各执一詞，喋喋不休；相对地说来，还是前面的那些人有理。绝对地说来，他们是错误的。怎么办呢？很难作出决定，因此就产生一种折衷的理论，这种理论在今天似乎占着优势。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既然存在着不能一天就摆脱的客观情况的要求，那么，就应该保持寓禁关税或保护关税可以保持的项目；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可取消的就应该取消。这第三种意见看起来很有理由，实际上是相当幼稚的，按照提出这一问题的说法来看，问题是

完全不能解决的。

事实如下：应当作为問題而提出的不是禁止进口的制度問題，而是自由竞争的原則問題。只要自由竞争继续存在，那么禁止进口的制度或保护关税制度就永远是必要的。請不要作空洞的爭論，因为我要問，为什么人們竟把关税制度当作有益的和使人受惠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呢？答复起来很容易。为的是要保护本地的某些工业来抵制与之相竞争的外国工业的自然优势。但是，不建立这些本地工业，岂不是更好嗎？毫无疑問，因为这些工业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建立出来的；因为他们們只能依靠全国消費者的供养才能維持下去；因为它们們只有，可以这样說，吮吸所有其他工业的血液才能生存下去。那么，这些工业为什么要建立呢？你可以向工业自由的原則去請教。

显然，在这普遍对立——我們社会制度的苦果——的情况下，一切事情，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須由我們去尝试一下；一切領域，不管是否能容納所有奔向那里去的人，都必須由我們去占領。竞争是冒险的制度，它自然而然地推动人們走向盲目的生产；它促使人們目光浅短；它預先饒恕了一切冒险行为；它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冒险思想的生母。在它的籠罩之下，如果产生那么多疯狂的思想，如果在它使每个人的行动发生混乱时，有那么多本来不該尝试而又偏去尝试的工业，这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这就是禍害所在，这就是使关税制度成为真正必要的理由。建筑物一旦建立起来，即使是疯狂地建立起来的，也应该加以支撑，防它倒塌下来压死人！

如果国家的干涉是以一个合理地而又强有力地組織起来的工业制度为前提，那么国家是否还有必要通过海关、禁止进口、关税

等办法来进行干涉呢？很明显，那是不必要的。

假如人们能够正确地实行我们所提倡的学说，关税问题立刻就会得到一个既简单又圆满的解决办法。的确，把社团的原则介绍到劳动中来，在所有本国工业中建立一种广泛的互助体系，难道这不就可以杜绝那些由于妄想或个人主义而产生的、后来又必须依赖合理企业来保护的不合理的企业吗？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下列一点，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新颖的：要消灭外国人在我们市场上所进行的竞争，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我们彼此之间在市场上所进行的竞争，换句话说，要想获得商业自由而不发生可怕的混乱和致命的骚扰，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社团和互助的制度来代替人们以工业自由的美名加以伪装的东西。

有人曾经对我们说：“你们的制度不是把纪律性的规则介绍到工业中来吗？这些规则会把个人自由的一切动力与创造力都剥夺掉的。实行你们制度的必然结果，不就是在扼杀竞争的同时，削弱了那种被竞争刺激得这样强烈的人类活动吗？换句话说，在你们的制度中，自由——一切生趣的源泉——和竞赛——一切进步的源泉——将变成什么样了呢？”

什么！我们的制度会打击自由！恰恰相反，我们的制度会解放那些如今处境比奴隶地位还坏的、干一天活一天的无数群众。圣西门主义说，“国家是财产的主人！”这就意味着取消了个人。但是我们说：“社会是财产的主人。”区别很大，在这个区别上，我们是不能不竭力坚持的。

我们的制度会威胁自由吗？为什么威胁自由呢？怎样威胁自由呢？社会工厂的成员不都是自由的吗？他们不是通过管理工厂的规

章而得到保护，因而不受任何专横行为的危害嗎？这些規章既“具有法律的形式和效力”，又規定了工人的地位、工人在生产中所应得的一份、以及利潤的分配，这些原則是任何人也不得违犯的，因为有公共的力量来使它們受到尊重。就是在社会工場中建立起来的等級制度也无非是对自由的尊重；因为这个等級制度是以选举为基础的，并且給工人群众选派一些他們根据自己的利益认为可以做他們上司的人来做他們的上司。建立起这样一种組織，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工作，并且都可以得到这个工作的合法报酬，这难道不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尊重自由嗎？

你們談自由嗎？我們是以自由的名义、以真正自由的名义、以社会應該給与每个成員的尊重的名义来向目前的社会制度以及竞争所产生的无数暴政提出抗議的。

因为，奴隶是什么呢？

讓我們研究一下事物的实质，我們不要咬文嚼字，像詭辯家和修詞学家所做的那样。

奴隶，就是那些衣、食、住都发生困难的人；也就是那些睡在空曠无人的豪华大廈外边台阶上的人。

奴隶，就是那些因为伸手向富人求乞而被处罰的穷人；奴隶，就是那些沒有住所、因睡在行人道上而被逮捕的人。

奴隶，就是那些不幸的人，飢餓迫使他們去偷窃，同时他們等待着社会判决他們坐牢。

奴隶，就是身为父亲而把他自己的年轻儿子送到有碍健康的紡织厂里去呼吸恶浊空气的人；奴隶，就是身为儿子而把他自己年老的父亲送往市立收容所去死在那里的人。

奴隶，就是六岁就进入工厂的穷人家的孩子；奴隶，就是从十六岁就卖淫的穷人家的女儿。

奴隶，就是那些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不是在劳动中生，就是在战斗中死”的人，他们写了这个以后进行战斗，并且牺牲了。

你们，现行社会制度的勇敢的维护者，你们在谈自由吗？但是，当你们敢于提出殖民地奴隶制度的问题时，那些殖民者会拿什么来回答你们呢？“我们的黑人比你们的按日计工的工人要幸福得多！”他们给你们证明了这一点。

按你们的说法，竞争对人类的活动的不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吗？是的，我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是什么样的刺激呢？刺激的目的又是什么？竞争推动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去使别人破产。这里所谈的活动是在战场上展开的活动。竞争的本质是：只有使一些人遭到不幸才能使另一些人得到幸福。竞争鼓励一个制造商去发明机器，但是，由于发明的专利权，这个机器在发明者手中立刻就成为一个压倒他所有敌人的武器。

一种可以减轻人的劳力的工业方法被发明了，这就是所要得到的结果吗？新方法的幸运占有者知道得很清楚，在什么条件下他可以战胜他的敌手；他并不减轻他的工人們的劳动，而是将他们大批地解雇。这些被解雇的工人由于这种“进步”就有饿死的危险。这就是竞争使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只有当竞争使贪得无厌的人增大欲望时，它才能刺激精心经营企业和改善企业的精神。

尽管这个动力在本质上是恶劣的，但是如果它在社会的每个成员身上都能起作用的话，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为了战斗就需要武器；为了竞争就需要资本。因此，那些按日计工的工人就被抛

在竞争所造成的运动之外。这样，在某些人身上竞争被推进到狂热的地步，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完全没有刺激，甚至连一点希望也没有。这就是人们敢于以进步和自由的名义来支持的事物的真相。

如果你走进一个现代的工厂，你就会看到在那里有一些人，他们的活动受着赚钱欲望的刺激；并且也会看到，在这些人之下，还有数以百计的人干一天活一天，他们看不到任何利润，即使可以从微薄的工资中省一点钱下来，第一次的失业或第一次的疾病就会使他们立刻把这一点点储蓄花光。对于这些不幸的人来说，竞争又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进行战斗，只充当了战斗的武器。

富人是利用穷人来彼此进行战争的。

世界上人们最滥用的词，毫无疑问就是“竞争”和“自由”，尤其是自由。现在不是已经到了确定“自由”这一字义的时刻了吗？自由就是让人们按照自己的天性的法则去自我发展的权利。好吧！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对大多数公民来说，这样理解的自由是否存在呢？我们早已证明，竞争为社会创造了一种强暴的环境，这种环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把过度和不断的劳动强加在工人身上。过度和不断的手工操作使智慧的动力毫无用处，并且使感觉趋于低能。在一天连续十二、十三、有时十四小时的笨重劳动中，精神生活和道德感情还能不熄灭吗？而且这是什么样的劳动啊！在组织良好的社会中，细致的劳动分工对所有的人都有无可怀疑的好处，但是也使人变成了机·器。

所以，如果对社会上一部分人来说竞争是一种刺激，那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一种真正窒息的制度。

那些不要社会改革而糊塗地叫喊着“应该教育人民”的人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很明显，这就需要给人民写书，刊印报纸，可是，即使人民有钱来买，却没有时间来阅读啊！这就需要强迫穷人把子女送进学校，可是，他们的孩子正需要从事劳动，使父亲不致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假如那个按日计工的工人能在手工劳动中抽出相当的时间，以便不完全忽略他在道德上和文化上的进修，那么人们就会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工人所能受到的教育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很粗浅的教育。当教育只是在人的理解力上灌输某些已经形成的观念，在他的记忆力中灌输某些事实时，教育是不会有利于人的；只有当教育能够发人深思并在人的身上发生作用时，它才有利于人，因为人们在受这样的教育时才会发展。而很不完备的教育，不但无用反而是危险的。

厄德耳斯坦·杜梅里先生在题为《预算案的哲学》一书中说过：“1821年，英格兰在校人数占全人口的十七分之一，但所处罚的罪犯的比例数却大于威尔士，该地受教育的人数只占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在普鲁士，在某些省里，罪犯的数字仿佛是和学生的数字成正比的。在1816年有人统计，在各省的每一万居民中：

省 分	每一万居民中的学生人数	在下列人数中就有一人犯罪 (1817年统计)
萨 克 森	1,492	506
威 斯 特 法 伦	1,394	639
普 鲁 士	1,030	1,405
波 森	327	2,197

这些数字是值得注意的。虽然有人多多少少地轻视统计，但

当数字与逻辑完全符合时，就应该对数字加以重视。使人民对他自己的处境不满，在他的心灵中唤起嫉妒，启发他的野心而他在不能得到满足时就变成狂暴，并且给他的思想开辟一个途径，他循径前进时却又不能不误入歧途，这就是一切不成熟的教育或遵循现行社会制度所依据的原则而进行的教育所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所以再谈到我们所提倡的这个制度，首先就可以发现这个制度有一种优点，那就是它不但不摧毁竞赛心，而且还使大家都有这种竞赛心并使这种竞赛心纯洁化。既然社会工厂的成员通过社团的成就都可以平等地得到利益，那么在成员之间就不会缺乏刺激。个人的利益就这样成为人类活动的动力而和公共利益不可分割，所以个人利益将失去它今天所有的一切可恶的和反社会的成分，而并不丧失它的动力。

另一方面，在这个制度中，对任何工人的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发展都不会再有什么阻碍了，因为一切科学发明，在社会工厂中如果不使利润增加，就使休息时间增多，并且也使工人得到闲暇以便受到文化方面的培养。不用说，在一个保证了并一天一天在改善着工人（一家之主）生计的制度下，不会再发生把一些需要空气、活动和自由的七、八岁的可怜孩子活埋在一个工厂里的现象。那时，工厂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使学校关门！

这就引导我们去研究另一个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见是：

“你一方面要想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要想扩大他们享受的范围。这两个结果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减少人民的劳动，一般的利润就不会增加。”

这是一种错误。即便让工人每天只劳动七小时，应分配的利

潤總額仍然会有显著的增加：

第一，因为当工人为了自己劳动时，他就会热情地、专心一致地和快速地去完成他今天緩慢地和厌恶地所做的事情；

第二，因为社会中不会再有这一群依賴着今天普遍的混乱而生活的寄生虫；

第三，因为生产运动不再会盲目地和混乱地进行，而盲目的和混乱的生产則带来了市場的商品积压，并使博学的经济学者們认为，在現代的国家中，貧困就是从生产过剩产生出来的；

第四，因为竞争既已消失，我們就再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悲叹不可計算的資本損失，这种損失在今天來說造成了工厂倒閉、相继发生的破产、商品滞銷和工人失业，以及过度的和不断的劳动在劳动階級中所产生的疾病，总之，一切直接从竞争所产生的灾害。

“但是，在你們的制度中，国家如果不是工业企业者和投机者，至少也是一个市場的調节者。价格是否能像竞争时那样調整得同样合适呢？”

对于这一点，我們的回答是：从真正字义上来理解，竞争是絕對不起任何調整作用的。竞争使整个市場成为一个陷穽。由于它的变化无常的影响，有时生产者被迫亏本抛出产品，有时消費者受人无情地勒索。有人曾經主张，竞争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在生产要求和消費需要之間建立起一种正确的关系。沒有比这个主张更加虛假的了。我們假定有几个运输公司相互竞争地经营着我們的交通路线，这种竞争就給車票决定某一价格。但是，如果在三个运输公司中有两个由于竞争的結果宣告失敗，那么旅客立刻就要付出三倍的票价。換句話說，需要仍然是原来的需要，而对需要的要

求却改变了。

还能想像有比这个更横暴、更荒謬的事情嗎？

其次，如果要判断竞争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中所产生的规律性，那么只要观察一下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在竞争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产品都走上了伪造的途径，甚至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的产品也是这样。因此，商业竟成为一种可怕的說謊科学……简单地說，竟成为一連串沒有止境的不受法律制裁的偷窃行为了。所以，归納起来要知道的是，在确定事物的价值时，“調查研究”是否要比“意存侥幸”好，“規律”是否要比“武断”好，“法律”是否要比“无政府状态”好。

“你們的制度在社会成員之間所建立起来的共同一致，是否会产生取消財產继承而威胁家庭的結果呢？”

家庭的存在如果和继承原則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話，我們就可以接受这一反对意見，因为在促使社会仰仗集体資本来維持生存时，我們就造成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取消继承权即使不是必需的也至少是可能的。

但是，大家是否了解，直到現在为止，人們为什么把继承权的問題和家庭的問題看作是絕對相关的呢？在目前社会制度下，继承权和家庭是分不开来的，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恰恰存在于我們所攻击的社会制度的缺点中。因为一个年轻人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时，如果他既沒有財產又沒有人推荐，而只凭自己的能力，那么有多少危險在等待着他，他每走一步都会碰到障碍，他的生活要消磨在一种无止境的、可怕的斗争中。在这一斗争中，他可能胜利，但也冒着极大的失敗危險。这一点，凡是有

父爱的人都应该充分注意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如果一家之主不设法为自己的孩子们积累资金，那他显然就是拿他们的前途进行赌博。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家庭把遗产看成是必要的条件。但是，让我们来改变一下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让我们使每个为了为社会服务而进入到社会中的人能在社会上确实找到自由发挥他的才能的机会，并找到分享集体资本的办法。如果创造了这种条件，那么父亲的筹划将被社会的筹划所代替。事情应该这样。婴儿由家庭来保护，成年人则由社会来保护。

有人对圣西门主义者说过：“没有继承权就没有家庭。”他们回答：“好吧！让我们把家庭和继承权都摧毁吧。”从反面来看，圣西门主义者和他们的对方同样都错了。事实上，家庭是一种“自然的事实”，任何假设都不能把它摧毁的；继承权则是一种“社会的习惯”，社会的进步可以使它消灭的。

怎么！难道说，儿子以迫不及待的心情计算着生父的余年，这就是“事物的本质”吗？这就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吗？“某人富起来了，因为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产生这种联系说法的条件是家庭本质所固有的吗？不，不是的！你们谴责自然，要它对你们社会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弊端负责，这是你们诬蔑自然。使家庭的存在绝对从属于一个起腐蚀作用的并且已经腐化了的文明法则，这是你们侮辱家庭的神圣性。

今天，没有一点东西留给他自己孩子的穷人，有家庭吗？请回答吧。在我们所处的恶浊环境中，如果他有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可以没有继承权而存在吗？如果他没有家庭，那就请你们证实你们的制度是公正的，并请赶快来证实这点……

家庭不應該是一種特權啊！

如果我們單從給與那些尚不能自給自足的人的教育觀點來看，那麼，在家庭生活中一切都是可以贊嘆的和動人的。並且，在這種關係上，家庭是社會的必要基礎。但是，如果你越過這點，把家庭和繼承權聯繫起來，你就立刻會在社會利益和家庭利益之間劃上一條鴻溝。

繼承原則給予某甲的一件東西，不就是從某乙手中奪走的東西嗎？這不就是讓這一個人有權去發展惰性嗎？這不就是事先把那一個人的智慧和他的活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奪走嗎？當富人向貴族叫喊說：“你們做了些什麼？你們只不過是在使自己生下來的时候作了一番努力！”這時，貴族不是也可以向那些因得到遺產而成為富人的人反問：“那麼你們呢？”

關於這一點，讓我們來總結一下吧。家庭和繼承權只是相對地和在某種社會制度下才是分不開來的。家庭是從上帝那里來的，繼承權則是由人造成的。家庭像上帝那樣，是神聖的和永恆的，繼承權則注定要走社會的變革和人的死亡的同一路線的。

但是，在目前的社會被改變以前，對於家庭中繼承原則的熱烈支持不會被認為是太過分的。繼承權如果在全部社會制度改革之前取消的話，那就會產生很大的混亂，並且會造成很大的不幸。那些原因我們已經解釋過，我們不再多說。

誰敢起來攻擊他那個時代的偏見，誰就要受到庸俗的指責。我們現在還需要駁斥的，就是這種庸俗的指責。人們少不了會對我們說：“你們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啊！這是真的嗎？

政治經濟學是一種關於事實的科學，這是無可爭議的。但是，

真正的幻想家、真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仅仅注意到那些現存的但却显然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事实的人呢？还是那主要地关心着那些还没有存在但一定要出現而且馬上就要出現的事实的人呢？整个問題就在这里。这里有一幢房子，墙壁上到处都裂了縫，你却冒着压死的危险坚持要住在里面，試問你自信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嗎？

这里的问题是，构成近代史的是哪些事实呢？

在精神方面，是各种思想的斗争或者怀疑主义；

在社会方面，是各种利害关系的斗争或者无限制的竞争；

在政治方面，是各种权力的斗争或者无政府状态。

一个可以这样描述的社会能够持久嗎？这不就是那所百孔千疮的房子嗎？

此外，在我們所攻击的那个党派内部，没有一个明智人不开始了解有必要来一次社会大改革的。我还能說什么呢？来一次以这本书中所闡述的原則为基础的社会改革。从那篇发表在《两种世界評論》上的出自德·卡尔内^①先生的手笔的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話：^②

“那个以不断的努力来主张劳动組織的学派所依据的看法，是值得我們十分认真地加以注意的，因为那些善良的思想家定必感到他們几年来在发挥他們的思想时无疑地遇到的障碍。……而在实践中，的确，发生了什么事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而且每个人都在对那些逐年加深而找不到补救方法的創伤呻吟悲叹……如

^① 路易·德·卡尔内(1804—1876)，法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譯者注

^② 見1841年9月1日的《两种世界評論》。

果在这么多的痛苦面前，一些勇敢的思想家企图整飭他们认为是混乱的局面，那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在厂主和工人之间，国家出面干预；为了社会的最高利益，对于劳动自由像对于政治自由本身那样进行限制；政府关怀生产是否适应需要和有无销路，以便通过明智的干预来防止受骗和灾难；最后，由国际法像已经限制军事力量的竞争那样来规定并限制工业力量的竞争，所有这些思想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是，看到共和派的政论家却把这些思想当作他们的原则的最终结果而在欧洲进行宣传，这就未免有些突兀了。”

我们可以答复德·卡尔内先生，他所认为突兀的只不过是很简单的事情；真正的民主学派从来就不宣传自由主义的那些狭隘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放任主义只不过是今天掌握政权的人所利用的工具，并且这些人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去宣传那种破坏性的学说才得到了政权。但是这和我们所说的无关。我们引用德·卡尔内先生的文章，只是为了对付那些有意把我们叫做“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让我们继续下去：

“激进党中略有声价的人写出的文章，没有一篇没有这类思想，没有一篇不让你看出其中有一种明显的努力，以求通过工业因素来改变政治因素。今天在民主党的行列中，向竞争宣战和1789年革命运动时向特权宣战的口号一样，已成为一种使人信服的口号了；廉价出售这一想法一向是同那个学派格格不入的，而那个学派，由于十年前没有料到种种失望和新的事实作为一个致命的打击已经肯定使它得到什么结果，现在却不得不利用廉价出售来恢复它的威信。”

十年前，民主学派还刚刚形成，德·卡尔内先生所说的民主学派的十年前的学说实际上只是自由学派的学说，而今天自由学派正在盛行，并且可以肯定，人们还不能说它从种种失望和新的事实中有所领悟；因为这一学派到现在还停留在它那些由来已久的谬误中，它以一些不可置信的贫乏理论来宣扬它可以统治世界的主张。我们应当十分注意的是：德·卡尔内先生也承认我们的思想有力量来给那些支持这些思想的人获得很大的威望！德·卡尔内先生在引证了我们曾经给廉价出售所下的定义（参阅本书第61页）之后，又补充说：

“这一段相当完整地总结了这一经济学说，这种经济理论的发展是那些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所不能不以好奇的心情加以注意的。萨伊的学生们无疑地会非难路易·勃朗先生，说不能这样过早地批判竞争和贸易自由的制度，而且也不可能在尚不充分实施和大多数欧洲政府还在抗拒它的时候就对它进行彻底的谴责。”

萨伊的学生们如果用德·卡尔内先生鼓动他们去说的那些话来非难我们，那么我们会提醒他们，正是由于竞争得到泛滥，它的祸害才加重和增加；这是一种不可争辩的事实；因而大家就不应该强调人们对竞争原则尚未完全付诸实施而得出有利于竞争的结论。此外，我们也请他们注意，他们把竞争和自由贸易很不恰当地混为一谈，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竞争的理论根据和自由贸易的理论根据是丝毫没有联系的；而且相反地，在竞争存在时，就不可能有贸易自由。但是由于我们在笔战上花了很多时间，因而忘记了为什么要引证《两种世界评论》的那篇论文。卡尔内先生在论文里扼要地叙述了我们的学说，以及我们的学说在阿道夫·布瓦埃先

生的杰出著作^①中所得到的发展,和在步雷先生的重要著作《論法国和英国劳动阶级的貧困》中所得到的闡明。接着,他回忆了法国的民主宣传是在多种方式下进行的这一事实,并把他刚才所引证的那三本书归入那一种宣传的范疇,然后他說:

“一个有远見而精明的政府会防止人們濫用那些能在群众中发生力量的思想,以免誤入歧途。它会采取一些只有它本身可以謹慎地、毫无危险地执行的措施。去年,当几千工人带着威胁的神气安靜地走过首都的街道时,当他們在和平和商业繁荣的日子里停止他們的劳动,在党派的激烈煽动下討論最复杂的問題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力量来消弥这种越是无知就越加危险的暴动。可是,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它應該去继续完成另一个任务。政府也必須提出由那些党派所提出的問題。政府應該自問,对于那些沒有規則也沒有监督的、完全受事变和命运摆布的事情,以国家活动的唯一方式,它可以干預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可以在厂主和工人之間进行一种关于劳动条件的有益的調停呢?政府是否有权根据需求和銷路的真正尺度来限制竞争呢?是否應該防止政府通过监督我們产品的輸出,来保护法国在国外市場上的荣誉和信用呢?最后,当新社会的結構建立在集中統一和行政作用上时,这一双重原則是否能对人数最多的和最易騷动的人們的利益漠然无視而存在呢?严肃认真的人对各民主学說的研究所应得出的主要結論,肯定就是以坚定的意志对这些問題加以研究,以便采用与那一经济学派所用的完全消极的原則迥然不同的原則来处理这

^① 《論工人的状况和通过劳动組織改善这种状况》。

些問題，这一经济学派的前途是会受到严厉的教訓的。”

这种語言够清楚嗎？我們对于一些庸碌之輩报复得够了嗎？这些人以他們的見解来衡量真理，对于他們所不了解的一切都宣告是行不通的，并且把由于他們的过于无知而不能討論的問題，看成是不值得攻击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些家伙总有他們的一大套詞汇，他們采用这些詞汇并傲慢地把它們当作是一些概念。他們是一些污蔑新思想的、毫无用处的思想家。

先生，你不是对你們一派以外的思想都加以愚蠢的嘲笑嗎？你怎能这样极端不公平，用“乱党”的字眼去侮辱那些做研究工作的人，而据你自己承认，这些人所做的正是政府应做的事呢？这么說来，我們是一些乱党，然而，你却建議政府应当把握我們的思想以便加以实施！我們是一些乱党，然而你也承认，不仅我們所揭发出来的禍害是真实的、不可胜数的，而且我們还指出了它們的真正原因，并且，至少到今天为止，我們还提出了可靠的补救办法！你天真地劝告政府来把握我們的思想！这是一种值得贊許的劝告。但是，我們敢說現政权决不会采用我們的思想；首先，因为目前的政治家是过于庸碌无能了，他們不敢去尝试作一些伟大的和豪迈的事情；其次，因为他們所效劳的有关方面过于盲目，以致他們不会对压迫的愚蠢性进行了解。

真的，他們并不是沒有得到警告。我开始写这本书时，头几行就是在騎兵队几乎猛冲到我的門口时写出的。这是在馬孔港正在流血和格雷蒙^①正在冒烟的內战廢墟中恢复了秩序的消息传来时

^① 馬孔是巴黎东南約三百公里的一座城市，位于索恩河西岸；格雷蒙是巴黎以北約五十公里的一个城市。——譯者注

继续写下去的。难道我們注定要看着这些悲惨的場面不断重演嗎？难道这些訴諸仇恨的强烈呼吁永远是唯一可以使人听到的呼吁嗎？为了預防，就出动警察；为了鎮压，就采用枪炮。啊！这太过分了！这太过分了！但这还不够，还用机枪把反抗者活活射死，死了以后还要加以侮辱……請你相信我的話，这还不够，只要科学不反对叛乱的思想，騷乱就会像一个必須用鮮血来装满的达那伊得的无底桶^①。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彼此接近，使它們了解它們的利益是連带关系，使它們团結在一种高尚的、和諧的和博爱的感情中，这就是一切真誠地热爱他的国家的人的責任。但是，在以絕對的手段去破坏上述那些劝告的效果的制度中，这些劝告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我們应当在这个制度的罪恶上着眼。还有哪种研究的主题比这个主题更丰富更高尚的呢？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人們如果面临着这么多的痛苦而有动于衷，如果希望結束这些痛苦、研究它們的根源和影响、揭露它們的本质、寻找补救的方法，就会被那些“实践家”說成是一个幻想家、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个危险人物。遺憾得很，这些“实践家”的智慧并不那么高超，因而他們就不能不时时受到残酷的否定。这些否定来自誰呢？就是內战。

关于这一主题，讓我們再来談几句。在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最后几天，有一个人說出了下面这些話，人們会怎样来談論这个人呢？这个人說：

^① 达那伊得是达那斯的五十个女儿的名称。她們奉父亲的命令，在她们新婚之夜，各把自己的丈夫杀死。只有一个女儿，名叫伊伯內斯特尔，沒有杀死她的丈夫，他名叫林塞，以后他杀了达那斯和他的女儿。达那伊得被判在地獄里用水装满一个无底桶（見神話）。——譯者注

“你们看看教会的权力吧！一个人刚出生在世界上，就在摇篮旁边有了教会。在他的童年时代，教会就按照它的意愿来培养他；等到成年，教会容许他成亲并允许他做父亲；当他临死时，教会接受他最后的一口气；死了以后，教会把他埋葬起来；当他被放入坟墓后，教会仍在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中追踪着他，并且用他的灵魂来给活着的人当作一个希望和恐怖的教材。教会像统治着乞丐的良心那样统治着国王的良心。教会的权威也被那些没有屈服于它的训诫的人所承认；一切尘封的壁龛里都有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一切卧室都有祈祷的跪凳。建筑、雕刻、绘画、天才的著作、优秀的艺术，这一切都用来标志教会在社会上的活动和它的最高权力。这种影响扎在人们心灵的深处，它是由许多世纪屈服在同一信仰之下所造成的，怎能摧毁这种影响呢？所以教会的精神上的权力的确是很大的，但并不比它的政治权力更大。路易十三时代，法国被黎塞留神父^①统治着；路易十四幼年时代，由马扎蓝神父^②统治着；路易十四老年时代，由勒特利埃^③神父统治着；摄政王时代，由红衣主教杜布瓦^④统治着；今天，路易十五时代，法国被又一个教士红衣主教弗勒里^⑤统治着。至于教会的财富，它们是庞大无比

① 阿尔曼-让·杜·普勒斯·黎塞留(1585—1642)，公爵，红衣主教，路易十三的宰相，1624年起，成为法国的实际执政者。——译者注

② 季里奥·马扎蓝(1602—1661)，红衣主教，1643—1661年路易十四在位初期的执政者。——译者注

③ 米歇尔·勒特利埃(1603—1685)，路易十四的宰相。——译者注

④ 季优姆·杜布瓦(1656—1723)，奥尔良公爵摄政时代的宰相，性格恶劣而奸诈。——译者注

⑤ 昂德莱·埃尔居尔·德·弗勒里(1653—1743)，主教，路易十五的老师，1726年任宰相。——译者注

的，神职界在岡布利西^①的一千七百把犁耙中占有一千四百把；在弗朗什·貢戴^②大部分财产是属于享有固定收入的修士的；九千个别墅，二十五万九千处出租地或农场，十六万三千法国公亩葡萄园。以上这些就是教会在法国的物质力量的基础，每年的收入相当于十二亿两千万法郎。^③

“好吧！再过几年，这个庞大的力量就要消失了。信仰自由的原则将代替教会在精神上的权力，没有人再会相信教会的话；它的传统将受到公开的藐视，教会的广大财产将成为国家的财产，而它的成员将得到工资作为交换条件。

“你们看看国王的权力有多么大！国王的那些疯狂行为足以证明他的势力可以达到什么地步。路易十四使法国浴血，却竟能逍遥法外；摄政王把法国劫掠一空，而没有受到处罚；还有路易十五使法国失去了荣誉，而没有受到处罚。国王的宫廷费用高达二千五百万法郎^④；国王赌博所输的钱可以养活几千穷人；国王个人的投机事业^⑤可以产生使人民陷于绝望的人为饥饉；国王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庞大的垄断；国王为了使他的侍臣和情妇发财，能随意使谷子的价格涨落^⑥；国王拥有各种各样的产业可以赏给蓬帕杜

① 法国的占地名，在现在的诺尔省。——译者注

② 见1731年5月17日法国国王敕令的引言。

③ 见弗勒里主教给路易十五的参政会的信。

④ 见1774年向路易十六的报告书《报告汇编》第114页。

⑤ 见苏拉维：《君主政体的衰微》，第3卷，第313页。

⑥ 拉克勒泰尔：《十八世纪》，第4卷，第298页。

尔夫人^①，例如克萊錫^②的田产，奥尔奈^③、貝尔維^④、摩納尔的行宮，圣勒米^⑤的庄园，埃夫勒^⑥大廈，埃丽舍-波旁^⑦宮和埃尔米达日^⑧別墅；国王有的是金錢，可以把二百五十万法郎^⑨賞給从一个警卫劍客那里霸占的宮女杜巴里夫人^⑩，作为对她寵爱的表示；国王嘲笑我們妻子的貞操，又使我們那些女儿的童貞作出骯髒的貢獻；人們对这些非法的勒索、这些恥辱和这些丑事只敢低声咒罵；这一切不都表現出国王由于人民的无知、廷臣的卑躬屈膝、王权的威风、刺刀的暴力和传统的影响，在法国所能作出的凶狠而橫暴的事情嗎？

“好吧！再过几年，你們就会看到王室被屈辱、被辱罵、受到限制和受到审訊的局面。资产阶级的議会将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司法人員将傲不为礼地坐在那里接待他；人們将把他的司礼官当作仆役；他的那些大臣将成为人民的公仆。一天(可怕的一天)到

① 蓬帕杜尔夫人(1721—1764)，侯爵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頗得路易十五之宠。——譯者注

② 克萊錫，法国的小市鎮名，以此命名者有三：一在塞納馬恩省，一在松姆省，一在安納省。此处所說的克萊錫是指其中一个。——譯者注

③ 奥尔奈，法国的小市鎮名，在下夏朗德省。——譯者注

④ 貝尔維，法国的一个市鎮名，在塞納瓦茲省，距凡尔賽七公里。此处有专为蓬帕杜尔夫人所建之行宮，壮丽絕伦，建于1748年，今已无存。——譯者注

⑤ 圣勒米，法国的一个市鎮名，在罗訥河口。——譯者注

⑥ 埃夫勒，法国厄尔省的首府。此外还有过一个名叫埃夫勒的公爵。估計上述地名，即由埃夫勒公爵之名而起。——譯者注

⑦ 埃丽舍，在巴黎。建于1718年，原为埃夫勒公爵而建，以后蓬帕杜尔夫人和波旁女公爵都曾居于此宮。即現今法国总统所居之地。——譯者注

⑧ 埃尔米达日，蒙毛兰西山谷(在塞納瓦茲省)的一所別墅。——譯者注

⑨ 見苏拉維：《君主政体的衰亡》，第3卷，第155頁。

⑩ 杜巴里(1743—1793)，法王路易十五的宮女，頗得路易十五之宠。——譯者注。

来时，人們將把他送上断头台，就連罪大惡極的犯人在行刑前被允許作的事也不准他作……，因為國王的話本來是最有權威的，但他一旦落在劊子手的手里，他的話就被刑場的鼓聲所掩沒了。

“請你們再看一看貴族的權力有多大吧！它一方面依靠着國王，另一方面又依靠着教士。公共職位是專門保留給貴族的；他們擁有宮廷的各種官職，享受一切恩俸，充任軍隊里的軍官；王宮中的最大官員也是從他們的內部選拔出來的，這些大官享有出賣下屬官職并把賣得的錢中飽的特權。為了發財致富，可以享有關卡金、地租、徭役、永遠管業權以及各種各樣的人身奴役權。他們可以打獵；可是農民也去打獵的話，就會被判處徒刑^①。他們擁有上、中、下三等法院的審判權，他們備有刑具、枷架和鐵鎖。死罪的判決由最高法院複審，這還不過是最近的事。在农村中，他們有這樣大的權力，以致他們能使人像耕地的牲畜一樣去拉車；为了不叫青蛙吵醒貴族夫人的清夢，就叫一群不幸的人通宵拍打着池塘^②。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長期以來，就允許一個貴族可以用五個蘇的代價來殺死一個貧民。

“好吧！再有幾年全部貴族都將被消滅掉。一夜的時間就足以使封建制度全部崩潰。是的，在這一夜，農奴這個名稱將從語言的詞匯中取消，永遠管業權將被摧毀，貴族法庭將被廢除，賄收特權將被消滅，賣官鬻爵將被禁止，什一稅可以贖買，公民都可以充任一切職位。而最令人痛快的事，就是這些反對貴族的改革是由貴族自身來達成的：貴族對自己宣告了判決，並將不可挽回地鑄成自己

① 參閱1789年8月4日的通令。

② 見勒干·德·蓋朗日爾1789年8月4日晚的演說。

的崩潰。^①

“这还没有完。今天的工业是隶属在行会头子和工场主的制度之下的。

“好吧！通过所有革命中最突然的和最深刻的革命，人们将宣告无限制竞争的原则。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今天社会的一切都将丝毫不留，绝对丝毫不留。”

我再问一次，如果在1789年前几年，一个人说出这样奇怪的话，大家会怎样看待他呢？人们是否会把他叫作空谈的理论家、慷慨的幻想者、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和疯子等等呢？可是，他说的是真理，那些把他说成是疯子的人却因此证明他们自己是沒有远见的和盲目的。

新社会制度的拥护者，今天恰好就处于这个人的地位。并且，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制度和实施我们的理想之间的距离，要比1789年前夕的社会和后来存在的社会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小得多。

^① 1789年8月4日晚。

第二篇 論著作權

I 禍害的本質是什麼？

著作家很多，只有一部分是富裕的，很多則死于飢餓。自由已經破產，出版業已經虧本，讀者的趣味降低了。在這麼多華美、豐富的書籍中間，知識領域從來沒有現在這樣貧乏……。這就是禍害，這個禍害是龐大無邊的。人們提出了哪些補救的辦法呢？就是這一條把作者的著作權從他死后二十年延長到三十年的法令嗎！噢！吉斯特費爾德^①勳爵在送他的兒子去訪問歐洲的那些重要的宮廷時，對他的兒子說：“去吧，我的孩子，你去看看世界是被多麼貧乏的智慧統治着的！”他這樣說是有道理的。

等一會我就要說到規定著作權是多麼的不合理。這種人要想尊崇的所謂著作權，它的行使期間的延長對於社會來說是多麼不幸！但在還沒有談到問題所引起的無數困難之前，我要問：在這裡立法者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他們的目的顯然是要尊崇作家的職業，把它看成是行業，一種掙錢的方法。但是使文學成為一種工業生產方法，這是否合理和符合公共利益呢？社會上有很多人為了發財或甚至為了生活而寫作，這是好現象嗎？我認為這不是好現象。

^① 菲利浦·吉斯特費爾德(1694—1773)，英國政治家、作家。——譯者注

理由很简单。一个作家要正确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必须不为人们的偏见所左右，应该有勇气不怕得罪别人而做出于他们有益的事，总而言之，应该从精神上来影响他们。这个使命是伦理学家的使命，也是作曲家的使命；是哲学家的使命，也是诗人的使命；是使我们流泪的那种人的使命，也是使我们发笑的那种人的使命。一个作家的精神产品所具的形式并不重要。在博马舍和尼科尔^①的作品中，在莫里哀^②和帕斯卡耳^③的作品中，这种无上的权力都同样是真实的。

是的，文学对于社会有指挥权。但是，如果著作家堕落到把文学当做一种行业来做，如果他只是为了“积累资金”而写作的話，那么这一指挥权会变成怎样呢？迎合公众的趣味，顺从公众的偏见，培养公众的无知，附和公众的错误，支持公众的恶劣情欲，最后写出的作品对公众是有害的然而却是他们所欣赏的……这是任何生财有道的人的必要条件。怎么！你得到了我给你金子，却来羞辱我的愚昧，责备我的自私，在我享受掠夺得来的果实时打搅我；你使我对于未来感到恐惧！先生：你的智慧的价钱太贵了，去你的吧。这样，著作家的思想就失去它的教育性质和它在精神上的权威了。如果作家仰仗公众的恩赐，他就会丧失指导社会的能力，甚至会丧失指导社会的欲望，这就像一个国王放弃王位似的。

毫无疑问，所有的精神产品不见得都会有同样的重要性。然而，一切著作，甚至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最没有价值的著作，对于

① 比埃尔·尼科尔(1625—1695)，法国的伦理学家和神学家，著有闻名的《试论道德》一书。——译者注

② 让-巴底斯特·卜格兰·莫里哀(1622—1673)，法国名剧作家。——译者注

③ 勃来士·帕斯卡耳，(1623—1662)，法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社会都会起着或好或坏的作用。著作沒有权利只去做群众的消遣品，因为要使人們获得安慰，它就必須能够打动他們的智慧和心灵。順便說来，这就证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論是一种糊塗的想法。

不管文学作品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它总起着一种影响，而使这种影响达到最高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它掌握在那些見錢眼开的人的手中，那是极端危险的。我同意人們訂立一条废除著作家以著作为行业的法律；但是，如果制訂一条法律使这一行业收入更多并鼓励著作家成为文学的制造商，在我看来这是毫无意义的。

不仅宣布一个作家是他的作品的所有者这种做法是荒謬的事情，而且，作为奖賞而給予他物质上的报酬，这同样是荒謬的事情。卢梭为了生活而抄写乐譜，为了教育人們而从事写作。一个配称为文学家的人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一个文学家如果他有錢，就应该聚精会神去从事思考，这是他做得到的。如果他是一个穷人，他就应该懂得，怎样使他所从事的謀取生活之需的职业和他的写作工作配合起来。

在現代的作家中，有一位耐心地 and 通宵不眠地从事研究的作家，他为了人民终于把那条到处断裂的传统鎖鏈重新連接起来。可以肯定說，沒有一个人会比蒙泰先生为了一部历史著作而工作得更热情更有耐心的了；沒有一个人像蒙泰先生那样把一生的大部時間都用在写作上的。倘若蒙泰先生在献身于自己的著作的三四十年中，只等着从他所写的著作中得到維持他生計的手段，那么結果会怎样呢？結果会怎么样呢？我不敢說，你可以猜得到。但是，感謝上帝：蒙泰先生具有一个勇敢的和高尚的灵魂。为了对付极

端的贫困，他就求助于一种可尊敬的办法：他出卖了他自己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材料，出卖了他去各处考察旅行时在这里或那里收集得来的珍贵手稿。这跟卢梭抄乐谱是同一作风。由于这种勇敢的行为，蒙泰先生过着贫困的生活，却避免了世态炎凉的摆布。他仍然是他自己的主人，也是他自己作品的主人。

假使他不是为使真理得胜，只为了“赚钱”而著书立说，假使他不依靠出卖罕见的手稿来维持生活的办法，而在他的著作上进行投机；那么他就会急于求成，写得更快、写得不那么好。他也就不会去写那关于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内容丰富的和有用的历史了……他也就宁可去写那种供人消遣的关于战争和宫廷中的明争暗斗的历史了。这样，社会就会失掉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一部优秀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著名的诗人中，人们敢于把多少诗人放在贝朗瑞^①之上呢？贝朗瑞的所作所为和蒙泰、卢梭一样。当他为他的那些不朽的诗篇而工作时，他就为了生活上的需要而找到了一个低微的职位。

1789年革命以前，严格地说来，写作职业是不存在的。在文学史中，我们看到，在路易十三时代，拉·赛勒^②为自己作品的畅销而自豪，拉·卡尔普勒内德^③尽管很高尚，却用了书店老板库尔贝的钱来买大衣。然而，靠作品收入为生的人却是不多的。在作

① 比埃尔·让·德·贝朗瑞(1780—1857)，法国卓越的诗人、歌曲家。他对拿破仑制度的讽刺诗《伊维托国王》获得了文学上的盛誉。——译者注

② 让·德·拉·赛勒(1600—1665)，法国悲剧作家。——译者注

③ 高梯埃·德·拉·卡尔普勒内德(1614—1663)，法国的小说家。——译者注

家中有一些人，如布藍托姆^①、比西-腊比坦^② 這兩位高傲的紳士，他們只在不用寶劍時才拿起筆來寫作；另外一些人，像代馬萊^③ 那樣，是一個公務員；還有一些人則是處於國王庇護之下的，如莫里哀和拉辛^④。大部分的文學家則像梅雷^⑤ 那樣，被一個大貴族所雇用。梅雷曾寫信給德·蒙莫朗西^⑥ 公爵道：“既然我像現在這樣榮幸地受您的垂愛，而我的獻身於您並沒有使我失去行動自由，我不知道，除您之外，在法國還有誰可以使我更恰當地把我所研究的最初成果獻給他的。”人們看到這種地位所意味的卑躬屈節；然而這種地位只能同造成它的那種制度一起消滅。盧梭為了不甘心處在這種地位，在他的獨立生活中，受到那些有嫉妬心的同行的無情誣蔑；他沒有狄德羅^⑦ 那樣幸運，因為狄德羅是喀德林二世^⑧的寵臣；他也沒有像伏爾泰^⑨ 那麼幸運，因為伏爾泰是腓特烈大王^⑩ 的朋友；他又沒有像格林^⑪ 那麼幸運，因為格林是十八世紀所

① 比埃爾·布藍托姆(1540—1614)，法國作家。著有《回憶錄》《法國名人和大將領傳》、《蕩婦傳》。——譯者注

② 比西-腊比坦(1618—1693)，法國作家。——譯者注

③ 讓·代馬萊(1596—1676)，法國詩人。——譯者注

④ 讓·拉辛(1639—1699)，法國有名的詩人。——譯者注

⑤ 讓·梅雷(1604—1685)，法國詩人。——譯者注

⑥ 蒙莫朗西，法國的一個有名貴族，其家族出了好幾個名人，此處大約是指蒙莫朗西·亨利二世(1595—1632)說的。——譯者注

⑦ 德尼·狄德羅(1713—1784)，傑出的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作家。——譯者注

⑧ 喀德林二世(1729—1796)，俄國女皇，1762—1796年在位。——譯者注

⑨ 法朗蘇瓦-瑪利·伏爾泰(1694—1778)，法國著名的作家和哲學家，啟蒙學者。——譯者注

⑩ 腓特烈大王(1712—1786)，普魯士國王，1740年即王位。文學的愛好者。——譯者注

⑪ 格林(1723—1807)，德國文學家和評論家。——譯者注

有爱好哲学的国王的中間人。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至少必須有一次革命，而在这次革命的前夕，《年轻的阿納卡西游記》^①的作者不是生活在舒瓦瑟耳^②公爵寵爱的庇护之下，愉快地隱居在尚特路^③嗎？

1789年——这永垂不朽的年份——来到了！这时作家不再属于某一个人了；他們不得不对于他們的著作进行投机，他們是属于所有的人了。我不知道他們在这方面是否得到了利益，但可以肯定地说，社会是受到了損失。作家过去所过的依附权貴的生活的义务实际上縮小多少呢？我不知道愚人的虛荣究竟向智慧索取了什么样的无聊的諂媚的貢獻。这是一种不幸；但是作家的尊严所受到的損失比社会利益所受到的損失要大得多。高乃依^④贊美馬扎蓝的德行的那种奴顏婢膝的序言，並沒有阻止《西娜》^⑤的伟大作者通过埃米里的嘴喊出：“为了要做一个超过国王的人，你居然自命不凡！”

今天，当一个作家自己發揮他的思想时，他的主人不再是供养他的权貴，而是讀者了。作家不再是出卖自己尊严的人，而成为放弃自己职务的人。

① 阿納卡西（紀元前六世紀），西得亞民族的哲學家，紀元前589年左右在雅典出現，成為梭倫之友。這裡所指的是修道院院長讓·雅克·巴爾戴萊米所著的那本遊記說的。——譯者注

② 舒瓦瑟耳（1719—1785），公爵，曾任法國路易十五世的外交大臣。——譯者注

③ 尚特路，法國安德爾-盧瓦爾省的一個村子。于爾辛女親王曾在此建造了豪華的別墅；其後舒瓦瑟耳隱居於此。——譯者注

④ 比埃爾·高乃依（1606—1684），法國傑出的悲劇作家。——譯者注

⑤ 《西娜》，是皮爾·高乃依所著的一部悲劇（1640年上演，1643年出版），女主角名埃米里。——譯者注

革命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把上帝掺杂在一起的嘉禾和莠草全部拔走。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这次革命在废除行会头子和工場主的同时，也給了垄断和社团以致命的打击；它在推翻一切旧政权的同时，同样也毫无区别地消灭了政权所践踏的和保护的东西。像在工业方面那样，个人主义的理論在著作方面也占了优势。革命方面竭力反对那个原則的代表人物，而那个原則在这反对声中却遭到了毁灭。为了更好地粉碎形式，人們就对思想进攻。在一切社团和保护制度的深刻动蕩中，作家們仅仅依靠他們自己，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們自己的思想去作买卖，拜金主义就侵入到写作中去了。另一种不幸是：写作已经不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因为那些看到其他职业已经人浮于事的人就成群結队地去参加創作。当个人主义以自由为名而把普遍竞争推向頂点时，在人类活动的各方面怎么会沒有拥挤的現象呢？另一方面，一些富有魅力的話吸引了人們；人們把“平等”一詞写在我們的法典中了。尽管如此，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仍受轻视，孩子們被灌輸的仍然是那种认为有些行业和艺术是“自由”职业而其他則不是如此的思想。因此，人們在心灵中对于一举地成名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因此，在所有那些青年人的思想中播下了从事写作或从事艺术的野心的种子。教育更加普及，但并未得到很好的领导，这样，就造成大量的青年人侵入到社会中来，这些青年對他們自己的欲望或幻想抱有信心，都同样地希望一举成名，同样地趋向現成的道路。

結果怎样呢？表現在工业方面的現象在写作方面同样也表現出来了。到处都有挤滿的人群，到处都有糾紛和沒有休止的斗争；有各种各样的混乱和灾难。著作界中的竞争也产生了和工业竞争

中所产生的类似的结果。工厂主为了廉价出售以打垮对方而假造产品，同样地，也会有那种伪造自己的思想、削足适履地改变自己的风格的作家，用硬凑的情节、夸大的情感、不伦不类的语调以及不道德的经验谈等等不光彩的诱惑力来争取群众。一个工业家以巨额的资本压倒他的竞争者，同样，一个富有的作家在声誉方面可以很快就胜过一个穷作家，他以后就利用已经得到的响亮的名声来把无人知晓的真正有才能的作家埋没起来。在不断增加着的书籍的泛滥中，群众失去了方向；他们既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去选择，就不再购买那些认真作家的作品，而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江湖派。因此产生了滥用广告的可怕现象、互相吹捧的来往、卖淫式的批评、同行的倾轧、一切可耻的行为、一切谎言、一切丑行。

倘若大多数的作家以损害文学的尊严、动摇公共的道德、腐化智慧的源泉为代价而能发财致富，那还算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做法既是丑恶的又是招致毁灭的；他们以声名狼籍始，以贫困终。

接着，在这些废墟上滋生了一些投机者，他们自告奋勇地向作家提供帮助。在这些思想混乱中，他们所加入的资本并不是钱，而是某种剥削的新花样，一种手段；作家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帮助。这种帮助很快就变成控制手段，买卖人去接近有才干的人，只是为了要吞噬他。人们看到一些作家、甚至一些最优秀的作家把自己出卖给文章的捐客，他们不是零星地出售，而是整个地出售，就像梅雷给蒙莫朗西公爵的信上所写的：“我献给您的是我自己。”在这一幅不幸地描绘得过于忠实的图画上，还能再加上些什么呢？一些勉强能拿起笔来的手，今天竟能号令着文学，这是不是真实的

呢？一些貧困的作家每天在某一個全能的投機者門口，像要求施舍那樣，寒伧地要求發表他們的文章，這難道不是真實的嗎？如果這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已經墮落到什麼樣的黑暗程度了呢！

昂利·德·拉土舍先生^①有力地描寫了寫作方面的這種墮落情況，他寫道：“寫作的風氣轉向金錢，這是我們時代的定型思想，這是帶着傳染病的癩狗咬了這個庸俗的時代。你們是否相信已經組成了反對思想傳播的集團呢？我們的作家們像萊茵河彼岸的小諸侯那樣結成聯盟，他們不是為了有利於傳播思想，而是為了有利於利潤的集中而聯合起來的。他們保證了他們自己領土的完整、邊疆的不可侵犯，因為這些邊疆都是靠得很近的。如果有人抄襲了他們的半篇文章，他們就認為被剝削了，這是著作界的神聖聯盟……人們會覺得奇怪：這些先生怎麼會讓一些人無償地在我們的林蔭道上散步，而不向看他們一眼的過路人去徵收稅款呢。”

^① 昂利·德·拉土舍(1785—1851)，法國的小說作家和詩人。——譯者注

II 人們所提出的荒謬无效的补救办法

請問，在我們剛才所描述的禍害的本質與人們所提出的那種补救办法的本質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禍害在於存在着太多的、無用的、惡劣的或危險的作品；而人們提出的补救办法却是以立法手續來許可這個災禍。

禍害在於書籍的作者利用這些書籍牟利，而人們提出的补救办法却是延長這種牟利的期間，並且使它成為一種身后的權利！

禍害在於下列的事實，即寫作成為一種行業，人們把它變成思想的商店，讀者成了顧客。為了保持來往，就應該試探這些顧客的愛好，迎合他們的朝三暮四，卑躬屈節地逢迎他們的偏見，附和他們的謬見；可是，人們提出的补救办法卻把這種可惋惜的事實作為神聖的原則來對待，並用法律來加以肯定！

這樣嚴重的盲目無知難以令人理解。

此外，既然人們談到了著作權，那麼我們就來看看這個詞彙意味着什麼吧。

思想所有權！這等於說，我手中拿着的皮球里所含有的空氣的所有權。皮球開了一個口，空氣就從裡面跑出來，四處散逸，混在一切東西裡面，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呼吸它。如果你保證我享有思想的所有權，那你就必須把大氣的所有權給我。你能這樣做嗎？

首先，我們要問“著作權”的擁護者們，連同波爾塔利斯先

生^①在內，對於所謂屬於某一個人的一種思想，你們怎樣理解的呢？你們說思想這件東西是屬於你們的。但是，也許用十本書，就可以包括現存的一切書籍；而這十本書是全世界的人共同寫成的。

偉大的人物只是仗着他們借自社會的力量來統治社會的。他們只有把社會本身分散出來的一切光芒集中在熾熱的中心才能照亮社會。他們是從社會攫取權力而加以領導的。

這是非常真實的，當基督出現時，羅馬的世界在期待着，並且對於福音有着預感。至於路德^②，他除了表達教皇的暴政在人們心靈中所喚起的反抗願望之外，還做了些什麼呢？這種反抗的願望早已在各處以各種不同的、但有力的和特有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人們可以看到，這種說法將導致我們放棄所有權的實質，而只去承認它的形式。據說德·巴爾扎克^③先生曾就著作權問題向議會遞呈過一份請願書，如果是真的話，他會同意上述的意見的。但是，請看這個冠冕堂皇的理論，它的結果是什麼。夏爾勒·傅立葉^④認為應該用一種奇怪的和難以理解的詞句來表達組成他的學說基礎的思想。來了一個文章抄襲家，他把傅立葉的學說據為己有，並且用清晰的文体，也可以說用優美的文体來說明這個學說，並把它全部賣出去。你們會看到在快要餓死的傅立葉身旁，這位

① 让·埃提昂納·瑪利·波爾塔里斯(1745—1807)，法國法學家，法國民法法典起草人之一。——譯者注

② 馬丁·路德(1483—1546)，德國的宗教改革家，新教的創始鼻祖，也是聖經的德文翻譯者。——譯者注

③ 奧諾萊·德·巴爾扎克(1799—1850)，法國有名的作家，《人間喜劇》的作者。——譯者注

④ 夏爾勒·傅立葉(1772—1837)，法國的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傅立葉主義者的領袖。——譯者注

抄襲家將發財致富。如果這樣來理解的話，那麼所有權該是什麼呢？這是剽竊。

此外，不管在每個人的思想中別人所占的成分有多大，人們至少不能否認，思想是從發表中得出它全部價值的。與世隔絕的思想有什麼價值呢？在脫離任何社會情況之下，實物的消費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消費是個人的，同樣也可以是單獨的。合群的觀念對野蠻人在樹林中所採集的果實以及對他所獵獲的動物的價值是毫無增益的。至於思想，那就完全不同了。思想的重要性是按照使它受智慧的尊敬的比例而增長的。消費損耗實物，並使它們消失。思想的傳播是智力的消耗，它不但不消耗掉那些無形的事物，反而使它們增多，使它們變得更加珍貴，並增加它們的內容和生命力。所以，並不需要知道精神產品的“根源”是從哪裡來的，只需知道它們的“價值”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就可以懂得這些產品不能是任何人的財產。倘若正是社會賦與精神產品以“價值”的話，那麼，所有權就應該只屬於社會。為了個人利益而承認著作的所有權，這不僅對社會有害，而且簡直是對於社會的盜竊。

“注意！”特·巴爾扎克在他的小冊子裡寫道，“你如果容忍人們否認著作權，那麼土地所有權就要處於危險的境地；攻擊著作權的邏輯不久就會推翻土地所有權。攻擊一方，對另一方也會發生影響。”作為戰術來說，沒有比這種對比更巧妙的了；作為論據來說，就沒有再比這種對比更貧乏無力的了。如果所有權在事實上得到承認，在原則上得到保護的話，這只是因為社會可以從這種協約中以及這種協約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中得到利益的緣故。人們假設社會會對地主說過：“你將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你可把它留給你

的孩子，因為那些為了儘可能使它變得肥沃的農業勞動要求安全、耐心 and 時間。你可以大聲疾呼說：‘這是我的。’誰反對你誰就要受處罰，因為我們要你去為了別人而不是為了你個人去栽種樹木，我們要你去挖掘那些將由你的孩子們去完成的運河，要你去開採礦藏，這些礦藏很深，用一個人畢生的時間是開採不完、消耗不盡的。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我們才宣告你是所有人。”

因此，為了保護所有權，人們就從不論是否確凿無疑的社會利益出發，絲毫不提及顯然有必要要尊重一個事實，這個事實是這樣地古老，這樣普遍地被接受，這樣不可動搖，並且甚至這樣難於加以改變。在這裡，却毫無相似之點。試把一個作家的利益放在天平的一只盤子里，把社會的利益放在另一只盤子里來衡量。人們要求我們承認的，簡直就是一個人比整個人類還要重。

所以著作權本身已被它自己的原則判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它的後果使它更加有力地被判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著作權得到承認的話，那麼首先就必須使它成為可以繼承的和永久的；因為二者必居其一，或是它和社會利益相抵觸，或是它和社會利益相適合，如果是前者，那麼為什麼要尊崇它的原則呢？如果是後者，那麼為什麼限制它的實施呢？在第一种情況下，這種做法是無可原諒的；在第二种情況下，自相矛盾是非常嚴重的。

實在說來，如果這一討論的要點只在於要知道作家的著作權是否在他們死後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後還存在，那就再沒有比這種討論更可怜的了。顯然問題並不在這裡。

但是，使作者權利的永恒性成為神聖不可侵犯時，社會將處在

什么样的危险中呢？《民族日报》在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中说：“如果使作者的所有权神圣化，那么一般的利益将变成怎样呢？是不是由作家本人来保证这一般利益呢？你知道作家可能会经过一些动荡不定的阶段吗？你不知道最有名的作家自传吗？拉辛在老年专心从事翻译《圣咏》时，他不是要想毁掉《菲特》和《昂德羅馬格》^①吗？拉·封丹^②受到他的懺悔神甫的攻击以后，不是要求烧毁他的那些短篇寓言吗？假如在1814年，对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存在着旁系亲属的继承权，政权是一定会引誘那些继承人的。继承人在行使他们的权利时会为了一笔巨款出卖这些作品的著作权，而这些作品也就消失了。”这些理由非常有力，还有多少其他理由来支持这些理由呀！但是，一般地说，我觉得在这种讨论中，那些反对著作权的人过于强调这种权利在继承上是不宜转移和永久存在的。应该攻击的是作家本身行使这个权利。不应当说：“你们不妨用‘待遇’这个词来代替‘所有权’这个词，并且在把继承人的权利限制在十年之内时维持事物的现状。”而应该像那些自信为真理而战斗的人那样，勇敢果断地说：“颁布一条法令，并不是为了使著作权神圣化，而是为了宣告著作权是反社会和反宗教的。颁布一条法令，以便取消作家的那种‘职业’地位，以便不用个人的待遇制度而用社会报酬的制度来代替著作权制度。”事实是，无论是著作权的拥护者或反对者，谁都不敢表现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在这里，我毫不犹豫地重复说：不只作家的继承人靠一本书来

① 《菲特》和《昂德羅馬格》是拉辛的两部悲剧。——译者注

② 让·德·拉·封丹(1621—1695)，法国的大诗人。——译者注

牟利是有害的，就是作者本人靠那本書來牟利也是有害的。

事實上，人們通過這種說法已經肯定，在社會中，思想這樣東西完全像一包棉花或一個糖麵包那樣，當然是可以交換的物品，而思想家的利潤當然是根據利用他的思想的人數來計算的。

一方面，這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這又是不公正的。

因為，誰能知道思想是以哪種方式傳播到每個人的頭腦中去的呢？從一本書里得到的思想可以由畫家的調色板反映出來；素描畫家的鉛筆可以抓住這個思想；雕刻家的刻刀可以把這個思想刻在大理石上；講演詞中也可以表現出這個思想，那麼，難道你能找遍無限的表現形式和無法計量的空間來追蹤這個思想嗎？世界可以成為這個思想的領域，難道全世界都要向你付錢嗎？在這裡，你接觸到了不可能的事；再進一步你就會接觸到非正義的事了。每人都會從交換中得到利益，但版稅卻只從幾個人身上征收。我在一本書中獲得你的思想，我就需要對你的思想付出代價。如果我从演說家的嘴中聽到這個思想或者在名勝古迹的大門的雕刻上看到它，那我豈非不必付給你任何代價了嗎？人們既然談到版稅，那麼有比這樣的一種捐稅分配方法更加不近人情的嗎？

談到物質的東西時，人們如果根據消費量的大小來衡量生產的利潤，這是可以理解的。消費的限度是可以估計的，因為消費的結果達到一種耗損。但是，對所謂通過傳播來實現的那種文化上的消費，你能劃出一個界限嗎？思想被接受後並不會突然消失，反而會壯大起來，加強起來，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會傳播開來。即使你叫全世界都來接受這個思想，它也會像自然那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並且也會像上帝那樣永垂不朽。

因此，使思想受交换学說的支配，就是以有限的数量来计算无限的数量。这种学說的荒謬无稽是很明显的。

就这个学說的結果來說，它們是令人厌恶的。著作权的拥护者，也就是那些认为作家可以利用著作以自肥的人，高傲地扮演着天才保护人和智慧的庇护者的角色；他們沒有看到，如果他們的学說被大力地应用；如果这一学說的缺点不被相反的学說、即社会报酬的学說所减轻，那么他們的学說就会把天才引入絕境，把智慧的最珍貴的产品埋沒在黑暗之中。这是容易证明的。誰談著作权，誰就是談通过交易取得报酬；誰談通过交易取得报酬，誰就是談商业；誰談商业，誰就是談竞争。所以你看，坏书就来和好书竞争了；某些腐蝕心灵、玷污思想的小說就来和那些有益而又严肃的书籍竞争；誘惑性强的罪恶意识和最高尚、最道德的观念竞争。你可以放心，买《于斯丁訥》的人一定要比买帕斯卡耳的《思想录》的人較多；而还有这种情况，即使有人願意欣赏帕斯卡耳的天才，但是因为德·薩德先生^①对他征收了錢，他就不能去欣赏了。因此，由于这一为天才設想的漂亮的奖励制度，禍害的力量将增加百倍，群众的趣味在受到无可救药的腐蝕之后，将拒絕一切丰富的精神食粮。我們同时将受到下列一切灾害：由于危險书籍的泛滥，人們的心灵和思想都会变坏；伟大作家陷于貧困；某些小有才智而寡廉鮮恥的人或某些下流的作家却得到不体面的成功。

我不願意使这一严肃的討論变成一种关于一些人名的无意识

^① 德·薩德(1740—1814)，侯爵，法国作家，《于斯丁訥》等长篇小说的作者，他所著的小說都是誨淫誨盜的，因此毫无文学价值。——譯者注

的論戰；但是，如果舉例是必要的話，那我可以舉出不知道多少的例子來。多少平淡无奇的作品由于时髦而得到褒獎！多少有价值的书被埋沒掉！我用不着在这里舉出一位作家的姓名，他由于写了一本《結領帶的艺术》的小冊子而得到很多錢，因为我不能不联想到某些伟大作家的貧困而感到面紅耳赤。

今天，一本书成功了，为什么呢？是由于它的价值嗎？完全不是；而是由于他的发行人。天才要靠投机得到他的保障。

但是也有一些誠实的发行人，他們真正为著作服务。——是的，感謝上帝！在我这方面，我还认识一些这样的人，最有才能的作家在他們那里得到了一种真正的帮助。但是这种值得贊揚的人为数不多，而有些願意仿效他們的，大都被卷入到竞争的浪潮中去了，他們为了避免营业損失，不得不发行伤风敗俗或臭名远揚的书籍。

补充一句，真正的作家对于这門买卖的學問一般地是很外行的。著作制造商就不同了。这种人很巧妙地利用他的作品牟利；这是他的职业。通过交换而給与报酬的制度，实际上只是給与投机精神一种奖励。

所以，我們不論就著作所有权的原則来研究著作權，或是就它的必然的結果来加以研究，同样都不得不譴責这种权利。

可是，德·拉馬尔丁先生的报告却是以这样的权利作为出发点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德·拉馬尔丁的报告是以这样的詞句开始的：

“社会在規定一切所有权时，針对着三个目标：酬报劳动，延续家庭，增加公共財富。正义、远見和利益，是在每一占有物上都存

在着的三种观念。”

如果通过规定所有权这一事实来使劳动得到报酬，那么，所有从事劳动的人都应该成为所有者，而一切所有者又都应该劳动。但是所发生的事恰恰与此相反。目前规定的所有权在本质上允许享受所有权的人得到休息的一切甜蜜的乐趣，并把整个的劳动重担放在那些享受不到所有权的利益的人的身上。一方面，有一小部分人靠他们的年息过着优裕的生活；另一方面，大多数人靠他们流汗得来的果实勉强维持生活。让德·拉马尔丁先生在这点上稍稍考虑一下吧。

至于使家庭永久延续下去这一点，如果家庭要靠所有权才能永久延续下去，那么不是财产所有人的家庭就不能延续下去了。所以德·拉马尔丁先生的话应该这样修改一下：“社会在規定所有权时，目的是使一些人的家庭永久延续下去，而禁止另一些人的家庭永久延续下去。”

关于增加公共财富这一点，必须加以明确。如果财富增加了，但只集中在几个人手中，那么这并不是一种“公共”财富。在目前所规定的所有权的统治下，是富人比穷人多呢，还是穷人比富人多呢？

假如德·拉马尔丁先生说，“所有权之所以规定，就是因为社会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所有权，该用什么方式来安排生活”，那就好了！论点也就说得过去了。但是德·拉马尔丁先生谈到正义、预见和利益时，把社会利益和世界上那些幸运儿的利益混为一谈，把垄断误认为预见，把公正倒过来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有些人从事体力劳动，有些人从事脑力劳动。劳动的结果不同，劳动者的名义却是一样；一些人和土地、季节进行斗争，他们收获了用他们的劳动得来的那些可以看得见的和可以交换的果实；另一些人则和思想、偏见、无知进行斗争，他们用智慧的劳动、甚至用他们的眼泪、有时还用他们的鲜血洒在他们的篇幅上，随着时间的转移，他们得到的是贫困或群众的敬爱、殉道者或光荣。”

这种说明显然是不完整的。如果有些作家为了反对偏见而斗争，那么就有另一些人为了这些偏见辩护。有些著作有时攻击无知，有时却也支持这种无知。卢梭把光荣归于上帝，但霍尔巴赫^①则否认上帝。费讷龙^②提倡社会道德，而德·萨德侯爵则在腐蚀社会。科学上有伽利略^③之流，也有伽克里奥斯特洛^④之流，也许科学所造成的殉道者少于它所褒奖的骗子。

我坚持这个被德·拉马尔丁先生所遗忘的区别，因为，当涉及到奖励脑力劳动时，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寻求奖励脑力劳动的方法，而不是在同一奖励中把能使社会活跃并使社会得到光明的作家与欺骗社会并使社会道德败坏的作家混淆起来；因为这既不符合正义，又不符合远见，也不符合利益。

“把作者的著作权交给作家和他们的家庭，这是不是公平、有益和可能的呢？我们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在法律原则本身的开头几

① 保罗·亨利·霍尔巴赫(1723—1789)，生于普鲁士，无神论的哲学家，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译者注

② 法朗苏瓦·德·费讷龙(1651—1715)，侯爵，法国作家，十八世纪启蒙学派早期的先驱者之一。——译者注

③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的天文学者，物理学者，天体望远镜的发明者。——译者注

④ 伽克里奥斯特洛(1743—1795)，意大利医生和神秘术士。——译者注

条中已有規定。这些問題不是事先就已解决了嗎？假如正义不在原因和結果之間、在劳动和报酬之間达成相称的比例，正义又是什么呢？”

讓我們接受这个关于正义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沒有比把脑力劳动的奖励放在著作权中更不正义的了。

假如拉普拉斯^①从自己的作品中沒有得到別的物质奖励，而只得到可以随便处理和出卖它們的权利，那么《天体的机械作用》一书既只能供极少数的讀者閱讀，拉普拉斯的劳动和待遇之間将要得到什么样的比例呢？可是你看，有一个小說家，他急急忙忙地乱塗了几頁，这几頁不但恶劣而且誨淫誨盜，是专供所有那些无事可做的人的消遣而写的。那位天才的人物冒着死于貧困的巨大危險，而这位小說家却不必費很大力气，就有了車子和仆人。怎样来理解分配的正义呢？但是，你会說，国家会来保护有天才的人，給他荣誉，提拔他担任最高的职务的。你瞧，你已经越出你的学說了，这种使你越出你的学說的必然性，能够更好地证明我所能說的一切，即这个学說包含着多少可憎的不平等和多少对于非正义的尊崇呀！

“这是有益的嗎？我們只要回答說这是公正的就够了，因为对一个社会來說，首要的利益就是正义。但是，那些詢問在将来奖励脑力劳动是否有益的人，从来就沒有在思想上考虑这种劳动的本质和結果嗎？他們也許看到，这是一种沒有資本而可以进行的劳

① 比尔—西蒙·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譯者注

動，這種勞動可以不消耗資本而創造資本，並且，除了天才和意志的幫助之外，不用其他的幫助就可以從事生產。他們是否探索到這種勞動的結果呢？他們也許會看到這是一種對人類命運最有影響的勞動，因為就是這種勞動影響着思想，支配着思想。人們瀏覽一下世界歷代的思想史，就可以發現，當一個民族誕生之初，人們在立法者手中到處都可以找到一本聖書，如聖經、印度的吠陀經、孔子的著作、福音等等。全部文明都是一部書的產物。一部創造、破壞和改造世界的著作，對於世界來說，它會是一部無所謂的著作嗎？”

我們談到哪儿去了呢？我們的討論是要證明，把作家作品的著作權交給作家和他們家庭是否是一件有益的事。德·拉馬爾丁先生却不是證明這點，他給我們證明的是我們任何人從來沒有懷疑過的事實，即思想是有用的。這真是一種驚人的無稽之談。是的，思想肯定是有益的，我們不但不否認這個真理，相反地，我們卻根據這個真理來要求人們不要妨礙它的進程，永遠也不要阻止它的傳布。正因為整個文明是書籍的產物，所以我們不允許，哪怕就是這些書的作者，在人們宣告他是其中一本書的所有者以後，去撕毀這本書並讓撕下來的篇幅隨風飄走。因此，為了上帝的緣故，我們不承認你們稱之為聖書的那些書籍的作者享有著作權，免得你們把它交給一個白痴、也許一個惡漢或一個傻子去繼承。這是你們以一本書能給人類帶來巨大貢獻的名義，給予一個既未寫這本書又往往不能了解這本書的个人以那種不能想像的權利來破壞這本書嗎！因為，倘若你們承認這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實，至少你們應該認為這個事實是合理的，否則你們就會用一隻手來推翻你

們另一只手建立起来的建筑物，否則你們就会在确定那个所有权的同时，剝夺所有者的那些构成这个所有权的特权。人們能够設想那本福音通过继承权而属于某一位先生嗎？人們能够設想一个买得了专利的投机者出卖人类的幸福嗎？

“最后，这是可能的嗎？这种以思想通过印刷和书本而得到具体传播的偶然的和不可捉摸的财富，就其本质來說，是可以在所有权的形式下为我們所理解、确定并規定下来的嗎？对这个問題，事实已经替我們作了回答。这种所有权是存在的，并且像其他一切所有权那样，可以被买卖并可以受到保护。我們只需要研究与它有关的措施，規定它的条件，以便把它完全列入到对占有物和占有人确有保障的事物的范围中去。我們就是这样做的。”

貝尔維先生对拉馬尔丁先生报告中的这一段作了这样有力的回答，所以我們只需把貝尔維先生講話的原文引录在下面：

“在宣告所有权是永久的或是限制五十年的时候——实际上，結果都是一样的——，你不是碰到作家本人的問題，就是碰到他們的继承人的問題。好吧！假定继承者不是旁系亲属，作为第一代來說，这还没有什么問題；但是一旦这些继承人分散开来了，你到哪里去寻找他們呢？是否應該让著作权所有者組成一种貴族系統，并使它拥有它自己的歇符蓝和多济埃^①呢？还是應該像在威尼斯^②那样設置一本“金名冊”^③呢？这还没有完：你所給与的这个权利不

① 比尔·德—拉·加尔德·多济埃(1592—1660)，法国家譜学者。其子勒內·多济埃(1640—1732)亦系有名的家譜学者。多济埃已成为研究家譜学的学者們的通称。

——譯者注

② 意大利的一个城市。——譯者注

③ 这是一本冊籍，威尼斯城的全部貴族的姓名都用金字記載在这本冊籍中。它于1797年意大利战争中被毀。——譯者注

仅給了繼承人；所有權不僅可以通過繼承權而被轉讓他人，而且也可以通過出賣和贈與而移轉。所以，你也承認受讓人可以得到這個所有權；並且，既然這些轉讓契約不是公開的，那就必須猜測它們的內容，必須知道你是跟誰在打交道。你的摸索有沒有止境呢？”

貝爾維先生說的對。人們如果擴大著作權的行使，就不能不愈來愈接近混亂。德·拉馬爾丁先生把二十年期間所能做到的事情，認為在五十年期間將有可能做到而得出他的結論，因此他並沒有解決困難，而只是躲避了困難。他沒有注意到隨着年代的逝去，著作權就會易主並且也會分散開來，以致最後就不可能找到它的蹤跡了。

所以，德·拉馬爾丁先生的報告，對於他所要想證明的東西，一點也沒有加以證明。

但是對於這個報告所引起的辯論應該說些什麼呢？

在《人民報》上，格·卡韋尼亞克先生^①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以很高明的方式研究了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有才干的人，不應該比別人更甘心做貧困的奴隸；但是，倘若他不甘心情願處在這種適合於性格堅強的人的自由自在的貧窮和簡單的生活，至少既不應該養成奢侈的思想也不應該養成启发這些思想的興趣。當一個作家愛好錢財時，人們總會懷疑他是否有天才或者是否能夠保留這個天才。如果他有天才，吝嗇會使他的天才墮落，奢侈會使它趨於衰弱。如果那個作家具有天才，我認為他就只應當在他的思想本身和他的名望中去尋求他的樂趣；只有在他的理論中和他的

^① 格·卡韋尼亞克（1801—1845），法國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利浦王朝時代的民主黨的領袖。——譯者注

影响中去寻求他的乐趣。毫无疑问，他不需要有阿尔帕貢^①或屠尔卡雷^②的享受。我们的社会不再有隐居的条件，也不再有严肃的生活，这种条件和生活至少保留着朴素的和摒除私欲的风俗习惯、宁静独居的和飲食淡泊的清規、謙遜而忠实的热誠的传统。再也没有像本篤会修士那样的人远离人間去笔耕学术世界的一个角落，再也没有传教士把教义带到遙远的地方，深入到那些遙远的国家，再也听不到他們的姓名，再也没有学术团体遁迹在某些学院中，去度那粗茶淡飯的生活，并为默默无聞的工作去服务了。当然这一切都混杂有过多的流弊和恶习，使我們不去惋惜他們的那个时代，但是我們所惋惜的是这些摒除私欲的、退隱的、献身于社会福利和研究事业的高尚而严肃的生活的榜样。目前，这是一个无人担任的任务，我們願意看到无愧乎作家称号的作家們来承担这项任务。”

这些就是高尚地表現出来的高尚的思想，而議會本来是應該把自己放到这种高度上来討論这一問題的。但是，幼稚而可怜的是：把思想当做一种物品，并且費尽心机去研究一个家庭对这种物品的占有能继续多久；竭尽辯論之能事来了解，例如，一个著作人的債权人是否能够扣押这个作家手中的一个伟大人物的天才作品，作为債权的抵押品；又如去了解在共有财产制下，丈夫作为财产管理人，是否有权不得妻子的同意，去发表她的作品；又如去了

① 阿尔帕貢是莫里哀喜劇《櫻吝人》中的主要人物。这个名字代表了貪財如命、一毛不拔的守財奴。——譯者注

② 屠尔卡雷是法国小說家勒薩日(1668—1747)所著的一部喜劇《杜加萊》的主人公。杜加萊是一老奴仆，仗着放高利貸发了財。杜加萊这个名字泛指一般暴发戶。——譯者注

解丈夫死后所遺下來的作品的發表權是否無限制地屬於妻子等等。從律師的這些爭吵中能產生些什麼結果呢？讓人們對下列各款加以判斷吧：

1. 發行一部作品的專有權在作者的生前和死後三十年的期間歸作者和他的代理人所有；

2. 當這個權利在作者本人手中時，它是不得被扣押的，而只有在受讓人手中時才能被扣押，並且，扣押者又必須是受讓人的債權人；

3. 如果沒有正式的契約，應認為作者所出讓的只是第一版的發行權。

這就是根據德·拉馬爾丁先生報告中所發表的原則而提出的那個法律草案的主要內容。這個結論是和引言相稱的。噢！笛卡兒！^① 噢！蒙台涅！^② 噢！帕斯卡耳！噢！盧梭！噢，所有的作家們！你們的著作使法國登上了全世界的知識王座，如果你們能看見人們怎樣濫用你們的名譽，而且人們為了使什麼樣的動機得到勝利而引用了你們不朽的姓名，那麼，你們會說些什麼呢？

至少，如果人們剝奪了這種職務的尊嚴性，那麼就應該使那些光榮地執行這種職務的人增加福利！但是，因為人們把繼承人的享受延長了二十年到三十年，是否就可以認為作家的命運將真正地得到改善呢？一個勇敢的作家把一生的四分之三時間用來寫一

① 勒奈·笛卡兒(1596—1650)，法國傑出的哲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和生理學家。主要著作有：《形而上學的沉思》(1641年)、《哲學原理》(1644年)。——譯者注

② 米歇爾·德·蒙台涅(1533—1592)，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進步哲學家。——譯者注

本只有少数讀者願意看的書籍，他的待遇会更好些嗎？一个沒有亲戚、沒有财产和沒有声名的青年人，会因此而更容易找到一个发行人嗎？一切有利于欣賞那些逢迎时代的反常行为和罪恶的作家，而不利於那些从事糾正、攻击和駁斥这些反常行为和罪恶的作者的风尚是否会有所改变呢？这些就是要求迅速予以补救的創伤。我們的立法者沒有想去医治这些創伤，而他們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很慚愧地說这就是：——关心一个天才的人的孙子会餓死，这是一种什么現象呢！——的确，这种現象是痛心的。但是一个天才的人的孙子怎么会遭到餓死的危險呢？如果这是因为他一点也不願为社会服务的緣故，那么我是不会可怜他的。假如这是因为社会对于他的貢獻沒有給与适当的报酬，那就是你們社会組織方面的錯誤，那么就請你們改变这种社会組織吧！

III 按照我們的看法,什么是补救 禍害的方法

在一切有关著作和作家的法令中,应当得到以下几点結果:

第一:尽可能减弱发行家之間所进行的激烈竞争以免給著作带来灾害性的影响;

第二:向一切穷困的和无名的优秀作家們提供出版他們的著作和使人知道他們的才能的方法;

第三:在通过交换而取得报酬的制度以外,同时再建立一种奖励方式,这一方式要使奖賞和服务相称、使报酬和价值相称,并且鼓励作家写出严肃的作品,同时把作家从依附于讀者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些讀者喜欢可供消遣的作品,并且只是为了使自己腐化和受騙才肯花錢;

第四:要做到使最好的书成为价錢最便宜的书;

第五:建立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在本质上可以限制作品掇客的利潤,并且对那些把自己变成投机者或投机事业的供应人的作家的那种可耻的傾向进行斗争。

为了至少部分地达到上述那些不同的結果起見,我們提出下列建議:

根据本书《劳动組織》一章中所指出的那些基础和方法創辦一个社会书店。

这个社会书店从属于国家,但不受国家控制。书店自己管理。

自己，并且像上述那一章所說的那樣，由它自己把共同劳动所得的利潤在它的成員之間进行分配。但是，它的組織最初是由国家以法令的形式所制訂出来的規章来加以規定的，并且，上述規章的严格执行須由国家来加以监督。^①

根据这些規章，社会书店无需支付任何版稅。书店出售的书的价格事先应由国家决定，并且尽可能定得很低。

一切印刷費用都由社会书店担負。由书店挑选和給与报酬的一些能干的人組成委员会选收作品。

由社会书店出版其作品的作家們，用他們所放弃的著作权作为交换条件，享有参加获得专为他們而設的国家奖金的竞赛权。

国家預算中专設一笔基金，以国家奖金的形式来奖励上述那些作家，这些作家在思想的各个领域都應該是对祖国最有貢獻的作家。

每一个作家的第一部作品被认定值得給与一笔国家奖金时，就要給社会书店一笔奖金；这笔奖金的目的就是鼓励书店去支持那些青年天才和补偿书店所受的損失，这是因为书店的这种保护行为有时可能使书店受到損失的緣故。

人民代表每年任命一个公民負責管理每一种腦力劳动，这个公民由社会书店給以报酬，他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范围内来审查那些社会出版社刊印出来的著作。他可以用全年的工夫去深入了

^① 在这个問題上，我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除了路易·雷博先生之外，所有願意注意这本題为《劳动組織》的小书的批評家，都責备我們給国家增加了巨大的、因此是不可能的工作負担。倘若他們更注意地閱讀了我們的书，他們就会看到我們并不使国家成为社会工場的場长，而使它成为社会工場的立法者，这是大有区别的。

解對於這些作品所提出的全部批評，研究社會由這些著作所得的印象，最後徵求公眾的意見，這些意見是由水平相當高的組織反映出來的，而不是由買書的盲目群眾反映出來的。到了年底，他要作出一份精確而詳細的附有說明理由的報告，把他研究的結果提交給人民代表。在這份相當嚴肅地提出的報告發表之後一個月，人民代表就在大家認為對祖國有貢獻的那些作家之間分配國家獎金。在分配時，當然應該注意到工作的性質和完成這些工作所用的時間。

我知道，有些人認為這一制度很幼稚，另一些人則認為很奇怪，並且已經引起了許許多多的反對意見。我們不妨再來看看。

誰都知道，今天要進入寫作職業隊伍的大門，存在着許多障礙。你年輕嗎？你窮困嗎？你生辰不好，因而只賦有偉大的智慧和高尚的心靈嗎？……那麼，你就倒楣了；尤其是你，如果認真地對待你的職業，因而你懷着對人類的熱愛並在上帝面前只想着為未來而工作的話，那麼你就更倒楣了；在你的腳下困難重重，你的智慧可能要長久缺少用武之地。如果你去投奔那些享有盛名的出版家，如果他們了解你的話，他們就會告訴你，你還是一個無名之輩，而且你的作品也過於嚴肅；成功只屬於已經成名的作家和能夠哄人的作品；在這一世紀的事務中，到處都是混亂，以致一個謹慎的出版家不敢冒着危險去刊印一本無名作家的書，即或他們不使你遭到拒絕的難堪，也會使你負擔一些最苛刻的條件，並且拿出作品作為一種施舍，來向你進行掠奪。

我們的制度指出了補救這一巨大不幸的辦法。這個制度以一種公開交易的社團代替暗中進行交易的孤立的個人，因此就杜絕

了曖昧的私人关系所引起的和保护的舞弊和专横。这个制度使好书的出版不再决定于往往只有商业知识的投机者，而取决于有才干的人，他們关怀一切有益的和值得贊揚的著作的成功。总之，这个制度会給无人知晓的天才打开一条出路，并使所有那些隐藏在社會內部的一切萌芽成长起来。

今天，拜金主义的势力日益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很明显，写作就会走上卑鄙、腐朽、墮落和卖身的道路。作家既然除了金錢沒有別的目的，除了做买卖之外沒有別的掙錢的办法，因此他們的思想作品只不过是搨客手中的商品。并且，既然在这种交易中质量并不重要，所以人們就在数量上进行投机，坏书充斥了市場，而珍贵的书本却永远埋沒在垃圾堆里。再也見不到耐心写成的优秀作品了！貪得无饜能容許等待嗎？再也見不到从事研究的天才了！为了生活的享受还能等到老年嗎？况且，又有什么好处呢？国家名存而实亡，社会則只是一个烏合之众的混乱集团，所以半生嘔尽心血所写成的著作到哪里去找到买主呢？在这里，荣誉也安慰不了有勇气的穷人。因为，如果用金錢来奖賞作家，那就会不管后世人的评价如何而以买书人的多少来衡量；而时髦就成为荣誉了。

在我們所建議的制度中，很多流弊就将消失。当作家对于研究工作有受到奖賞的希望，这一奖賞能够证明他的貢獻，补偿他的不斤斤于私利的精神，并且庄严地宣布他是国家的債权人的时候，他就会提高到他的使命的高度了。

但是，如果作家是个穷人，在他沒有得到奖賞以前，他将怎样和生活的需要作斗争呢？他就必須模仿卢梭，在他的写作的工作以外，他必須从事一种有收入的职业。作家的尊严、他的独立地位

和他的酬報只有在这种代價之下才能得到。感謝上天！人由上帝那里得來各种不同的稟賦。人的本質既然是多種多樣的，為什麼他的職務就只會是一種呢？智慧不能永久停滯不前，它像土地那樣，總要加以經營，人們播下各种不同的種子就可以加倍增高它的生產力。

有人也許會問，在我們的制度之下，那些不重視榮譽而只重視金錢、只承認他們書籍的買主是裁判人的作家，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呢？這些作家有辦法可以自己出版作品，或者完全像今天所做的這樣，可以交給別人出版。的確，這種情況將不是很有利的，因為社會書店會和這些私人的出版者進行激烈的競爭。但是，我們在這裡談的是哪些作家呢？我們談的是這樣一些作家，他們憑借他們書籍的淺薄、腐化、誹謗誹盜的誘惑力，可以說用強暴來劫奪很多讀者的錢袋，從而獲得巨額的利潤。但是，當減少沒有價值的或危險的書籍的利潤而有利於优秀作品時，壞處在哪裡呢？一些人由於欺騙社會而無限地發財致富，另一些人由於為社會服務而處於貧困的境地，難道社會可以容忍這種情形嗎？這是公允的嗎？在國內發生這種可恥的現象，難道這個國家不是走向深淵了嗎？是的，我們所建議制度的必然結果，就是會減少把思想作品作為一種行業和貨物的那些人的人數和他們的利潤。但是這個結果不但不能用來攻擊這個制度，反而是一種有利於這個制度的論據。

我們預料到另外一種反對意見。有人會反對我們，說我們這種學說有使國家成為思想產物的最高判斷者的危險。但是只要對這個問題稍加思索，人們就可以完全放心了。我再說一遍，國家將是社會書店的立法者而不是經理。規章一經訂立，國家就將像它

监督禁止攀登房屋或禁止杀害行人的法令的施行那样，来监督这个規章的执行。国家的干預就以此为限。这种干預有什么包办和橫暴可言呢？至于国家奖金，并不是由执政者而是由优秀分子作为代表的社会本身来頒发的，社会把这些人选了出来，就是为了使他們成为社会的化身，并且作为社会的縮影。是不是你們要說，誰能担保那些候选人的指定者是大公无私和正直的呢？为了回答你們这个問題，我可以向你們說出这句话：那就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利害关系。我姑且假設，在科学著作的鉴定中，會議可能选出一个无知的人来加以领导，但这个假設未免太过分了。难道这个无知的人会接受这样的任务嗎？他会高兴让大家来譏笑他嗎？假若你用一個墮落的人来代替一个无知的人，那么，他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和无恥来向从未压在一个人身上的最沉重的道德責任挑战呢？但願人們注意到这一点：这里談的并不是一个由一些人所組成的禁止旁听的科学院的討論會議，在这些人中間，責任是不分明的而且是暫时的。在这里，責任是由个人担負的，是指定誰担負的；必須全部拒絕或全部接受这个責任。还有，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切都是众目昭彰的。

人們要在自己国家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在所有的舞台中最崇高的舞台上来表示自己的态度。評判人有整年的工夫来作出他的判断。当他表示这一判断时，也許批評家早已談过了，所有明智人士的意見都已经被人知道的了。这些是多大的保证啊！更不必說通过會議討論而选出人选这一保证了。因为不管人們对这些从事討論的會議有怎样的不信任，人們至少在一点上会和我們的意見一致，这就是在有些問題面前朋党思想是无能为力的。

其次，說这个制度会发生錯誤，这种反对意見是完全沒有价值的。不是对任何机构都能这样說嗎？一个社会是否因为立法者难免有些錯誤就不要法令呢？难道因为法院关于一个公民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作出了一次錯誤的判決，你們就要推翻你們的那些法庭嗎？只要有一些人受智力的錯誤的支配和內心的各种情欲的蒙蔽，那么一切制度就都会是不完善的。有些人认为，实现他們的理想是一种效果迅速的万灵药，这些人就是一些必須加以提防的江湖派，不然就是一些必須加以憐憫的幻想者。如果一种制度是善意的产物，就应当善意地审查它，也就是說，不要去研究这一制度是否完美无缺，而是要研究它带来的优点的总和是否超过它所带来的缺点的总和。

我們的制度并不包括戏剧文学，因为戏剧是政府直接掌握的手段，所以对于戏剧文学應該規定一些特殊的規章。这是以后研究工作的主题。

我們絲毫沒有隱瞞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爽直如果得罪了一些人，那也是沒有办法的事，但是作为公民，我們有責任去反对那些导致著作变质和使作家墮落的学說。

德·拉馬尔丁先生在他的报告里說道：“我們对那些人士的文化遺產，长期以来任人浪費，應該對他們感到多么歉仄呢？整个民族在历史上也只有五六个永垂不朽的名字。在我們的記憶里，詩人、哲学家、演說家、历史学家、艺术家，仍然是几个世紀和整个民族的光輝縮影。

“蒙台涅以怀疑的态度来处理那些思想，并且用現代的文体使这些思想重新流行起来。帕斯卡耳探索了思想，不仅探索到怀疑

为止，而且一直探索到上帝。博胥埃^①吐露出人类磅礴的言語，自从上帝在西奈伊^②頒布十誡以来，人类尚未听过这样的言語。拉辛、莫里哀、高乃依、伏尔泰，他們找到了并且記錄了人类心灵的所有呼声。孟德斯鳩^③仔細研究了帝国的組織，首創对社会分析批判，并闡述了政治体制；卢梭热爱政治，費訥龙使政治神圣化，米腊博^④使政治具体化并在讲坛上加以宣揚。从那天起，发现了合理的政权，公众的理智有了它自己的合法机构，而自由則沿着思想的步伐在討論的指示下向前迈进。法国的风俗、文明、财富、势力和政治都应当归功于这些人；而我們的孩子們也許應該把一切都归功于这些人的后继者。法国永恒的和取之不尽的财产就是它的智慧；既然法国把它的智慧慷慨地給了人类，給自己保留了智慧的光荣，这就使它在所有民族中具有光荣的特征，現在岂不是时刻已经到来，應該把这个有用的部分、即造成著作的尊严、作家的独立地位、家庭的财产和国家的报酬这一部分变为私人财产嗎？”

啊！先生呀，当你用你的笔写出这些字句来的时候，你的心灵中是否有一种声音在低声地警告你，說你已经誤入迷途了呢？当你估計天才的重要性时，你却使他們成为半神化的人；当你規定他們的命运时，你却使他們成为新奇杂货的販卖者了！你的贊揚把他

① 雅克·伯尼涅·博胥埃(1627—1704)，法国教会演讲家。——譯者注

② 西奈伊，亚洲西部的半島，位于紅海两海湾之間。地勢大部分是高原。据圣经記載，上帝曾在雷轰电閃和密云中在西奈伊山頒发十誡(見《旧約》《出埃及記》第十九章)。——譯者注

③ 孟德斯鳩(1689—1755)，法国資產階級哲学家及法律学者，著有《論法的精神》。——譯者注

④ 翁諾尔·加布里耶·里克蒂·米腊博(1749—1791)，十八世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有名的活动家。大資產階級和自由貴族的領導人物之一。——譯者注

們高捧上天，但你的學說却把他們拋入深淵。你的才能辜負了你，先生，你不用自我辯解，你的雄辯本身就譴責了你的結論，除了用你的宏論之外，我不必用別的證明來反駁你。是的，當一個詩人借这么多的光榮和偉大的人物來支持這樣可憐的利益時，他對他自己不可能是完全真誠的。是的，這是不可能的！先生，我相信我已經猜到了：如果你是富有而沒有孩子的人，那你不免會認為你是替那些作家和他們的繼承人要求發財致富的權利，並不是為自己的利益提出要求。如果你是貧窮的，那麼你決不會要求以小錢來作為作家的報酬。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也許以為你的繼承人只要繼承你的名望就已經夠了。你自己欺騙了自己；你在對其命運作出安排的這個問題上，你已經扮演了一個第三者的欺騙角色。

被拉馬爾丁這樣偉大的詩人、這樣思想高超的人所提倡的對於工業主義的信仰，決不是今天正在腐蝕着社會的那個禍害的較輕的可悲症狀之一，工業主義就是這樣逐漸地在貶低人們的地位和心靈，它無孔不入，它使人成為奴隸；它像那個試探耶穌的魔鬼那樣敢於對詩人本人說，“你是否向我跪拜”，而這位詩人就跪下了！好吧！只要我們還活着有一口氣，即使我們的聲音會在一切騷動的貪欲所發出的嘈雜聲中消失，我們還是要攻擊這些墮落的傾向。我們要求大公無私的精神仍被保留在重要品德之中；我們要求名譽、光榮和盡責的那種滿足感始終成為人類活動的目的和獎賞；我們要求不要使人們貧乏到這樣的地步，以至他們除了愛好金錢之外不再有別的動機。而對於那些不知道作家應有高尚靈魂的人，我們要重提一下盧梭所說的高尚言論^①：

^① 見《懺悔錄》，第一卷，第134頁—135頁。

“不，不，我可以既真实而又骄傲地这样说；在我一生的任何时刻里，使我高兴或使我伤心的既不是名利也不是贫穷。在这一不规则的和由于生活波动而值得回忆的生活过程中，我经常没有住处也没有面包，但我总是以同样的心情来对待富裕和贫困。在需要时，我可以像别人一样去行乞或盗窃，但是，即使我落到那种地步，我也不会感到烦恼。我从未因为贫穷或惧怕陷于贫穷而唉声叹气或者流泪。在命运的考验中，我的灵魂倘不通过命运的磨折是不会懂得真正的善和真正的恶的；而只有在我毫不缺乏生活所需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人类中最不幸的人。”

附录 从現在起就可以 試办的事項

在大家刚才讀的篇幅里，我們已经說明了作为一个人民之友和从人民的选票中产生出来的政府所应当遵循的步驟，以逐漸实现一种公平和健全的劳动組織。因而，提出的計劃是以完成一次政治革命作为达到社会革命的方法为前提的。

但是我們所期待的时刻的到来可能还很遙远，到了那个时候，国家就只不过是人民的生动的化身了。并且，在等待期間，在那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决斗場的劳动領域內，該有多少紛扰、多少痛苦、多少貧困啊！

此外，我們不是也曾听到这样的呼声：在可以进行一次政治革命以前，难道为了工人就没有任何可以試办的事情了嗎？

这决不是我們的意見！毫无疑义，不应当信任局部的奋斗所产生的力量；但是我們并不劝告人民在不幸和痛苦之中坐以待斃。

可是要当心那些魯莽的或者錯誤的尝试！要当心那些尝试，因为它们在本質上或者在所要达到的最后目的上是欺人的，或者是足以危害社团原則并使社团原則失掉威信的！

最近，在可尊敬的感情启发之下，有些民主党的著名人士集会討論这个重要的和振奋人心的劳动組織問題。研究我們通过什么样的实际方法能在目前情况下实现我們大家都能同意的社团原則。

获得选票最多的一个政党同意组成一个信贷社团，由这个社团来主持各种工人社团的产生，供给它们劳动工具，给它们指定一个方向，但在这些社团之间仍旧保留着竞争，并且并不要求它们建立一种集体资本作为它们生存的基础，这个资本可能会无限制地增加，但毕竟是不许可转让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计划我们是不能附和的：

1) 因为，如果工人社团不自行规定要通过一种集体的和不可转让的资本而无限地扩张的法规，它的利益就会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有所不同，而无产阶级只有把自己看成一家人才能得到解放；

2) 因为，帮助某些工人在他们之间组成一个个别的和有限制的社团，这就是在工人之间形成一些特权者，并在一切都应当趋于统一的地方造成一些区别；

3) 因为，只要还存在竞争——仇恨、嫉妒、舞弊和灾难的泉源——，工人的伟大而普遍的解放就永远不能实现；

4) 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给某些人增加力量就是给另一些人增加虚弱。因此，倘若竞争有计划地坚持下去，那么，给予一个个别社团的一切支持，对于被排斥在该社团之外的那些人就会造成不幸。

总起来说，问题在哪里呢？在实际上逐步达到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信条的实现吗？那么就必須把矛头指向竞争。因为：

有竞争就没有自由，因为竞争阻止弱者发展他们的能力，并使他们成为强者的战利品。

有竞争就没有平等，因为竞争不过就是不平等本身的行动表

現。

有竞争就沒有博爱，因为竞争是一場战斗。

肯定地說，这个杀人的原則是不能一下子立刻就被摧毀的。但是，为了彻底地和合情合理地摧毀这一原則，就必须嘗試以解放劳动者为目的的整套制度。

以下就是我們所要建議的。

在社会民主党內組成一个委員會。

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一委員會要举行一种像在最近几年內所举行的募捐，这些募捐或者是为了抗議国家尊严的受損，或者是为了对某一个有德行的公民举行隆重的紀念，或者是为了援助一个和我們保持友好关系的被压迫民族。

以这种方法收集的基金交由一个工人社团来支配，自然，这个社团只能算是普遍建立的劳工社团的第一个核心。这个社团应包括几种不同的工业，并且應該建立在某些基础之上，下列各条就是这些基础中的主要項目。

規 約^①

第一条 应把入社的工人分成两个家庭，每个家庭由人数相等的成員組成。

工人人数增加时，家庭的数目亦将按比例增加。

应该尽可能选择居住在同一市区的成員来組成一个家庭。

第二条 工人全体大会任命一个可以罢免的中央行政委员会，它的特殊任务是寻找工作、和第三者接洽、在我們以后要談到的家庭委员会之間分配应当做的工作和应当給与的工价，要做到使每个家庭按照严格的比例，可以得到数字相等的劳动时间和同样的报酬。

第三条 在每个家庭中組成一个委员会，定名为家庭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員由家庭选出并在必要时可以罢免。

該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家庭的各个成員之間分派属于該家庭方面的工作和工資。另外，該委员会的成員还有检查工作和监督每个人完成其工作的使命。

第四条 每个家庭从自己的成員中选出一人，专门負責清查

① 也許有人将提出反对的意見說，我們在这里規定其基础的方案不能完全符合商业公司的組織法。

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那些法律是为了“資本的社团”而制訂的；而不是为了“人力与感情的社团”而制定的。

然而，经过对法典的仔細研究，并根据几位著名法学家的意見，我們可以确定上述的規約是可以和“合資公司”的形式相适应的。

帳目和审查中央行政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所进行的业务。

第五条 每个工人从总的劳动工价中按照每劳动八小时五个法郎的标准领取工资。

超过这个数字的利润，作为公共基金，其用途指定于后。

第六条 年终时，应编制一份社团状况的正确说明书。为此，要编制一份存欠总清单。如果尚有余额，则应分为两份，其中一份按照人数平均分配给社员，另一份成为集体的资本，这个资本不许出让，并且指定用于因人们相继加入而日益扩大的社团。关于加入社团的事项将在后面叙述。

第七条 任何残废或患病的社团成员，经证明属实者，有权得到和他健康时相同的工资和同样的利益。

第八条 如果工人自愿退社或因行为不检而勒令出社，对于退出社团的工人只付给尚未支付的劳动工资。

第九条 缔约人承认每个人都有劳动的权利，承认任何带有排外性质的社团都是破坏博爱学说的，因此他们以最郑重的态度约定，在社团的状况并非绝对不允许接受工人入社时，凡有志入社而愿意服从社章的工人，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都可以被接受为社员，但该工人必须属于一种行业，并提出证明文件。

第十条 为了对此作出决定，应由全体缔约人选出委员七人，组成评判委员会。

第十一条 缔约人承认宁愿减少收入，不让工人弟兄生活发生困难。所以工人评判委员会在决定接受工人入社时应根据的原则是：垄断劳动是违反人道的罪行。

第十二条 缔约人从现在起就像以上所说的那样被分成两个

家庭，这两个家庭的人数可以随着新社员的不断增添而增加到各为一百人为止，在这个时候，就可宣告满额。有新社员加入时，他们将被平均分配到已经成立的两个家庭中去，直到各满一百名为止。此后，他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依此类推。

第十三条 工人评判委员会由缔约人选出，作为仲裁法庭，并以此身份判断缔约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争执。委员会有权决定退休原因是否合法或疾病是否确实；有权根据检查员的报告，宣布将那些公认为懒惰的工人开除出社。最后，它有权在经过公开辩论之后，宣布罢免那些确应罢免的委员会成员，而这种罢免则应按照仲裁法庭在审判时所遵循的形式宣布。

第十四条 不论是委员会的成员或评判委员会的委员，每年均须重新选举或决定连任。

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的 来信和章程草案

当我们忙于校订目前的版本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位工人作家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①先生的来信和草案，他是以《论同业公会》的著作而知名的。下面就是来信和草案。

我们迫不及待地吧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先生提出的草案印出来，让我们的读者尽快看到。我们和他一样，确信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一切善良的公民都应当留意的问题：

“路易·勃朗先生，

“我得悉你正在准备为你的《劳动组织》这一著作刊印新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此关心，因此我试图起草一个社团方案，并将这个草案寄给你；如果你认为能够使你的读者们感到高兴，我请求你把它在你的读者面前公布。

“谨致敬意！

“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

1847年3月18日于巴黎。

^① 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1805—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章程的草案

第一条 如果工人们自相联合，筹集基金，终于集成一笔社会资金，以便经营任何一种工业，那么应由全体社员委任他们的经理和社团的全部领导人员。

第二条 如果一些富人——我们阶级的朋友——具有远见，愿意协助我们组成一个工人社团，他们可以选择一个能够提供最大道德保证和最有成功希望的社团；他们可以慷慨大方地以最低的利息来垫付大量的资金，这样，社团就可宣告成立。

第三条 具有善良愿望的人为了试行某种新的工业制度，可以在勤劳的、智慧的、有道德的并爱好博爱的工人中去选择自己的合伙人。社团将成立一个有委员若干人的委员会，通过规章，并且可以规定社团的期限为三十年。

第四条 社团既然需要进行工作，运用它本身的能力，并依靠经验和实践来每日进行自我教育，它首先将只举办一种工业；如果认为妥当的话，可以先创办一个家具工场或木器工场。

第五条 在这第一个工人组合之外，委员会和它的经理在认为已有可能时，就应该成立不同职业的新的组合。

第六条 在木器工业小组之外，人们可以成立金属器具制作工业小组、车琢工小组、木匠小组、泥瓦工小组、制鞋工小组等等。

第七条 每个小组设工作组长一人，经该小组同意后，由委员会指派。

第八条 经理及工作组组长的工资按月或按日计算；待遇应按合理的条例来加以确定；所有其他的工人，则应视当时的情况或

工业性质的需要而按件計工或按日計工。不論是按件或按日計算，工价既不得高于私人工厂中的工价，也不得低于这个工价。

第九条 每个小組均应选出代表一人参加管理委员会，該代表系由小組自由选出，并能由小組加以罢免。这些代表的任务是了解和监督社团的业务；代表由本組工作领导人或其他由小組推选的委員充当。

第十条 所有的小組都是有联系的；它們一起組成一个統一的社团，管理委员会是該社团的主脑，而各个小組則构成它的躯体与四肢。

第十一条 各小組的委员会从管理委员会那里領取經費，并和管理委员会保持紧密的关系。

第十二条 管理委员会由委員六人組成：经理、副经理、秘书、助理秘书和小組检查員。

第十三条 各小組委员会同样亦由六个委員組成：小組代表、工作领导人及其他四位委員。小組代表和工作领导人有时可能是同一个人，但应作出安排，使每一委员会均由六名委員組成。

第十四条 应备有記載正确的簿册，在管理委员会的帳目中和各小組的业务中均应保持秩序及明确性。

第十五条 每年年終收支应达到平衡，把赢余总额分为四份：第一份几乎总是不能和其他各份相等的，这一份用来支付社团貸款的利息及社团所发行的股票的利息；第二份充作社員的救济金；第三份作为社团基金和偿还資金的基金，其目的在于使社团能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成为它的資本的絕對所有者；第四份平均分配給全体社員。

第十六条 如果某一小组遭受损失，在年终有所亏损，社团应予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妨碍该小组分享赢余总额。

第十七条 如果同一小组并无特殊原因而连续几年成为社团的负担，同时该小组成员所得的平均工资又至少不低于其他小组的社员的平均工资，管理委员会在小组代表的共同协助下，应考虑该小组的问题，或者更换它的领导，或者取消它应得的利润，或者采取其他一切方法。

第十八条 所有各小组的成员是由利害关系和友爱精神联系着的。家具制作工人要穿制鞋工人所制的鞋子，而制鞋工人要用家具制作工人所制造的家具。每个小组均成为其他小组的顾客，并且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其他小组得到工作；因为所有的人都使每个人得到利益，而每一个人都能在全体的利益中得到好处。

第十九条 社团成员的住宅应尽可能靠近公共工场。

第二十条 管理委员会除购买工作本身所需的材料以外，对于生活上不可缺少的食物及饮料，诸如菜蔬、水果、酒等等，可以成批购买，并按成本价格向每个社员供给他所必需的消费品。此类物品的价款应从社员每星期的工资中扣除。

第二十一条 如果劳动和节约产生了盈余，如果每个成员都能积蓄一定数额的款项，他可以把这笔款项存入社团，社团可为此而发给股票。存款的利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第二十二条 任何成员有退社的自由。如果他持有股票，则应向他收回，至于他的股款则应全部偿付；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能享受救济和由全体会员的劳动所得来的社团基金的一切权利。

第二十三条 社团可以时常接纳新社员，或者为了补充退社

的成員的缺額，或者为了扩大社員的行列。新入社的成員，由于他为全体的利益只工作了几个月，在他第一次分享利潤时，仅能得到他按理应得的部分。

第二十四条 如果社团和某一个小組的工作发生清淡情况，如果人手空閑下来，那么新社員或在別处容易找到工作的社員可以暂时退出公共工場。他們将不能再向社团領取工資，但他們仍能享受友爱的救济和領取利潤的权利，因为他們在社团通知他們回去的时候，应当随时回到社团中去工作。

第二十五条 如果不仅是一个小組，而且是該小組所从事的行业发生工作清淡的情况，并且空閑的成員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那么，小組就应縮短全体成員的工作時間，以便使这种清淡情况因为由全体成員以友爱的精神分担起来而得到减轻；这样，在这种例外的情况下，任何成員都不必离开公共工場。在经过正式的討論之后，对于生活最感困难的社員甚至可以动用救济基金給与帮助。

第二十六条 每个社員都有退社的自由。根据同样理由，并且为了使权利具有相互的性质，管理委员会在取得小組代表以及工作领导人的一致同意之后，可以把不履行社团的道德原則和友爱原則的社員开除出社。

第二十七条 社員按件或按照劳动日領取工資，每个人是按照他的体力和才能而得到工資的；只有在每年的贏余总额中每个人才能分得相等的一份。然而，如果一定数目的社員根据与上述原則有所不同的原則而不願有一些人比另外的一些人得到較多的收入，那么，就可以把他們的工資总额交給他們，由他們按照自己

的意願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委员会和小组长們按照那些願意这样做的社員的希望去进行这种分配，以便使他們每人都得到相等的一份。

第二十八条 当社团有了办法的时候，对于那些在为社团的劳动中出过力的或是损伤了自己体力的老年人和残废者，应该通过表决给与养老金。另外，当管理委员会和小组代表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曾经为社团服务的已故社員的妻子或孩子、父亲或母亲，都可以得到一笔撫恤金。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决議时，人們不仅应当注意到死者所尽的力量，而且同时也要注意死者的亲属的情况和是否真正需要。

第二十九条 应当开办基本的和专业的課程。其細則另由专条加以規定(我們也要談一談如何能在各省設立办事处，以便社員迁移或旅行到別的城市而不和他的社团断絕关系，并且可以不断为社团工作。然而，如果这样做会发生困难，或者似乎会给与社团一种过分包办性的特征，我們就不必談它，因为，我們仅仅願意嘗試做一些可能作到的和我們认为是好的事情)。

第三十条 各委员会每七天应召集成員开会一次，管理委员会和小组代表每月应开会一次。各委员会的成員每隔三月要到管理委员会去开会一次。每年年終举行一次全体會議，并在會議期間，在分配利潤之后，为了求得全体社員在精神、情緒和道德上趋于一致，要举行一次家庭庆祝会。

第三十一条 社团的存在期限定为三十年，但在一些不可預料的情况下得提前解散。然而，如果环境有利，而将来的法律又許可的話，那么社团也可以超过原定期限而延长它的存在。

第三十二条 在社团解散时，最先有权得到补偿的是股东和出资人。社会基金的余额则将在一切社员中按照他们为社团的利益而劳动的年限进行分配，所以有的人可以获得多些，有的人获得少些。

第三十三条 本规章的各条款决非丝毫不能修改。管理委员会和代表有权修改它的条款，有关出资人的条款则不在此例。对这类条款，若不取得出资人的同意，不得更改。

第三十四条 每一项条款必须经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和小组代表四分之三的多数的同意才能增加、删改或变更。

人名对照表

四 画

丹敦 (Danton)
瓦尔都 (Wardour)
韦尔斯利 (Wellesley)
孔西代朗, 维克多 (Considérant, Victor)
牛頓 (Newton)
比西—腊比坦 (Bussy—Rabutin)

五 画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圣—茹斯特 (Saint—Just)
圣保罗 (Saint Paul)
圣西門 (Saint—Simon)
布蓝托姆 (Brantôme)
布勒曼 (Poulmann)
加斯帕蓝 (Gasparin)
弗勒里 (Fleury)
布克利 (Boucly)
布隆, 葛丽娜—安奈特 (Bronn, Cœlina—Annette)
布瓦埃, 阿道夫 (Boyer, Adolphe)
布尔維 (Bulwer)
皮洛士 (Pyrrhus)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史谷脱, 瓦尔特 (Scott Walter)
弗莱吉埃 (Fregier)
弗兰西亚 (Francia)
尼罗 (Néron)
尼科尔 (Nicale)
加雷尔 (Galère)

卡韦尼亚克 (Cavaignac)
卡尔内 (Carné)
古尔貝 (Courbé)
代馬萊 (Desmarets)

六 画

西斯蒙第 (Sismondi)
米内尔符 (Minerve)
米腊博 (Mirabeau)
吉斯特費尔德 (Chesterfield)
伏尔泰 (Voltaire)
貝朗瑞 (Béranger)

七 画

克敏斯 (Cumins)
杜班, 查理 (Dupin, Charles)
杜布瓦 (Dubois)
庇特, 威廉 (Pitt, William)
李嘉图 (Ricardo)
麦逊 (Méthuen)
貝德福德 (Bedfort)
貝尔維 (Berville)
狄德罗 (Diderot)
伽克里奥斯特洛 (Cagliostro)
伽里略 (Galilée)
杜梅里, 埃德賴斯当 (Dumérie, Edelestand)
阿貝尔 (Hébert)

八 画

拉斯奈尔 (Lacenaire)
拉梅耐 (Lamennais)

拉克勒泰尔 (Lacretelle)
 拉辛 (Racine)
 拉·卡尔普勒内德 (La Calprenède)
 拉·赛勒 (La Serre)
 拉普拉斯 (Laplace)
 罗伯斯比尔 (Robespierre)
 罗特希尔德 (Rothschild)
 林德赫斯特 (Lyndhurst)
 阿尔比克尔克 (Albuquerque)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帕默斯顿 (Palmoston)
 佩迪吉埃·阿格里科耳 (Perdiguiet, Agricol)
 波尔塔利斯 (Portalis)
 肖博勒 (Chambolle)
 苏拉维 (Soulavie)
 帕斯卡耳 (Pascal)
 舍伐利埃, 米歇尔 (Chevalier, Michel)

九 画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查理第七 (Charles VII)
 律比雄 (Rubichon)
 洛蓝 (Lorain)
 韦尼奥 (Vergniaud)

十 画

马萨尼埃洛 (Masaniello)
 马尔萨斯 (Malthus)
 格拉古斯, 蒂伯里尤斯 (Gracchus, Tiberius)
 格林 (Grimm)
 拿破仑 (Napoléon)

十一画

勒德律—罗兰 (Ledru—Rollin)
 勒特利埃 (Letellier)
 盖潘 (Guepin)

雪弗鲁依 (Chevreuil)
 莫里哀 (Molière)
 梯也尔 (Thiers)
 荷马 (Homère)
 基佐 (Guizot)
 笛卡儿 (Descartes)
 毕莱 (Buret)
 梅雷 (Mairet)
 费讷龙 (Fénelon)

十二画

斯密 (Smith)
 惠灵顿 (Wellington)
 傅立叶 (Fourier)
 菲德列 (Frédéric)
 博胥埃 (Bossuet)
 舒瓦瑟耳 (Choiseul)
 喀德林 (Catherine)

十三画

路易十一 (Louis XI)
 路德, 马丁 (Luther, Martin)
 蒂培尔 (Tibère)
 萨伊 (Say)
 新西纳图斯 (Cincinatus)
 雷纳耳 (Raynal)
 杰克逊 (Jackson)
 蓬帕杜尔 (Pompadour)
 福歇, 里昂 (Faucher, Léon)

十四画

维纳斯 (Vénus)
 维累梅 (Villermé)
 维斯特敏斯特 (Westminster)
 蒙泰 (monteil)
 蒙台涅 (Montaigne)

十五画

德·奥赛 (D' Haussez)
德·拉马尔丁 (De Lamartine)
德·盖朗日尔, 勒干 (De Kérangel, ,
Leguen)
德·伽马, 瓦斯哥 (De Gama, Vasco)
德·巴尔扎克 (De Balzac)
德·拉土舍, 亨利 (De Latouche, Hen-
ri)

德·蒙莫朗西 (De Montmorency)
德·萨德 (De Sade)
黎塞留 (Richelieu)

十六画

霍尔巴赫 (Holbach)

十七画

穆罕默德—阿里 (Méhémét-Ali)